



ICOM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2019 年 第 11 卷 第 2 期

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学刊（中文版）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





2019 年 第 11 卷 第 2 期

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学刊 (中文版)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学刊》(UMACJ)是经过同行评审的在线期刊,作为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UMAC)的会议论文集发行。

#### UMACJ Editorial Board 2018-2019

Kate Arnold-Forster | Director, University Museum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University of Reading, UK

Hugues Dreyse | Director, Jardin des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France

Gina Hammond | Manager, Psychology Test Library, Macquarie University, Australia

Jill Hartz | Executive Director, Jordan Schnitzer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Oregon & Emerita President, AAMG (Association of Academic Museums and Galleries), USA

Mirna Heruc | Director, University Collections, University of Adelaide, Australia

Alistair Kwan | Lecturer, Centre for Learning and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

Marta Lourenço | Deputy Director,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d Science, University of Lisbon, Portugal

Ing-Marie Munktel | Retired, previously Director Gustavianum, Uppsala University Museum, Sweden

Panu Nykänen | Secretary-General, Finnish Academy of Technical Sciences, Finland

Barbara Rothermel | Director, Daura Gallery & Associate Professor, Museum Studies, University of Lynchburg, USA

Steph Scholten | Director, The Hunterian, University of Glasgow, UK

Andrew Simpson | Library (Archives and Collections), Macquarie University, Australia

Peter Stanbury | Formerly inaugural Chair, UMAC and Director, Macleay Museum | Presently Librarian, Australian Society of Anaesthetists, Australia

John Wetenhall | Director,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Museum,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USA



## Editors UMACJ 11 No. 2

Jill Hartz

Former Director, Jordan Schnitzer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Oregon & Emerita President, AAMG  
(Association of Academic Museums and Galleries)

55 Harristown Rd Suite 106, Glen Rock , NJ 07452, USA

Barbara Rothermel

Director Daura Gallery - Lynchburg University

1501Lakeside Dr., Lynchburg, VA 24501 - USA

Andrew Simpson

Library (Archives and Collections)

Macquarie University

NSW 2109 Australia

Copyright © International ICOM Committee for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http://umac.icom.museum>

Graphic edition: Silvana Arago-Telona, CdMx, Mexico

ISSN 2071-7229

Each paper reflects the author's view.

## UMACJ (中文版)

策 划 / 李明斌 郭 骥

翻 译 / 肖福寿 骏 仁

编 审 / 刘志强 郁 慧

排 版 / 谭 茜

审 校 / 邵文菁

上海大学博物馆

中国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 99 号 / 南陈路 333 号, 200444

《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学刊》(UMACJ) 中文版获得国际博物馆  
协会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UMAC) 授权

项目得到全国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上海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  
支持



封面图片：

命运 II (*Destiny II*) , 2016

油画

60 英寸 x 48 英寸 (约合 152 厘米 x 122 厘米)

美国佛罗里达州珊瑚山墙区罗威艺术博物馆 (Lowe Art Museum)

2018 年 1 月,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 目 次

### 导言

勇于思索：大学博物馆及其藏品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变革动因

Jill Hartz, Barbara Rothermel, Andrew Simpson.....171

### 勇于思索：

**大学博物馆及其藏品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变革动因**

**大会演讲：我们的重要性**

大学博物馆：“走钢丝”的机构

Lyndel King.....177

大学博物馆宣言

William Eiland.....185

我们的重要性：阐明大学博物馆的价值

John Wetenhall.....190

大学博物馆的重要作用：体现其价值的四种体系

Andrew Simpson.....196

### 勇于思索：

**大学博物馆及其藏品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变革动因**

### 论文

市民策展人：弥合学术与公众之间鸿沟的众包项目

Heather Moqtaderi.....204

弥合隔阂与消除障碍：大学生使用西班牙语和借助博物馆开展“包容性”实践

Karina Vázquez, Martha Wright.....211

批判博物馆学与大学博物馆：墨西哥超越艺术 / 科学二分法

Blanca Cárdenas.....223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及其大学博物馆的自然历史双向知识

Luisa Rico.....231

大学藏品的相关文献：面向校园内外的包容性与公平性实践

Karin Weil, Claudia Ordóñez, Constanza Chamorro.....240

# 导言



# 勇于思索：大学博物馆及其藏品是世界进步的变革动因

Jill Hartz, Barbara Rothermel, Andrew Simpson / 文

骏仁 / 译

邵文菁 / 审校

本卷为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UMAC）与美国大学博物馆和美术馆协会（AAMG）的首度合作出版。UMAC 是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下设的国际性的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而 AAMG 则是美国境内唯一一家专门致力于帮助大学博物馆和美术馆成功发展的非营利性组织。尽管全球的博物馆业界人士会以以上两个组织成员的身份定期参加各种理事会议，以往也曾携手撰写论文或发表演讲，但本期收录内容的来源，即 UMAC-AAMG 年会，却是两个组织首度联合举办的会议。本次年会于 2018 年 6 月 21—24 日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大学（University of Miami）举行，是 UMAC 在美国本土第三次举办会议。<sup>1</sup>

---

<sup>1</sup> UMAC 在美国举办的前两次会议，分别于 2003 年和 2009 年在俄克拉荷马大学（University of Oklahoma）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举行。





2018 年夏季举办的这届年会，以“勇于思索：大学博物馆及其藏品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变革动因”（Audacious Ideas: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as Change-Agents for a Better World）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南美和北美洲、墨西哥、欧洲、亚洲和澳洲的 400 多名博物馆专业人士：

我们的世界危机四伏，周围充斥着各种不稳定的因素。大学博物馆和美术馆能否做些什么来扭转这种局面？除了致力于教育和培养新一代学生，以及为日趋多样化的社区来提供服务外，我们如何才能在积极推动变革的同时，更准确地评估自身努力所产生的影响？“勇于思索”的主题提供了一个活跃的平台，让人们分享关于推动博物馆、美术馆及其藏品成为变革动因的思考。具体而言，今年的议题主要包括从属机构定位的调整与创新；如何在保持现有客流的同时吸引更多的观众；如何在推动世界走向更为公正、和平和健康的未来的同时，更好地体现我们作为关键合作方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价值。

事实上，本届联合会议只是 AAMG 第二次独立参与组织的年会。2016 年以前，AAMG 通常会选择在美国博物馆联盟（AAM）年会之前或期间举办为期一天的活动。多年来，AAMG 的理事会一直在讨论是否应当扩大其会议的规模，变更会议时间以避免大学的开学时间。在针对前述提议所进行的调查尚无明确结果的情况下，AAMG 理事会还是决定进行改革，并宣布未来的会议均安排在 6 月举行，时间则延长至 3 天，且每次会议都由大学博物馆或美术馆主办。改革后的首届会议于 2017 年 6 月 22—25 日举行，取得了巨大成功。那届会议的主题是“博物馆的重要性：今天的教学型博物馆”（Why Museums Matter: The Teaching Museum Today），主办方为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的约旦·施尼策尔艺术博物馆（Jordan Schnitzer Museum of Art）和自然文化史博物馆（Museum of Natural and Cultural History）。近 300 名业界人士参加了这届会议，并在会上讨论大学博物馆、美术馆及其藏品在校园内外所发挥的作用。会议的组织者向参会者发出以下倡议：

从培养新一代学生到建立更为包容和公正的新型伙伴关系，从开发可持续运营模式到检验新的策展模式，各家机构都在提升自身的同时振兴我们所处的社区。我们所作的努力正在改变这个行业，鼓励所有业内人士更深入地思考，更充分地参与，并分享各自的成功与挑战。

在研究了博物馆和非营利性领域举办的各类会议的形式后，AAMG 设计出一种旨在能够最大化提供参与性的多样化的会议模式。具体而言，会议内容包括会前定点参观、针对重要议题的圆桌讨论、行业思想领袖的主题演讲、总结陈词（以图片为主的简短演讲，主要由学生完成）、24 个小组讨论（每个小组可选 4 个话题）、午餐交流、海报展示、工作坊、商务洽谈、主题晚宴，以及交流招待会。基于上述的模式在俄勒冈大学成功举办会议后，2018 年的联合年会也沿用了这一模式。

美国大学博物馆和美术馆协会（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Museums and Galleries, ACUMG）成立于 1980 年。2010 年，在变更组织章程并进行改组之后，ACUMG 正式更名为 AAMG，并重新确认自身的使命为“服务于大学博物馆和美术馆及其藏品的前沿的专业教育组织。在认识到自身成员机构所面临的特殊机遇和挑战后，AAMG 根据组织成员履行教育使命的需要，开展和支持最佳实践、教育活动，推动专业化发展”。与 UMAC 一样，AAMG 也致力于解决大学博物馆、美术馆及其藏品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涉及包括人类学、艺术、历史、自然史和科学等在内的所有学科。2017 年组织出版的第一本《大学博物馆和美术馆专业实务》（*Professional Practices for Academic Museums and Galleries*），如今已经成为美国博物馆联盟在学术领域的认证标准。

2018 年的联合年会，由我们的两位同事芭芭拉·罗瑟梅尔（Barbara Rothermel）和吉尔·哈茨（Jill Hartz）主持。他们两人在大学博物馆领域长期保持着密切合作，经常共同在“高等院校博物馆培训营”（Bootcamp for Academic Museums）发表演讲。“培训营”旨在深入探讨在高等教育机构内部运营博物馆的各种基本要素，因而广受欢迎。目前



活动已经成功地从美国走向全球，2017 年在芬兰 UMAC 会议的开幕式上、2018 年在上海高等院校博物馆的特别活动中，以及最近的 2019 年在日本京都的 UMAC 会议开幕式期间，都举行了相关活动。

在迈阿密年会上，芭芭拉的组织能力和对博物馆专业研究的渊博知识，让 AAMG、研讨会的参会者，以及整个联合年会都受益匪浅。当时吉尔担任俄勒冈大学尤金分校（Eugene）约旦·施尼策尔艺术博物馆的执行馆长兼 AAMG 荣誉主席（6 年主席生涯结束后的荣誉头衔），而芭芭拉则担任弗吉尼亚林奇堡大学（University of Lynchburg）达拉美术馆（Daura Gallery）的馆长和 UMAC 副主席。

我们的两位联席主席得到了由 AAMG 和 UMAC 理事会成员组成的会议议程委员会（Conference Program Committee）的支持，包括：迈阿密大学洛尔艺术博物馆（Lowe Art Museum）古典建筑艺术总监兼首席策展人（Beaux Arts Director and Chief Curator）吉尔·迪皮（Jill Deupi）；纽约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帕切斯分校（Purchase College）纽伯格艺术博物馆（Neuberger Museum of Art）馆长特雷西·菲茨帕特里克（Tracy Fitzpatrick）；ICOM-UMAC 主席、里斯本大学（Universidade de Lisboa）自然历史博物馆（Museu Nacional de História Natural e da Ciência）副馆长玛塔·C·洛伦索（Marta C. Lourenço）；澳大利亚麦格理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古代史系（Department of Ancient History）荣誉学者安德鲁·辛普森（Andrew Simpson）。此次会议的圆满成功离不开上述各位人士的专业能力和辛勤付出，对此我们深表谢意。<sup>2</sup> 会议结束后，芭芭拉和吉尔积极回应了《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学刊》（UMACJ）编辑安德鲁·辛普森的建议，汇总会议演讲人的报告并作进一步的研讨。我们非常高兴能在本期刊物中与大家分享这些优秀的文章。

迈阿密大会的全体议程之一，邀请知名博物馆馆长对会议的主题“我们的问题所在：对大学博物馆重要性的反思”（Why We Matter: Reflections on the Importance of Academic Museums）进行讨论。在全球社会日益分裂和斗争的当下，3 位参会者代表近百年来博物馆业界的领导层，针对大学博物馆在向学者、教师和公众提供观点、见解、价值观和学识方面的基本理念和重要作用方面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他们是雅典乔治亚艺术博物馆（Georgia Museum of Art）馆长威廉·艾兰（William Eiland），明尼苏达州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韦斯曼艺术博物馆（Weisman Art Museum）馆长兼首席策展人林德尔·金（Lyndel King），华盛顿特区乔治·华盛顿大学博物馆（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Museum）馆长约翰·韦滕霍尔（John Wetenhall）。以上 3 位都对美国高等院校的博物馆有着广泛的认识和深入的洞见，来自 UMAC 的安德鲁·辛普森则以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行业资深人士的身份，与他们就上述议题进行了探讨。

本期 UMACJ 很荣幸地收录了迈阿密全体会议上所有 4 位发言人的文章。为了尽可能地还原会议当天的盛况，我们在收录时力图做到保留“原汁原味”。与本刊中的其他内容一样，这些文章也都送交同行评议。但作为本卷的编辑，我们在经过深思熟虑后，还是决定采用所有 4 位演讲者提供的原始讲稿。林德尔·金分析了近期美国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发生的一些变化，探讨各种对立和矛盾的力量是如何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撕裂今天的大学博物馆。比尔·艾兰（Bill Eiland）也讨论了如何应对各种当代问题。我们很荣幸能发表他所撰写的《大学博物馆宣言》（*Manifesto for Academic Museums*），这份宣言试图向公众表明大学博物馆的重要性。约翰·韦滕霍尔在他的文章中赞扬了大学博物馆的表现，并指出尽管内部外部的环境都充满着挑战，大学博物馆依然成功地拓展了自己所肩负的使命。安德鲁·辛普森的贡献，则是从高等教育机构的角度，提出了诠释大学博物馆存在价值的观点。

会议结束后，我们向所有有意为本刊投稿的演讲者都发出了邀请，请他们提供稿件作为 2018 年度 AAMG 和 UMAC 联合年会的留痕和纪念。最终我们从投稿中挑选出一小部分论文予以收录和发表。本卷收录的这些论文均基于案例研究，我们相信这些案例都是大学博物馆领域中的典范，具有潜在的普适性，并且论文本身在本卷中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中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亚瑟·罗斯美术馆（Arthur

<sup>2</sup> 会议议程参见：<https://www.aamg-us.org/wp/wp-content/uploads/2018/06/AAMG-2018-PROGRAMFINAL-WEB-R5.pdf>（访问日期 2019 年 11 月 20 日）。



Ross Gallery) 有关众包策展 (crowd-sourced curation) 的论文, 内容源于一场圆桌会谈。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的一篇文章采用独特方法, 将科学和艺术的二分法融入到他们大学博物馆的所有项目中。同样来自这所大学的另一篇文章, 则考察了如何通过联系自然历史和恢复土著记忆, 来重新评估大学博物馆的作用及其非殖民化发展。另外一篇来自弗吉尼亚里士满大学 (University of Richmond) 的论文, 报告了他们大学的博物馆与拉美文化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 共同开展针对特定社区的拓展活动。

在 AAMG 和 UMAC 组织的会议上, 总能呈现丰富的资料, 此次也不例外, 本文收录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意识到, 在这样一个专业化程度高且工作强度大的行业, 并不是所有专家都便于或是想要发表他们在会议上展示的内容。举例来说, 迈阿密会议上有一场精彩的圆桌会谈, 主题是“盗窃文化: 与法律和博物馆相关” (Stealing Culture: The Intersection of Law and Museums)。在时任 AAMG 财务主管、田纳西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美术馆 (Vanderbilt University Fine Arts Gallery) 馆长约瑟夫·梅拉 (Joseph S. Mella) 的主持下, 与会嘉宾从两个角度探讨了大学博物馆的藏品: (1) 未来的大学博物馆如何收藏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缺少文献记录的私人藏品, 有关藏品来源、文化财产权和赝品伪造的问题可以预先建立在研究、教学和展示的基础上; (2) 如果现有馆藏被盗或被劫, 大学博物馆应当如何应对。由于参会者分别拥有不同的行业背景 (包括法律、博物馆学和艺术史等), 这场会谈涉及的观点异常丰富, 有助于指导博物馆通过改变政策来更好地保护自身及其文化遗产, 通过与社会之间的合作来共同推动双赢的积极变化。这类问题非常复杂, 而且可以从多个视角进行解读和阐释, 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内加以提炼和归纳。

在当下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我们需要为探索相关问题做好准备, 大学博物馆的实践研究领域更是如此。这也是 UMAC 期刊为何在未来将采用开放式选题的原因 (LOURENÇO et al. 2017, SIMPSON et al. 2019)。正如上文所述案例, 我们在国内和国际性会议中所涉及的很多话题, 仍然处于开放讨论中, 而且往往会跨越不止一次会议。未来 UMACJ 也会继续以发表论文摘要的形式为大家传达每次会议的精华, 具体形式可参阅今年早些时候我们首次发布的京都会议报告。

今后 UMACJ 将继续作为国际博协下属国际委员会 UMAC 发行的期刊, 维持同行评议的在线期刊形式。我们将发表来自全球的博物馆学及与博物馆实践有关的原创研究论文。UMACJ 发表的文章, 应是主要围绕高等教育背景下的博物馆学理论概念和 / 或组织理论, 此外也会加入一些探讨高等教育领域最新学术发展的文章。当然, 我们也不会拒绝任何有明确理论框架的个案研究论文。我们的编辑委员会随时欢迎专家学者的原创供稿, 并将尽量做到 3 个月内予以回复。此外我们也欢迎来自 UMAC 国际会议和其他相关国际或国内会议的稿件, 并会主动向部分作者约稿。不久的将来, 我们将在 UMAC 官网上发布有关本刊和投稿方式的全部详细信息。本刊将始终保持在线、开放的形式, 并且提供给所有人免费下载。

本刊的目标是成为高等教育博物馆、馆藏研究和学术研究领域的一流期刊。我们将努力以包容的态度和国际化的视野, 提供有关全球大学博物馆、美术馆及其藏品有关的分析和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鼓励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和辩论。如您认为本刊有所裨益, 并希望给予支持, 请加入国际博协, 并选择 UMAC 作为您参加的委员会!

根据迈阿密会议后的反馈和参会者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 AAMG 的大多数会员和分支机构都非常重视与国际同行建立联系、分享经验和相互学习。我们希望 2018 年的会议能够促进未来的合作伙伴关系, 正如此次一样, AAMG 和 UMAC 将继续携手打造新的合作项目, 期待双方相互激励, 共同为大学博物馆这样一个特别的行业作出更多贡献。

当然, 我们也非常期待未来能收录更多来自 AAMG 会议的具有多样性的高质量论文。



### 参考文献

LOURENÇO, M., ROTHERMEL, B. & SIMPSON, A. 2017. Introduction: re-evaluating the discourse on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9, 7-8.

SIMPSON, A., FUKUNO, A. & MINAMI, H. 2019.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as cultural hubs: the future of tradition.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11, 1, p. 9-12.



# 勇于思索： 大学博物馆及其藏品 是世界进步的变革动因

## 大会演讲：我们的重要性



# 大学博物馆：“走钢丝”的机构

Lyndel King / 文

骏仁 / 译

身处大学校园的环境中，可以与各种新鲜事物接轨，随时了解最炫的技术、最潮的发型、最流行的音乐和最时尚的活动。

对我们这些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来说，2016 年 11 月的美国大选结果可谓出乎预料。与当时大学校园里的许多人一样，我们也确信自己所秉持的价值观，包括对多样性、包容性和社会正义的看法，能够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认同。我们的博物馆也是校园周边居民的投票点。选举日的当天，我们有工作人员自豪地身着“我已投票”的标识在博物馆门前合影留念。作为以女性为主的工作群体，我们当时非常确信将迎来美国第一任女总统，并感到特别自豪。当然，之后的事实证明我们错了。而第二天的早上，我们博物馆的门外就发生了学生组织的游行。这次游行的主题是鼓励包容，学生们能选择在博物馆集会，让我们也颇感荣幸。

尽管这一变化很早就已开始，但我还是认为 2016 年大选的意外结果加深了我们的疑问，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大学博物馆）究竟是什么身份？至少在我们所处的校园内，激进的行动主义（activism）达到了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最高峰。





我们开始更迫切地想要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在较早的时候，大约 10 年前，我们心中最基本问题依然是：“我们应该为谁服务？”当时我们认为问题的答案在于我们与大学以及外界社区之间的关系。举例来说，关于应该更多地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服务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K-12 students）还是大学校园里学生的问题，就困扰了我们许久。当然，如果给到足够多的经费和人手，我们可以两者兼顾。在条件无法保证的情况下，提供我们经费资助的个人、政府和企业基金，往往还想知道我们能为多少学校或者小学生提供服务？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这些来源的资金正迫使我们按照某种套路开展工作。

对于很多大学博物馆而言，上述问题或许依然值得斟酌。举例来说，某个小镇上的大学博物馆可能是这里唯一的博物馆，也就是唯一能为所有 K-12 学生和公众提供博物馆服务的机构。

不过如今，对于我们这样的博物馆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显而易见。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大学生的艺术欣赏水平很可能与高年级的小学生差不多。我们仍然会为 K-12 学生提供服务，但是我们知道自己的资源有限，想要面面俱到，可能每件事都做不好，因此我们会选择一些学校作为重点服务的对象。我们还知道，只要展览项目足够有趣，公众自然就会前来参观。但如果说到最紧迫的问题，我们还是认为要吸引更多的大学生观众来参观，并将其视为博物馆事业的重要一环。我们最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每天都会经过门前的 2 万名大学生，而他们中的不少人很可能至今仍未涉足过任何一家艺术类博物馆。

与过去相比，我们现在更了解如何将资源服务集中于目标受众，也就是说我们更清楚应该为谁服务了。

可是在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却又面临着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大学博物馆）究竟是什么身份？”（What are we?）

各种市场调查或文章，甚至我们自己的同事都在不断地告诫我们要保持“现实意义”（relevant），否则就会被淘汰。但如何才能具有“现实意义”呢？或者说艺术博物馆本身还符合时代吗？我演讲的内容主要针对艺术博物馆，是因为我对这类博物馆最为了解，但是我认为本文的内容也同样适用于大学校园里的大多数其他博物馆。

其实图书馆比博物馆更早面临“现实意义”这一问题。我曾在《明尼阿波利斯新闻报》（Minneapolis newspaper）上读到一位读者来信，感叹图书馆已经开始与“书”无关了，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很久以前，学校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将自己的头衔从“馆员”改成了“媒体专家”（media specialists）。一位图书馆的馆长最近写道，“图书馆这个行业正面临着身份危机，因为如今的图书馆正试图成为能为所有消费者提供一切服务的利基市场（niche）”。我住所所在当地的县图书馆馆长曾告诉我，他们目前需要“尝试各种可能”。某个在线图书馆期刊也宣称：“我们绝不需要那种老旧刻板的图书馆，一个面色苍白、沉默寡言的图书管理员，看守着一堆满是灰尘的‘图书’。社会已不再需要那些过时的图书馆和图书管理员了。”<sup>1</sup>

面对挑战，图书馆行业的解决方案是“尝试新事物”（trying stuff），而“创客空间”（maker space）就是其中一个很流行的“新事物”。具体而言，“创客空间”是指通过创新方式鼓励人们动手参与科学、工程，以及纯粹“探客”（tinkering）项目的相关设计、试验、建造和发明。有的图书馆为读者提供配备有视听设备的创意实验室用以制作和编辑视频，其他图书馆则为读者提供 3D 打印机、乙烯基切割机和激光切割机，甚至有一家图书馆还提供织布机供读者尝试。如今许多图书馆都配备了大型会议室和教室，而这些空间又大多拥有视频会议功能或数字投影系统。还有一些图书馆甚至设有带露天看台座位的戏剧表演场地。

下面我们将目光转向另一个延续至 20 世纪的美国机构类型——教堂。在我尚未成年的时候，无论从属哪个教派，大多数的教堂都要传颂上帝和永恒的救赎。没错，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很多教堂都会提到同情的作用。但从总体来看，传教士的目标是帮助异教徒找到救赎和永生的途径，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帮助他们改善当下的生活条件。

然而如今的很多教堂似乎已将行动主义（activism）而非灵魂救赎（salvation of the soul）视为第一要务。当驾车穿过社区时，我还能看到在许多教堂外宣扬宗教救赎的宣传

<sup>1</sup> “21 世纪图书馆博客”（21st Century Library Blog）。参见 <https://21stcenturylibrary.com/2014/02/03/why-do-we-still-need-libraries-we-dont/>（访问日期 2019 年 9 月 11 日）。



牌,但我也能看到同样多的教堂宣称自己肩负着维护社会正义的使命。甚至神学院院长都曾以《社会正义与福音:何谓教会的核心使命》(*Social Justice and the Gospel: What is the Core Mission of the Church?*)<sup>2</sup>为题撰写过文章。

当然,对于某些教会来说,社会活动并非什么新生事物。很多宗教领袖都曾积极参与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然而,随着各种问题的不断出现,很多时候参与社会运动的早已不仅仅是当年和马丁·路德·金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一起参与游行的社会运动领袖了。

教会现在会派传教士帮助建设学校,会发表有关社会运动的意见声明,建设社会行动主义(social activism)的电邮网络,致力于“分享社会正义理念、建设社区性非营利组织和开展政治宣传”,包括“假如女性消失一天”(A Day Without Women)集会和“人类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活动等。此外,还会向国会递交有关社会政策的请愿书,或是开展名为“过渡期女性帮扶中心”(Center for Women in Transition)的筹款活动。

博物馆也面临上述类似的问题。对所有博物馆而言,一直以来的传统使命就是收集、保存动物标本、活体、科学仪器或艺术品等各类藏品,并加以解释和说明,也就是说博物馆是因藏品而存在。在大学校园里,博物馆有别于其他教学场所之处就是藏品。可以说藏品是博物馆根本价值的所在。许多馆长非常重视馆藏,他们会将自己任内征集到的博物馆精品馆藏视为自己的宝贵遗产。

几年前在参加一次博物馆研讨课时,我提到了有些馆长会将藏品看作是留给社区的遗产。当时很多学生礼貌地告诉我,他们并不在乎我说的藏品,而是更希望博物馆能举行各种活动,提供讨论的平台。甚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馆长格伦·洛瑞(Glenn Lowry)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我在参加一次美术馆馆长会议时听到这位馆长宣称:“20世纪是属于收藏的百年,但21世纪的博物馆可能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承载着各种活动项目和社会事件,以及研讨和辩论。”一段时间以来,这位馆长还一直主张通过出售藏品来为项目计划筹措资金。

那么,如果连图书馆都已经放弃了实物对象(即书籍),博物馆是否也应该如法炮制呢?如果是的话,我们的藏品该怎么办?

与上述变化相关的记载最早见于斯蒂芬·威尔(Stephen Weil)于1999年在《代达罗斯》(*Daedalus*)上发表的一篇具有开创意义的论文(WEIL 1999)。威尔在文中记录了他所发现的当时美国博物馆行业有改变传统使命的迹象。许多博物馆甚至不愿再提及自身征集和保管藏品的职责,即使提及到任何实际的物品,也只是出于某种目的的使用。在同一篇文章中,德高望重的博物馆顾问伊莱恩·休曼·古里安(Elaine Heumann Gurian)还提出博物馆的精髓并不在于其藏品。在她看来,藏品和戏剧里的道具一样是必要的工具,但只有工具是远远不够的(GURIAN 1999)。

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公共图书馆(Portsmouth Public Library)曾公开宣称其使命是满足社区对信息资讯、教育和娱乐的需求。<sup>3</sup>这样的使命宣言是否也适用于博物馆呢?我们是否可以放弃艺术而拥抱信息?既然就连教会都可以将社会运动而非传教视为第一要务,我们是否可以暂时搁置艺术,不再引导人们去了解和热爱艺术呢?为了让观众觉得我们具有“现实意义”,就必须舍弃那些一直以来被视若珍宝的藏品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家让我们更容易思考这个问题。如今的艺术愈加概念化,更多是为了表达和传播理念,而很少注重实物创作。在这种潮流下,博物馆将轻易放弃绘画和雕塑,转而收集一些与时事或政治运动有关的信息、说明或材料了,毕竟当下很多艺术家已经比过去更积极地投身到政治活动中。今后也可能不会再有艺术家像当年的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那样在谈论自己作品时给出一句“所见即所得”了。<sup>4</sup>

所以,一旦明确了大学博物馆就是为学生而建的,那么博物馆自身究竟是什么?我们该怎样做才能保持“现实意义”呢?毕竟没有人希望成为“覆满灰尘的书籍背后那个安分又呆板的图书管理员”的。

2 参见 <https://www.michaeljkruger.com/social-justice-and-the-gospel-what-is-the-core-mission-of-the-church/> (访问日期 2019 年 9 月 11 日)。

3 参见 <https://www.cityofportsmouth.com/library/about-us> (访问日期 2019 年 9 月 11 日)。

4 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 1964 年接受罗森博格(Rosenberg)采访时所说的话(1983)。





如今的大学博物馆正面临着系列严峻的挑战。年轻的博物馆员工对校园运动充满了热情，他们希望成为风暴中心，充当旁观者甚至是召集人都不能让他们满足。想要有“现实意义”，我们就必须成为积极的活动家。我们应当关心政治，但不必拥护某个党派（尽管如今很难将激进的行动主义与党派意识区分开来）。我们需要保持敏感度和“觉醒”（woke）的状态，并随时采取相应的行动。

那么，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是否会有陷阱呢？我们如何协调当下在校园和博物馆里讨论的包容性理念与政治立场的关系？尽管我们策划展览的初衷是为了激发讨论，但如果展览的主题富有争议，是否存在只有那些明显认同立场的观众才会前来参观的风险？随着社会中的孤立现象日益盛行，我们是否也在冒着被孤立的危险？

2018 年的博物馆馆长会议（museum director's conference）期间，伊莱恩·休曼·古里安曾提及她正在乌克兰协助建设的新博物馆，主题是记录 2014 年发生的那场危机。她很想知道博物馆是否欢迎当年没有参与推翻政府的人来参观。像这样具有政治立场的博物馆是否在某种意义上违背了我们对包容性的追求？我们是否应该欢迎政治上的“他者”（other）？我并不是说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欢迎“贩卖仇恨者”（hate mongers）前来，但是作为讨论的场所，我们需要考虑如何能让持有异见者也敢于参与其中。

当我们通过掩盖或呈现移民艺术家的作品，以抗议当前政府的所作所为时，是否意味着我们违背了包容性原则？我们是否只对关注特定种族、性别或政治群体的不公正现象的演讲者感兴趣？然而如果不在展览和项目里表明任何立场，我们是否会有“失去意义”的风险？这样做是否表明我们没有道德判断的能力，只希望做个旁观者？所有人都想做“正确的事”（right thing）。尤其在校园里，我们都希望按照使命行事，而这个使命又与大学的教育环境紧密相连。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在“走钢丝”（walk a fine line）。

位于纽约的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被要求移除某位艺术家的作品，原因是她本人并不属于作品所描绘的文化群体。我所在的博物馆也曾就是否撤下一幅非常有趣的 Works Progress Association（WPA）的绘画进行过深入讨论。这幅作品的内容让一些观众产生反感情绪，因为可能被解读为描绘了一个“黑人混血小孩”（little black Sambo）的形象。我们可以从作品创作年代的角度来解释内容的合理性，但考虑到当下的舆论环境，这样的解释很可能是白费口舌。明尼阿波利斯的沃克艺术中心（Walker Art Center）则被要求摧毁馆里的一座公共雕塑，原因是这件提醒人们注意私刑危害的雕塑伤害了某些原住民的感情。

所有上述案例中，博物馆的出发点都是善意的，但结果却大相径庭，这往往取决于博物馆所在的社区。这令人不禁想起一句古老的谚语：“通向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就”（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今天，善意将我们带进了困境，看到自己的展览内容或活动项目不能被人理解，甚至为人所曲解，是种非常让人抓狂的体验。即使那些批评者并非文物生产者的直系后代，他们也能指摘文物展品说明牌上所标注的属于人类遗产的字样。这些文物制品难道只是其创造者所属的某个特定文化的遗产吗？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于古代的陶器，无论是美国原住民、古希腊人还是古罗马人所使用的，这些全都是从墓葬里发掘出来的。

更有甚者，认为博物馆里展出有文化制品，那我们就是宣扬殖民主义（colonialism）的工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和诠释这些藏品呢？难道说它们已经不再是可供学生欣赏和学习的艺术品，而仅仅是殖民主义暴行的象征物——又或者藏品的内容或曾经的拥有者又代表着某种邪恶势力？我们果然又被逼到了“钢丝”上。

以下我要再次引用伊莱恩·休曼·古里安在 2018 年提交给美国艺术博物馆馆长协会（Association of Art Museum Directors）的论文《竭尽全力》（*Do Everything*）<sup>5</sup>里的一句话：“但即使在美国真的需要采取抗议行动，那博物馆是适合付诸实施的场所吗？”她接着提到自己相信博物馆在本质上具有居高临下的姿态，并建议我们摒弃这种想法，更多地致力

5 根据美国艺术博物馆馆长协会 2018 年明尼阿波利斯会议（2018 Minneapolis meeting）“教育与社区问题”（Education and Community Issues）的讨论议程。



于包容、欢迎和接受更多人。在我看来，整个博物馆行业都已经或是正在按照她所说的去做了（或至少我们自认为如此）。但如何才能实现目标却成了让人头疼的问题。伊莱恩·休曼·古里安在文章中又继续提出，也许博物馆回应行动主义最直接的方式是举办“坦诚相见”（in your face）的展览，这些引人瞩目但并不鼓吹社会变革的展览“将支持者与非支持者分开，且通常只有支持者会参观展览”。

我还相信，我们有时实在是太过沉迷于大学校园里公开讨论的社会正义问题，以至于忍不住要突破印第安纳大学（University of Indiana）历史学教授爱德华·林纳塔尔（Edward Linenthal）所谓的“非军事区”（demilitarized zones）。他曾表示：“我确实认为博物馆就像是文化战争中的‘非军事区’。毕竟大部分人在博物馆里都会表现得注重礼节，并且更愿意三思而后行，至少不会像在谈论政治或竞选人，或是其他任何烦心事那样容易被激怒。所以我认为博物馆的一个真正作用，就是让人们能有作为避风港的‘非军事区’。”<sup>6</sup>

2010 年，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毕业典礼的致辞中，曾警告大多数的大学校园有成为“空中楼阁”（living in the bubble）的危险。他指出：“……研究表明，如果我们总是只选择接受与自己看法一致的观点，那么就会变得偏执，整个社会将两极分化，政治分歧愈加严重。但如果我们能更积极寻找、虚心听取那些不同于我们观点和信仰的意见，或许我们就能开始理解那些持不同意见者的想法了。”<sup>7</sup>

我想更进一步地说，长期处在大学校园这种“空中楼阁”的环境中，让我们习惯了所有事情都可以公开讨论的想法（没错就是任何事），乃至我们都忘了现实世界其实并非如此。

在美国，尤其是一些农村地区，父母们往往会哀叹孩子在上了大学以后完全变了个人。离家时还能和父母谈心的孩子从大学回来之后，很可能再也无法和父母谈到一起了，甚至有些孩子一去就不再回来。在我们父母那一代人看来，高等教育是受人尊敬的，如今却可能被看作是撕裂家庭和社区的力量。我们真的是走在了“钢丝”上。

市场学研究告诉我们，人们参加文化活动的其中之一是为了减压。大学校园里专门设有为学生“减压”的服务区域，我们知道大学卫生服务机构里的心理医生数量超过了普通医师。然而吊诡的是，校园自杀率和酗酒人数却仍在不断上升。既然博物馆是一个减压的地方，那么为何要向人们揭示他们曾经欣赏过的精美艺术品的背后，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暗黑历史，或曾归属于腐朽的官僚、种族主义者或是某个江洋大盗呢？

我完全不反对从新的角度诠释博物馆，并且坚信这也是让我们的藏品保持“现实意义”的一种方式。但是这里的“底线”在哪里？我们能减轻学生的竞争和考试压力吗？如果说我们处的大学就是一个摧毁美洲原住民社会和压榨奴隶的文明所建立的机构，那么我们还能坦然面对学生，并成为他们避开信息轰炸的“净土”吗？

我并不是建议博物馆应当保持沉默或不参与任何运动和抗议，但我偶尔还是会很想念上大学时去博物馆沉醉于精美艺术的那段时光（也许是时候再戴上一次我的恐龙面具了）。

在大学校园里我们经常就“觉醒”（wokeness）一词进行辩论，包括与藏品的关系，还有和与之相关的行动。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曾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专栏文章，给出关于“觉醒”的有趣定义：“在固有思维框架下，你会尝试客观地感知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可能是激进的也

6 爱德华·T. 林纳塔尔接受雅各布·加登华兹（Jacob Gardenswartz）的采访，“专家解读博物馆是如何悄然成为抵制特朗普总统的地下领导组织”，Vox，2017 年 4 月 21 日。参见 <https://www.vox.com/policy-and-politics/2017/4/21/15331340/museums-resistance-president-trump>（访问日期 2019 年 9 月 11 日）。

7 参见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0/05/01/obama-michigan-graduation\\_n\\_559688.html](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0/05/01/obama-michigan-graduation_n_559688.html)（访问日期 2019 年 9 月 11 日）。



可能是温和的，可能是保守的也可能是自由的。人们根据方案的性质来做出判断。不过‘觉醒’这个词就是把感知揉进了方案本身。事实上，‘觉醒’的意义更在于强调你如何看待现状（即唤醒自己对错误的感知），而不是究竟打算怎样去做。“被唤醒”意味着看到了一切的不公。‘觉醒’没有‘度’的概念，无法衡量，多清醒一点总是好的。但‘觉醒’也意味着‘指出任何可能存在的缓解要素都是天真（naïve）和幼稚（childish）的，是对现状的一种补充。”<sup>8</sup>

一旦我们“觉醒”了，认识到校园里许多建筑物都是以公认的种族主义者命名的，而学校的董事会又投票反对更名，作为博物馆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或者我们发现所在的大学（乃至我们脚下的土地）都是从美洲原住民那里抢来的，我们又该如何回应呢？立刻下决心去赎罪吗？但作为博物馆，怎样做才能弥补祖先掠夺他人土地所犯下的罪孽呢？

在参加校园论坛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惊讶地发现，博物馆已被列为校园里酿成社会不公的始作俑者了。我们展示的是从墓葬里挖出来的东西，所以理应遭到唾弃和诅咒。我们感到非常内疚，毕竟作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我们习惯了站在正义的一方。尤其当看到博物馆门前的人行道上喷涂了“警告擅闯达科他人领土”的字样时，这种内疚感就更强烈了。我们怎么会成为压迫者了？我们坚决捍卫民权。我相信博物馆里的每位工作人员都会表示，我们将坚定捍卫被剥削者的权利。我们怎么可能是压迫者。我们尤其支持艺术家创作的权利。我们，作为博物馆的一员，甚至在法庭上为摄影家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进行辩护，他的作品展触碰了一些敏感的神经，但我们只知道他的作品是艺术，而艺术是美好的。<sup>9</sup>

然而，也许最快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抛弃所有的藏品，成为和图书馆一样的交流和讨论社会问题的场所。让我们头疼的麻烦，不就是这些恼人的藏品吗？这些需要精心呵护的宝贝居然因为内容或历史的原因，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没错，我们又“走在钢丝上”了。

好了，我们换个话题，谈一下包容性（inclusion）和无障碍（accessibility）这两个概念。要说这是当下校园乃至整个社会上的流行词汇，我想没人会有反对意见吧。许多大学甚至专门任命了负责处理包容性事务的副校长。这里我要再次引用爱德华·林纳塔尔说过的一段话：“如今很多博物馆里至少有一部分人是行动主义者——我所指的是参与有益的公众文化运动和对话，我建议博物馆必须拒绝臆想，分享重要的真相，并且保证所有人都能毫无障碍地获知这些真相。”<sup>10</sup>

就“欢迎”或“无障碍”这两个常用词语而言，我同意伊莱恩·休曼·古里安的观点，这一定意味着也必须欢迎那些我们蔑视的人。她曾说过：“尝试去理解持异见者，或是从他们身上寻找人性的真善，往往会陷入道德困境。但我们讲述的故事和展示的物品，应该是我们和他们共有共享的。我们需要掌握好分寸，认识到任何博物馆都不应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sup>11</sup>

大学校园里的博物馆其实是个非常不讨好的行业。我们身边的观众是一群充满理想并且坚信自己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年轻人。我们要保管好藏品，还要对所隶属的教育机构负责。

在我描述了所面临的困境后，我猜您一定在想，我们可以具体地做些什么来帮助员工度过难关呢？我们该如何决策呢？我的同事，来自沃克艺术中心的奥尔加·维索（Olga Viso）认为，除了无私的奉献精神 and 毅力以外，更重要的是甘愿承受种种的不愉快。<sup>12</sup>

8 大卫·布鲁克斯：《“觉醒”的问题》（The Problem with Wokeness），《纽约时报》2018 年 6 月 7 日。参见 <https://www.nytimes.com/2018/06/07/opinion/wokeness-racism-progressivism-social-justice.html>（访问日期 2019 年 9 月 11 日）。

9 阿历克斯·帕莫尔（Alex Palmer）：《艺术与法律之争和最终的胜利》（When Art Fought the Law and Art Won），2015 年 10 月 2 日。参见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when-art-fought-law-and-art-won-180956810/>（访问日期 2019 年 9 月 11 日）。

10 林纳塔尔，同上。

11 来源美国艺术博物馆馆长协会 2018 年明尼阿波利斯会议“教育与社区问题”的讨论议程。

12 参见 <http://www.nytimes.com/2018/05/01/opinion/decolonizing-art-museums.html>（访问日期 2019 年 11 月 18 日）。



当然，我在工作中也曾有过不快，这其中就包括在一位糟糕透顶的副总裁手下工作，但在绝大多数不那么自在的情况下，我始终坚信自己的初衷是正当且善意的。但是现在，我们陷入焦虑之中，不能肯定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都开始怀疑这世间究竟还有没有所谓“正确的”行事原则。

再次向伊莱恩·休曼·古里安表达感激之情，本文的许多观点都来自她的论文。

作为博物馆的从业人员，我们可能会扪心自问：

- 我们是否在展览或其他活动项目中，为人们预留了表达意见的途径？
- 前述途径是否易于人们发现和使用？
- 我们在策划项目时是否调研过比举手或起立效果更好，且更容易鼓励观众提问或表达观点的技术手段？
- 如果我们知道一个展览违背了某些观众的信仰，是否应该告诫提示（类似于警告裸露或暴力内容的提示）？
- 如果有人指责我们过度审查、过分屈从于少数族裔的敏感性或政治正确性，我们应该作何反应？
- 如果有人提出与上一条相反的指责（例如没有照顾到少数族裔的情绪），我们又应该作何反应？
- 我们对自己的决定能否给出充分的理由，我们的一线员工、讲解员或导游是否了解这些理由？
- 面对质疑时博物馆是否愿意改变原有立场，还是坚持不做任何的调整或“退让”？
- 我们如何使用坦率且委婉的语言来撰写说明文字？在面向公众的展览中，如何承认我们还有“未知”？

最后也可能最具难度的问题如下：

- 我们是否就“博物馆是什么身份”这一问题与员工开展过大胆的讨论？
- 我们是否做出慎重的决定，将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抑或继续充当“集会辩论的非军事区”，或是提供思考 and 精神的“避风港”？我认为当学生和学者都强调所有的博物馆都应持有自己的立场时，要想避开政治活动已是不可能的了，大家最好放弃保持中立的幻想。
- 那么作为一个机构，我们是否有自己的立场，这个立场是什么，我们是否应该予以公开？
- 我们是否知道这一立场将会怎样影响我们的决策？
- 我们能否确定所有的员工、领导都同意这一立场，并愿意公布与众？我们的讲解员和一线员工是否理解前述立场，并愿意向观众进行解释说明？
- 我们所说的“包容性”，是否只适用于赞同我们立场的人？

我绝非是在说我们不应该拥有立场，只是认为我们应该了解、承认、接受自己的立场，或是加以改变，同时对其潜在的后果应有清醒的认识。在当今世界，哪些立场很可能会被打上政治性的标签？我们能否接受这一现实？

博物馆的形态以及保持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最终还是取决于我们的行动。可以选择的道路很多，但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意义。无论博物馆是什么身份，在 21 世纪重新燃起的文化战火中，我们都将身处斗争最为激烈的前线。

要想保持“存在感”和“现实意义”，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了解自己的身份、存在的意义和未来的使命。





### 参考文献

GURIAN, E. H. 1999. What Is the Object of This Exercise? A Meandering Exploration of the Many Meanings of Objects in Museums. *Daedalus* 128 (3), 163-183.

ROSENBERG, H. 1983. *The Re-Definition of Ar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EIL, S. 1999. From Being about Something to Being for Somebody: The Ongoing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Museum. *Daedalus* 128 (3), 229-258.

### 联系方式

Former Director Weisman Art Museu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E-mail: kingx001@umn.edu



# 大学博物馆宣言

William Underwood Eiland / 文

骏仁 / 译

最近，也许是从业 30 年来的反思，我一直在思考所供职的博物馆乃至所有大学博物馆正面临的挑战。身为佐治亚州南部杰基尔岛博物馆管理协会（Jekyll Island Museum Management Institute）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每年都会主持一场面向博物馆行业未来发展的工作坊，在会上我都会请参与者谈论自己所在的博物馆以及整个博物馆行业中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参与者每年给出的答案总是让我深感意外。课程的规模通常为 20~25 人，参与者很少有来自学院或大学的博物馆，但他们关心的问题，除了渴求更多、更好的培训资源外，与我在博物馆领域专业研讨会上听到的那些想法不谋而合。然而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对于我们这些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来说，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些显而易见的担忧在培训课程和整个业界中都被无视。因此今天我想暂时放下有关博物馆未来的问题，更加专注地和大家探讨当下正在威胁博物馆行业的种种严峻问题。

博物馆业界以及新闻界的很多人都认为，对各种类型的博物馆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公众信任（public trust），包括对机构的信心、对职责的定义，以及博物馆如何应对当前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时的态度。在公众信任方面，人们关注的具体问题包括高管薪酬、



藏品出售处理、去殖民化、稀缺资源、多样性,以及实物和知识的获取渠道等,他们并不在意关注的对象是否属于大学艺术博物馆。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发言者面对参会的艺术博物馆馆长们直截了当地提出,“博物馆应当和高等院校一样,更多地考虑自身在公众信任方面的问题。”我们为何会在公众信任方面受到如此多的质疑?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人始终认为我们是为提供赞助和捐助的 1% 的有钱人服务的机构;另外一点则是在民主的制度下,随着民众多样化和自我教育需求的提升,人们希望博物馆能够跟上甚至领先于国家人口变化的形势。坦率地说,我指的就是博物馆应对各种社会和政治倾向的能力,而这些倾向又来自不同的阶级、地域、年龄、种族和性别认同,以及各种其他差异,包括城乡差异、大型与小型博物馆的差异、公共与私人博物馆的差异、中小型和大型机构在财政和人力方面的差异、教育程度高低的差异,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我们服务型社会两极分化的特征,其中还包括根深蒂固而且在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和由此产生的怨恨情绪。

当然,针对上述问题,我们的博物馆领导们也给出了回应,那就是公共信任等于公共责任(public responsibility),即博物馆也应该遵循社会企业家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而我们一直以来所坚持提倡的包容性原则已经落后乃至脱离了时代潮流,甚至于很多人将多样性视为陈词滥调,将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视为一种不值得提起的旧有观念。在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大行其道的当下,即使你不同意前述观点也很难找到理由去反驳。鉴于艺术家们会关注于各种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包括割礼陋习、俄罗斯女同歧视的传闻、印度的女性火刑、性奴贩运、种族灭绝、人类文化遗产破坏、地球退化、气候变化和移民等,博物馆也自然必须去关注这些被认为属于战争思潮或流言的内容。不论是否出于自愿,我们都必须去反映各种全球性问题,并有责任和国际同行携手阻止文化的破坏与退化。

在之前的一次会议中,我们曾探讨过如何让今天那些不太了解过去的观众能看懂和接受传统的或历史类藏品。在一些批评者看来,这些藏品不过是大学和博物馆为了迎合少数不食人间烟火的学者而囤积居奇的“秘宝”而已。在这样一个社会意识主导的时代,似乎很难再有人能静下心来真正去了解和认识一件艺术品,去遵循科学求真的道路,去亲身体验和诠释历史的证据。据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就曾将历史定义为“破事儿一件接着一件”。到了今天,各种理论家几乎每天都在为不同的“破事儿”激动,并将其称为前所未有的变革。思想家运用咄咄逼人的历史决定论(aggressive historicism),评论着自己未曾见过的事物,未经分析就将其定义为压迫的代表物或象征,更遑论进行任何更深入的研究或阐释了。

公众信任等于公众责任。作为遵守道德守则、职业操守、认证标准,以及服务公众的专业性组织,博物馆已经确立了基于平等的价值观。让馆长满意早已不再是唯一的目标,在我们看来自己应该服务于“以任何理由前来参观的人,也就是所有的人”。为了能吸引更多的观众,我们有时不惜绞尽脑汁讨论话题。举例来说,免费入场就是一个争论的焦点。一方面,有人坚持认为门票是违反平等主义原则的,至少对某些边缘化和被忽视的群体来说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也有人坚持认为“不付出就能获得,代表这件东西没有花费时间的价值”。简单而言,完全将参观博物馆贬低到以金钱的价值来衡量,而不是从思想和变革的角度来看待。

迄今为止,文化战争正裹挟着政治分裂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复燃。有时左右两派似乎都在密谋压制象牙塔内外的学术自由。校园里的博物馆也不能幸免,鉴于目前各种真假信息漫天飞舞的现状,即便身处象牙塔中的我们也不可能避开审查制度和思想压制的影响,有时也会因害怕报复性惩罚而放弃部分自由。高等学校的博物馆理应做得更好,我们必须直面这些挑战并找到必要的平衡,以保证学习和创造的火苗不会被任何反对的声浪所压制或扑灭。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谨慎地对待各种相关决策,包括项目规划、企业赞助、递交联盟的审查程度,以及我们活动的开放性。只要秉持机构的价值观,我们愿意保持透明度。

“藏品注销”(deaccessioning)这样一个电脑拼写检查都不认识的词,却经常见诸《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甚至是《国家询问报》(*National Enquirer*)。尽管有关监督藏品维护的白皮书已经发布,并且美国的大学博物馆和美术馆协会(Association of Academic Museums and Galleries)也公布了相关准则<sup>1</sup>,博物馆的理事会和支持者依然有责任更进一步理清相关脉络,否则就是对观众的不负责,尤其是他们中的很多人还信任博物馆,认为我们是有能力管理和保存地方或国家遗产的公共机构。在这个方面我所担心的并非专业水平,毕竟行业公认的最高标准和最佳做法就是将藏品出售所得用于购买新的藏品——真正让我担心的是持续出现的博物馆及其员工的腐化现象以及公众信任的持续丧失。我想指出的是,尽管“藏品注销”是本段的关键词,但其他问题也正在蔓延到这个领域,导致不断的分化并形成特殊的利益群体。无论对其采取什么态度,我们所有人其实都已经身陷前述趋势之中,其中就包括艺术博物馆馆长协会(Association of Art Museum Curators, AAMC)以及新成立注册的组织。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美国国家委员会表示,将更限度地与美国博物馆联盟(AAM)分离,并选择了一条我认为能实现双赢的正确路线,即在签订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继续就各自独立的目标以及共同的目标开展各种合作。

近期的指标数据表明,尽管全美最大的几家博物馆的观众人数再创新高,但中小型博物馆的观众却在减少。在我看来,稳中有升的客流,对于大学里的博物馆而言至关重要,因为这里是世俗与学术汇聚的地方,是普通民众和学生可以共享的专业级教育和学习平台,博物馆里的每一件物品,包括美术馆里的画作、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新式透景画、历史建筑的工艺制品,以及动物园里的蜥蜴(skink)和植物园里的卡巴哈百合(Cahaba lily)等受到人类威胁的动植物,都同时具备内在价值和变革动因。面对观众,我们要体现出超越象征意义的实际价值,这样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共同完善博物馆在校园内外环境里的制度化建设。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NEA)的一份最新报告<sup>2</sup>表明,除观众总量减少以外,另一个更让人担心的是“人们对文化组织的忠诚度有大幅下降”。该报告还援引论据指出:观众们希望通过文化活动获得社交和娱乐体验,而“千禧一代”(millennials)更是喜爱混杂各种文化要素的活动,包括线下活动和基于手机等的线上活动。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秋季我曾与一位大学新生通过信,出生于2001年的他认为“千禧一代”已经是“旧人”了。他表现出有点不合群,我也不知道他是否能代表新一代的学生,更偏爱其他文化参与形式。

事实上,我们可能需要平衡一下博物馆本身的定位,一方面它是交流的论坛,思考和感知的聚会地;另一方面它也可以成为独行者的驿站、专家的圣地和学生们的解压场所,能在这样一个为学习、教育、研究服务的建筑里使用免费的WiFi,喝上一杯咖啡,并享受着学习的乐趣,相信这也是高等教育具有吸引力的理想状态。

我担心的另一个问题,也是大家都应该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平衡在筹资时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而与之相关的是,如何补偿为教学活动付出额外时间的教师和策展人,以及为实习生提供薪金和计算课程学分。

作为一名出生在阿拉巴马,目前居住在佐治亚的美国人,我当然不会忘记提一下携带枪支的法律对校园里博物馆工作的影响。允许公开或是隐蔽携带武器的法律表明,即便此前曾是一个神圣的场所,但所有的公共机构都裸露于暴力威胁之下。在佐治亚州,就算是

1 AAMG《大学博物馆和美术馆专业实务》(Professional Practices for Academic Museums & Galleries),参见 <http://umac.icom.museum/wp-content/uploads/2017/05/AAMG-Professional-Practices-2017-v8-single.pdf> (访问日期2019年9月11日)。

2 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研究报告(59)《经营困难:影响艺术机构客流量的障碍与动因》(When Going Gets Tough: Barriers and Motivations Affecting Arts Attendance)。参见 <https://www.arts.gov/sites/default/files/when-going-gets-tough-revised2.pdf> (访问日期2019年9月11日)。



每周二的幼儿日活动期间，法律也允许人们隐蔽持枪进入博物馆。博物馆的馆长又该如何应对这种疯狂的行为呢？

天哪，我想说的问题实在太多了，而且其中还包括很多超出我职责范围的内容。无论如何，我还是想指出两个特别在意的问题。大学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包括管理员、安保人员、接待员和行政助理等在内的员工，是奠定我们机构的基石。我们这个行业的总体工资水平本来就不高，前述各岗位的待遇更是低得可怜。我所描绘的一切存在什么问题呢？这些员工所看护的是整个国家的遗产，但他们只能拿最低的工资，而且这些岗位的教育水平要求也很低。在防枪击演习都已经司空见惯的当下，我们还在沿用过去那种老旧的安保模式。

第二个问题则涉及我们信念体系另一个基石，亦即服务。我们会以服务的理念为借口，解释当前体制内存在的各种弊端：超负荷工作、薪水过低、牺牲个人时间，以及过度使用免费的学生劳动力。面对着可笑甚至是侮辱性的工资水平，所谓的服务理念、使命感和无私奉献精神，真的能够让我们的员工长期坚持下去吗？

针对这个问题及其意义，我想说的是学院教师对我们策展人的轻视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相比那些获得预备终身教职（tenure track）和终身教职（tenured）的同事们，佐治亚艺术博物馆（Georgia Museum of Art）的策展人出版书籍和发表文章的数量，以及参加专业协会会议的次数，其实都要超出很多。而这些终身教员还经常将我们的教育工作者称为保姆（babysitters），并把我们的编辑和作者称为学术界的“灌水者”（diluter），视为奶嘴文化（pap）的传播者，认作是语言沦落的罪魁祸首。我不得不承认的是，所谓“灌水者”的说法也许有些理据可循，毕竟有时候我们的“探索”（explore）或许会失败，“作品”（artwork）艺术或是为了照顾我们的观众，而不得不尽量采用更浅显的词语描述事物。例如，我们通过实施项目满足观众的“需求”（needs）。我想阿拉巴马州的一位女性的来信很能说明情况，她说她没有工作和住房，而且缺乏食物和金钱，但她还是很感谢我们能为她的孩子们提供受教育乃至获得更好生活的机会。

几年前，我曾与藏品特别工作组（collections task force）合作编制了《大学博物馆宣言》（*A Manifesto for Academic Museums*）<sup>3</sup>。《宣言》共有 15 条，参考了批评家霍兰德·科特（Holland Cotter）之前所作的评论<sup>4</sup>：“与威严肃穆的公共博物馆不同，不显眼的大学艺术馆更加充满活力，具有亲和力 and 符合时代的潮流。”尽管已经说了很多，我还是希望在这里重申一下当年撰写的宣言，毕竟其中的内容放在今天也没有过时：

1. 大学博物馆是大学教学、研究与服务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大学博物馆是连接市民与大学师生的桥梁。
3. 大学博物馆旨在鼓励、促进和传播学术。
4. 大学博物馆有助于培养科学家、人文学者和艺术家。
5. 大学博物馆会在不断求新的同时挑战固有观念。
6. 大学博物馆是探索知识、自由交流思想、启迪和参与的论坛。
7. 大学博物馆是高等院校的公众门户。
8. 大学博物馆教育和服务的对象，包括学生和各个年龄段在内的学习者。
9. 大学博物馆承载的文化资源，浓缩了人类历史与记忆中的文物、工艺制品和生命体。
10. 大学博物馆将始终坚持求真的原则。
11. 大学博物馆应代表公众保存和保护不可替代的藏品资产。
12. 大学博物馆并非存储仓库，其藏品会不断动态增长、变化和演变。

3 如上所述，这份《宣言》是应美国大学藏品特别工作组（American Task Force on Academic Collections）的要求，为凝练能让大众了解大学博物馆重要性的口号或“论据”（talking point）而编制的。最终我们定下的口号是“优秀大学的博物馆同样出类拔萃”（Great Universities Have Great Museums）。最终的宣言是经过大范围讨论的结果，参与讨论的关键人士包括来自 Kress 基金会（Kress Foundation）、美国博物馆联盟、认证委员会（Accreditation Commission）、美国艺术博物馆馆长协会，以及美国大学博物馆和美术馆协会的代表。明尼苏达大学韦斯曼博物馆（Weisman Museum）馆长林德尔·金（Lyndel King）协助我起草并完成了这份宣言。

4 霍兰德·科特：《大学博物馆的重要性》（*Why University Museums Matter*），《纽约时报》2009 年 2 月 19 日。参见 <https://www.nytimes.com/2009/02/20/arts/design/20yale.html>（访问日期 2019 年 9 月 11 日）。



13. 大学博物馆的求真之路既要符合严格的学术标准，也充满着大胆的创新精神。

14. 大学博物馆致力于开放其所有文化和物质资源。

15. 大学博物馆和所有博物馆一样值得敬仰和赞叹，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精神世界。

简而言之，尽管在做出这份宣言之前我曾发表过一些不太客气的意见和批评，我对于大学博物馆的价值和我们的奉献精神、选择的道路以及领导能力还是保持乐观的态度。我们每天在工作中都不能忘记的一点，就是要坚持和推动对真相的求索，为此我们必须有探究事物本质的自由，并获得作为大学使命的关键一环所应得到的认可与尊重。作为总结，以下是我个人的宣言：

大学博物馆不是辅助设施，也不是学院的附庸。我们理应获得学术界的认可和相应的学术地位。我们能够提供服务、开展教学和调查研究。不论世界怎样变化，我们将始终是联系文化和科学领域的重要纽带，并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 联系方式

William Eiland, Director, Georgia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Georgia.

Email: weiland@uga.edu



# 我们的重要性：阐明大学博物馆的价值

John Wetenhall / 文

骏仁 / 译

想象自己正在一所著名的大学参观，你会选择前往校园里的哪个景点？可以四处漫步，欣赏学术建筑或是为可能入学的学生（并非你本人）打探一下学校的情况。想吃快餐的话可以前往学生中心，需要纪念品的话可以到校园书店购买，这两个地方可能对外开放的。学生的宿舍和教室都不对外开放的，学术部门也不太可能举办很多允许旁听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真正体验一下校园生活的人只剩下三个选择：体育场馆、剧院和博物馆，然而前两者都受开放时间的限制，唯一每周至少 6 天对外开放就是大学博物馆了。

大学博物馆就是学校的迎客厅，这里有代表大学成就和愿景的藏品，有体现教学和研究承诺的文字叙述，参观者的热情和多样性也反映了我们所处的学习社区（learning communities）的人口结构和精神贡献。与大学里的剧院和体育场馆一样，大学博物馆也



具有维系学校和社区关系的作用,因为没有缴纳学费的普通人也可以来这里体验大学生活。大学博物馆能够提升所在城镇的居民生活质量,这有助于学校规划方案得到批准,避免过度的民间监管,并帮助地方政府注意到校园生活繁荣的另一面。此外,大学内部的公共设施,通过运动员、演员、音乐家或是视觉艺术家,能帮助学校获得赞助,其中很多人从未上过大学,他们都愿意为这些设施捐款。

在过去,大学博物馆往往更注重服务大学自身,尽量征集有助于提升学习效果的藏品。除了在课堂上欣赏幻灯片里的艺术品,艺术大师创作的绘画、雕塑、版画、摄影、素描,乃至一些当代画家的作品,都是很好的补充材料,无疑有助于培养具有艺术鉴赏能力的“眼睛”。自然科学领域也是如此,校园里的标本类藏品(通常由任教的专家在实地考察采集)能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可能因此激励新一代科学探索者的出现。当然也不能忘了我们图书馆收藏的历史文物和珍稀典籍,支持着全校的历史学、文学和人文学科的教学和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需要建设更大的展厅、藏品库房乃至独立的博物馆,来存放日渐增多的藏品,而这些设施往往设在校园里由红砖、石料或彩绘木料建造的其他地方。

有些时候,教授们的情热会感染校友和朋友,感召他们向学校捐赠自己的作品。在过去,大学博物馆会欢迎这些捐赠,邀请相关人士参加讲座和开幕式,甚至为了拓展社会支持而制定博物馆会员计划。就这样,原本偶尔的捐款逐渐发展成为年度募捐计划,资金开始流动——从偶尔的支票到筹措年费的活动——这也引起了主管部门的注意。学校开始为博物馆配备发展专员,他们想尽办法帮助博物馆获得资金或艺术品捐赠,并对所捐赠的艺术品很感兴趣。就这样,不论捐赠物品本身是否与博物馆的主题有关,单是这些艺术品的估值就能让年度筹款报告多出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美元。

管理层开始意识到收藏品可以带来好的名声,而与有意捐赠藏品的富豪搞好关系也能提高声望。于是,博物馆这个原本仅面向大众的校园之门开始了双向摇摆,成为了大学官员结识富豪的渠道,尽管有的富豪可能没有上过一天大学。随着更多捐赠的流入和藏品的累积,学校开始斥资建设规模更大的场馆,不过校方此时信心满满,为了实现成为“世界一流”(world class)的愿望,建造这栋宏伟建筑的投资是值得的。就这样,路易斯·康(Louis Kahn)、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迈克尔·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摩尔(Moore)、皮亚诺(Piano)和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等建筑大师们纷纷开始登上舞台。

以往在大学博物馆规模很小但是不断成长的阶段,领导层会想办法减轻工作人员身上过重的负担。他们会邀请艺术家、收藏家、艺术经纪人和其他具有专业知识和人脉的人士加入“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这样的委员会每年造访校园 1~2 次,了解博物馆的展览和项目,并与博物馆人员交流意见。由于委员会的成员中有很多乃至全部都是大学的校友,他们与大学之间有着深厚的联系,因此会真心帮助母校将博物馆的影响力和学术声誉拓展到校园之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委员会的构成似乎发生了变化,其成员的选择标准不再是艺术、历史、自然科学乃至博物馆行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取而代之的是在商界的成就和慈善家的名号。当然,收藏家没有被换掉,但容我冒昧地指出,如今的收藏家所看重的不是藏品本身,而是其背后的经济潜力。而且,随着各类委员会的构成越来越依赖商业价值,其集体行为也开始以价值为取向,其中咨询委员会更是越来越像“信托委员会”(fiduciary board)。这些委员会开始推行会议记录,为了便于按自己的意愿表决而采用了《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同时任命了主席、副主席、秘书和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建立财务委员会(finance committee)以便监督运营支出;并针对专业人员进行绩效评估。董事会贡献更多的资金,发起筹资活动,博物馆与当地社区的联系也得到了强化。这些都是从短期来看非常有益的变化,但是我不得不说的是,这样更偏向于交易的发展形式,并不一定符合博物馆的长期利益。





我们都很清楚,大学博物馆管理的受托责任方是政府行政部门,而具体的管理权力则按层级下放,从大学董事到校长,再到教务长,最终才是你所在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但请仔细领会所谓的“合法性”(legal),在这个领域绝非唯一的权威。因为在“信托委员会”里,“政治”(political)权力(似乎没有更恰当词语表述)可能具有同等的威慑力,比起他们关心、忠诚、服从博物馆事业的责任心来说,更能激发行动力。尽管理事会拥有合法地位,但有时不遵守游戏规则,总能想到办法阻挠进度、抱怨、管头管脚,或是通过其他方式耗费大家的时间和精力。有时会希望某些理事会成员没有保存你的电话号码,这其中就可能包括院长、教务长、校长,或是大学董事。因此请务必记住,你所认为“咨询委员会”不具有“法律效力”(legal authority)的行为,完全能让你的工作和生活变成一团乱麻。

尽管我接触过的大多数大学的行政部门都会支持本校的博物馆,并为后者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是不论多么罕见,总是会有某些大学官员由于无知或主观上的恶意,将博物馆的学术服务视为理所应当,并将博物馆的资源看作是随取随用的“应急基金”(rainy-day fund)。我曾经共事过的一位大学管理人员就曾将博物馆的预算用于平衡开支,所以我深刻了解这种人会带来何种挫折感甚至无助感。我还曾听有教务长被人取了个“伏地魔”(Voldemort)的绰号。更严重的是,有个别(很庆幸并不是很多)大学甚至用一次拍卖几件藏品的方式来改善学校的经济状况,他们的这种行为必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在过去,人们会认为大学博物馆更易于管理,选择从这里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这种想法已经过时了。在我看来,管理大学博物馆要比管理独立的公共博物馆难度更高,原因就是这里有两个权威:其一是“合法的”与专业性;其二就是“政治的”与潜规则——违背其中任何一个权威都可能对你造成不利,并由此损害博物馆的最大利益。我也知道很多学校都有出色的教务长和开明的理事会,他们总能耐心地听取意见,并真诚希望见证我们的成功。如若这样,我要表示祝贺。但还是要记住,任何的工作状态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佛罗里达州的谚语称之为“一只脚在码头,另一只脚在船上”。也就是说当下的安全很可能只是暂时的,我们其实是如履薄冰,随时都可能落入水中。我知道这是不争的事实。

2009年4月的一个早晨,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危机掏空了州政府的开支预算,而我则突然在萨拉索塔(Sarasota)当地的报纸上看到一篇题为《瑞格林博物馆即将关闭》(*Ringling Museum to Close*)的文章。原来是议会威胁要大幅度削减州立大学的预算,作为终极对抗手段,作为博物馆上级的校长决定关闭佛罗里达州立美术馆(State Art Museum of Florida),理由则是这个机构没有“教育”足够数量的学生。据我所知,除了在正门留一名保安外,博物馆其他工作人员都将被解雇,以“节省”州预算,但其实这些员工的工资大多来自私人捐款。我们显然不能让这样糟糕的主意悄无声息地施行,最终在当地社区以及一些政治人物的帮助下予以反击,博物馆得以维持正常运营。那位发出威胁的校长在几个月后收到了解雇通知,他差点让我们的博物馆与伦道夫学院(Randolph College)、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以及如今的拉塞尔大学(LaSalle)一样蒙羞——不过他还是成功地在离职前的两周,解雇了我们大学有史以来最出色的橄榄球教练,并一度授予我“前任馆长”(former director)的头衔。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除了要警惕胡作非为的管理层和理事会以外,有可能给压制你的还有一个部门:大学的发展部(development office)。筹款人员领着丰厚的薪水,但相应也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即非常高的筹款指标,包括现金赠款、遗产捐赠以及其他支持途径。所谓的其他支持中,最具吸引力的就是艺术品收藏——很容易折算成现金等价的“实物”捐赠,其中的减税潜力更是受到捐赠者的欢迎。即使这些艺术品没有任何转售价值也无妨,因为我们本来就不会通过出售藏品变现,作为运营资金的来源,甚至财务报表中都不会将其列入有价值资产。对于筹款人员、整个大学乃至我们自身而言,上述交易无疑是有益无害的,毕竟在与校园里其他院长和系主任的竞争中,接受几幅绘画、雕塑、装框的版画或是照片,总是有助于提升博物馆的筹款形象。如若这些作品真的不适合收藏,或与当前的教学主题不符,那也没有关系,指不定将来的某一天会派上用处,没准还可能成为某个项目的研究对象呢。虽然是否真正有用并不能确定,但这样一件既能让捐赠者开心,又能提升财年绩效的事情总是没有坏处的。然而,如果我们明年还继续这样做,或者之后的一年也这样做,更或是连续十年、二十年都这样做呢?藏品需要配备更多的保管设备,新的橱柜、油画架、无酸纸盒等等,这些都会增加成本和空间需求。看来有必要修建新建筑了。

今天在座的各位可能没有陷入过这种收藏的“任务蠕变”(mission creep),但你们





的前任可能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大家都知道拨乱反正的代价不小。无论是增加新的存放空间,还是为了处理藏品而进行的大量研究工作,都可能消耗我们原本已经捉襟见肘的资源储备。我也想不出解决方案,但可以推荐一个未来可行的实施标准:建议不要再将获赠艺术品(或是历史文献、化石,其他任何藏品)的全部市场价值计入内部募集资金的抵税额度。如果“实物”捐赠以评估价值 20% 或 25% 的大幅折扣计入,就会发现发展部的工作人员将更尽力地完成筹款任务,而不是为“后世”(future generations)高估藏品的价值。迫使你顾需求被迫接受捐赠品的压力可能就此消散,或是至少降低到可控水平。当然,筹款的绩效可能会降低一些,但这些捐赠本来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基金。

如果觉得这一温和的改革措施有点道理的话,请容我提出下一条建议:剔除有关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参与博物馆管理的条款;取消有权宣布信托责任(fiduciary responsibilities)(尤其是涉及财务)的正式头衔和常设委员会;将其更名为“委员会”(council)而不是“理事会”(board);取消投票、动议和议决程序;召开会议旨在交流而不是“做生意”(business);组织一个由杰出捐赠者组成的“会议”(assembly),或是“某博物馆之友”团体、“荣誉协会”(honorary society)之类的与你们博物馆使命和愿景有关的社团组织。放弃接受“管理”(governance),甚至摒弃交由信托控制的想法,可能让你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我认为,那种认为只有“在位掌权”(in charge)才会做出奉献的看法,是一种与我们长远利益相违背的假设。当然,必须让支持者了解你和你的同事们经常利用极为有限的预算,出色地完成工作。如果你的团队有足够的说服力,听众们甚至会主动提供帮助。对大多数热爱大学和大学博物馆的人来说,能够受邀加入博物馆的大家庭就足以让人自豪和满足了,他们不在意假装参与博物馆的运营。并且我相信,当提出要求时他们会做出奉献,协助我们的推介工作。如果是充满诚意地要求,他们甚至能为你的继任者留下丰厚的家底。

无论表面看起来多么简单,要落实这些改革措施其实很困难。不管是摆脱管理的束缚,还是降低捐赠藏品的抵税额度,都需要时间和决心才能完成。事实上,尽管我很清楚这些改革的好处,但我承认自己连一项都没能实现。然而即使我能够做到这一点,博物馆行业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威胁:那就是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胡作非为的管理层的伤害,包括极少数的校长、教务长或是院长,他们可能会在某些小概率的情况下妄图关闭我们的博物馆,或是认定我们不再具有为后代保存藏品的价值。我很希望能有解决问题的答案,但我做不到。但是你们能做到,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从 2006 年至 2008 年,我有幸担任了美国艺术博物馆馆长协会(Association of Art Museum Directors, AAMD)大学关系工作组(university affinity group)的主任。工作组共有约 25 人,包括一些成就斐然的博物馆负责人。上任之后我曾做过一项简单的调查以确定我们为大学社区的核心,即学生和老师们,提供了哪些服务。通过这项调查发现:耶鲁大学(Yale)推行与博物馆专业岗位有关的带薪实习计划;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在这方面也有出色的表现;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博物馆实现了惊人的学生参观量;圣母大学(Notre Dame)会安排每名新生在入学后的迎新周参观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和康奈尔大学(Cornell)的博物馆也吸引了众多学生参观;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则一直在说服教授们利用博物馆的藏品来委派研究项目;佛罗里达大学(Florida)和哈佛大学(Harvard)推出了活跃的学生会员计划;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在博物馆里开设了不少课程;密歇根大学(Michigan)为学生表演提供了平台。在 26 所大学中有 9 所大学的博物馆每年都吸引了超过 10 万名观众,包括佐治亚大学(Georgia)、斯坦福大学(Stanford)、罗切斯特大学(Rochester)、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Minnesota)。

各所大学的表现的的确都很棒,但是其中也有一些问题:虽然几乎所有博物馆都设置了面向教职员或学生的课程计划,但每个方案都似乎只在某一方面表现出色,很少能兼顾两个方面以上。有的是学生实习,有的是教师展览,也有大一新生或校友团体、学术研究,或是面向儿童(K-12)的课程。很少有计划能同时兼顾至少两个方面。现在,仅仅 10 年以后,情况已经完全变了。大学博物馆的负责人,也就是在座的各位,已经找到了同时服务各种不同学术群体的方法,包括学生、教师、员工、学生家长以及校友,同时通过形式多样的学术规划、研究项目、出版方案、表演和社交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大学的校园生活。

自从开展调查以来,我们取得的重大进步在于拓展了高等院校博物馆肩负的“使命”。



过去的项目一直严格遵循以藏品为基础，但如今已经扩大到更为广泛的内容，涵盖了文化包容、社会调查，以及对我们的星球的可持续性关注。以下列举了一些方面：

- 组织学生探讨社会正义的问题；
- 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STEM）加入艺术元素；
- 探索科学对文化的影响；
- 探讨艾滋病病毒/艾滋病（HIV/AIDS）、刻板印象（stereotypes）和审查制度（censorship）；
- 利用藏品来传授分析、假设、验证和其他学科的特定技能；
- 讲述不同大陆的故事；
- 与西班牙语社区进行互动，分享难民的故事和探讨移民问题；
- 气候变化；
- 有争议的历史遗迹；
- 保护植物；
- 种族灭绝；
- 跨国间的合作；
- 文化财产与强制遣返问题；
- 为公开探讨涉及种族、性别和身份等敏感性的问题提供安全空间；
- 通过艺术品观摩培训，提高医学专业学生的观察技能；
- 温馨关爱国际学生；
- 甚至尝试全开放式博物馆。

我们已经学会利用藏品，通过对博物馆使命的拓展性阐释，形成类似“多普勒效应”（Doppler effect）的辐射圈，将影响力扩散到整个校园内外。相比数年前，这能够覆盖更多的人群，一切的创新性与想象力都是你们努力的成果，我只不过是作了汇编而已。

在我看来，最值得关注的在于多数的大学博物馆和美术馆规模并不大，但能提供丰富多彩的博物馆服务，每位专业人员往往要完成本来应由两人或是更多人承担的工作。我们已经掌握了如何精简节约、扩展资源、吸引志愿者、调整项目和规划、采用游击营销（gorilla marketing）、运用社交媒体，以及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间的协作关系。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和同事一道建立起由学生和教师组成的关系网，在博物馆日程中排满各种讲座、研讨会、小组讨论、电影、演出、社交聚会和其他活动，这些项目只需付出很少成本甚至无需成本，任何市立博物馆的教育工作者都很羡慕。我们还非常擅长与社区团体、文化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市民合作伙伴分享我们的空间。我们能够利用微薄的资金，加上来自大学内外的实物捐助，拼凑出各种教育项目，我们所实现的影响价值早已超出了年度预算所代表的货币价值，即使与其他博物馆相比也不遑多让。我们不会浪费哪怕一点点的经费资源，绝大部分的大学博物馆在运作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创业精神，恐怕连大多数商界巨头都梦寐以求。

现在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会议主题“‘勇于思索’是变革动因”（“audacious ideas” as change-agents）所代表的潜在可能。在结束之前，我还想重申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价值观念，即藏品背后的历史和其他独有特质让它们拥有了展示和研究的价值，并值得我们为未来的学生、教师乃至全人类保护和保存它们。不论做出多少创新，我们事业的价值与核心始终是藏品以及围绕这些藏品所打造的展览和各种其他项目。与我们所在的高等院校一样，我们的声誉也源自研究成果、论著发表和思想领导力。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学术研究、教学和面向大学社区的服务，都体现并符合了终身教职评估的根本要求（尽管大学博物馆的业务负责人往往不能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虽然管理大学博物馆变得日益复杂，但是这项工作要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让人激动和向往——甚至足以吸引那些在大型市立博物馆里工作过的专家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们的博物馆远比我们能提供的任何慈善事业更有价值。恕我直言，与任何的志愿者理事会（volunteer board）相比，在座各位才是真正让大学博物馆发光发亮的“独家秘方”（secret sauce）。是你们这些行业专家活化了藏品的学术、文化和科学用途。你们精通神奇的魔法，能够利用实物藏品来传授艺术、科学、历史或全球文化，激发人们的好奇心



和想象力。你们实现了教务长和院长们一生追求而难以实现的跨学院、跨学科和跨文化间的思想交流。在做到这些的同时，你们还要管理各种事务并保证不抱有任何偏见。最重要的是，你们用自己的激情、专业知识、创造力和职业操守打造了充满活力的大学博物馆，使之成为校园生活中的一部分，成为能够代表高等教育行业价值观的不可或缺的公共设施。

就我个人而言，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那些大学管理者，他们或许希望削减博物馆预算，或是为了满足短期财政需求而试图出售珍贵藏品，或是大言不惭地断言大学博物馆不具有“教育意义”——我能做的仅仅是每天通过各种活动、展览和研究项目以及文化展示，来揭示大学博物馆所具有的深刻的教育意义，以此证明那种毫无依据的说法是多么的荒谬，这是对大学博物馆的威胁，也是对校园生活乃至所在城市的凌辱。

我们都希望伦道夫学院、布兰迪斯大学或拉塞尔大学的悲剧不再重演，但我个人仍未想出能够彻底解决的办法。但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方案。

#### **联系方式**

John Wetenhall, Director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Museum and The Textile Museum,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Email: [jwetenhall@email.gwu.edu](mailto:jwetenhall@email.gwu.edu)



# 大学博物馆的重要作用： 体现其价值的四种体系

Andrew Simpson / 文

骏仁 / 译

此前我在澳大利亚多所大学的博物馆有过工作或合作的经验，因此很高兴能受邀参加 2018 年在迈阿密举行的美国大学博物馆和美术馆协会（AAMG）及国际博协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UMAC）联合举办的年会，并在会上就大学博物馆的重要性问题发表看法。如果以我在相关领域工作 30 年的经验总结，那就是大学博物馆真的无关紧要，这对职业生涯而言无疑是个悲剧性的顿悟。但既然本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勇于思索”（Audacious Ideas），那我需要考虑是否能大胆讨论大学博物馆工作自身的重要性。



根据组织理论 (organisation theory) 来看, 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博物馆因其作为大学组织内部的从属组织, 有着更为复杂的一面。这意味着与其他博物馆相比, 大学博物馆的运营环境可能存在更多的挑战和机遇。但是, 倘若收藏的目的是获得知识, 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断大学内部的藏品是收藏学术资料的最初模式。历史早就证明了大学博物馆的重要性, 藏品与知识型的组织之间始终存在着联系, 甚至可以追溯至遥远的古代。那么, 还会贸然否定博物馆在高等院校里的地位么?

然而,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 许多大学尝试采用创新性的方式将馆藏用于教学、科研和其他活动, 从而寻求最大限度地利用藏品。然而在另一些大学也有令人震惊的决策, 包括出售或注销馆藏, 并否定学校博物馆及其藏品在学术方面所具有的潜在价值。大学博物馆自身的运营环境并不稳定, 加之学校高层接连不断的人事变动, 新任领导往往对博物馆及其藏品的价值知之甚少, 这些都让宝贵的资产易受破坏。因此至关重要, 我们必须证明大学博物馆能够为学术事业贡献持久的价值, 并设法让校园内外众多代表不同利益的相关群体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我认为在迈阿密大学提交这份报告是非常合适的。据我所知, 只有两所大学在校园里安装了告诫大家注意大型肉食性爬行动物的警示牌, 迈阿密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这对于在大学博物馆里工作的人来说尤为重要, 这种巨大的肉食性爬行动物已然成为新出现的企业学院 (corporate academy) 的一部分, 它们可能贪得无厌, 非常危险。

本文提出了大学博物馆可以参照的四种互为独立的体系, 以此论证其自身价值与所在大学的核心使命或核心业务直接相关。下文将通过案例加以说明。本文列举的案例, 只是为了指出某一种体系, 事实上很多大学博物馆都会综合采用不同的体系, 作为向上级主管机构表明自身价值主张的方式。首先必须声明的是, 本文的分析不适用于大学以外的博物馆, 因为涉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研究视角, 结果可能截然不同。有关非大学博物馆的探讨, 也有很多文献可供参考 (例如 SCOTT 2009)。

### 1. 机构的叙事体系 (Institutional narrative frame)

近年来很多大学博物馆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这套体系, 因为藏品本身赋予了传达所属机构 (大学) 的相关信息。机构叙事体系简单明了, 在并不复杂的展示空间里讲述大学的故事, 作为传播机构鲜明特点和 / 或独特本质的一种方式 (例如 HEIMaMIES 2008), 这就像三维可视化的大学档案 (three dimensional visual archive)。机构叙事同样能应用于大学的分支机构, 例如悉尼麦考瑞大学 (Macquarie University) 的“体育名人堂博物馆” (Sporting Hall of Fame Museum), 就是大学早先的博物馆研究项目与体育协会 (Sports Association) 进行合作的成果 (ANDERSON 等 2013)。机构的叙事内容具有代表性、有特色, 或有独特性, 可以刻意或在无意间进行传播。

机构叙事也可相对复杂, 有效传播更广泛社会在各个层面的价值。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案例。上海交通大学在高等教育界众所周知。这所创办于 1896 年的大学, 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最负盛名、竞争最为激烈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我们都很清楚, 大学博物馆促进了大学文化、公共文化, 以及大众科普之间的联系。很多大学博物馆与欧洲和北美的学术传统有着显著差异。上海交大的徐汇校区建有一座校史博物馆, 其中包括有关大学的物品、文化遗存、照片和历史文献。博物馆突出展示了曾在这所大学里求学和教学的科学家、工程师的重大成就。在高等教育领域, 利用博物馆的空间来培养对大学机构的认同感, 是一种相当好的策略, 而博物馆近期的一些发展举措走得更远。

钱学森博士被誉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先驱和中国航天之父, 1934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获得机械工程学位。在漫长的科学生涯中, 他也是一位执着的收藏爱好者, 收集了大量详细的档案。在钱学森诞辰百年之际,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Qian Xuesen





Library and Museum) 面向公众开放。钱学森图书馆通过展示钱学森的科学精神以及他所就读的这所大学对于新知识的开拓性探索, 实现了机构叙事。其目标不仅传播了所在机构的价值, 还激发了新一代国内外学生和公众对于科学的兴趣。钱学森智慧过人, 在他不平凡的一生中经历了一系列影响全球的重大历史事件。

20 世纪 50 年代, 已在美国工作多年的钱学森由于反共思潮而遭到怀疑, 并最终被软禁。美国政府以钱学森涉嫌窃取国家机密为由, 扣押了他的研究论文。1955 年, 中美两国间马拉松式的谈判终于达成协议, 钱学森及其家人被遣返中国。钱学森被视为民族英雄, 受到热烈欢迎, 并在归国后很快就投身于航空领域的建设。鉴于当时的中国亟需发展航空航天技术, 钱学森的工作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

尽管钱学森的工作为中国赢得了巨大利益, 但他仍过着简朴的生活。他成为科学教育和公众科普的热心倡导者。钱学森图书馆也因此基于他的生平经历, 讲述科学进步以支持国家发展目标的重要性, 以及将国家和社会利益置于个人追求之上的精神。

在高等教育领域, 与个人生平有关材料往往都是档案资料, 这些对社会政治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人物, 他们的档案未来可供学者从事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及其所属的钱学森图书馆共同致力于实现的任务, 是其宏伟目标的里程碑。以钱学森图书馆作为平台, 不仅能提供研究人员相应的档案资源, 还能通过聚焦著名的校友证明自身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实力, 向新一代年轻学生介绍科学的价值及其对于社会的重要意义, 并传播为了国家利益而努力工作的观念。

## 2. 跨学科应用的体系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 frame)

置于语境中的藏品对象, 可以说是“连带着意义” (sticky with meaning) (SIMPSON 2014a)。美国教育哲学家约翰·杜威 (John Dewey) 将单件物品其内在和外在意义的关系, 视为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独特交流。在博物馆或藏品的语境中, 人们可以通过物品之间的联系做出深刻的解读。托马斯 (Thomas 2016) 认为, 物品都具有双重性或矛盾性。物品是确定的、可观察的、可描述的、固定不变的, 然而一旦随着我们知识体系的改变而带来了变化, 它们也很容易被置于新的语境, 加以重新释读。物品与语境之间的紧密关系, 使之成为很有价值的教育工具。

基于实物的学习法 (object-based learning, OBL) 需要调动多种感官 (CHATTERJEE & HANNAN 2016)。在大量借鉴体验教学法 (experiential pedagogies) 和具身教学法 (embodied pedagogies) 的基础上, 基于实物的学习法在各种语境中建构意义。物品被认为对应了特定意义, 可以在不同的认知过程中触发具体的观点, 形成概念上的联系。因此, 物品可以成为衔接不同学科的桥梁, 而实物收藏则能够应用于广泛的学术领域。实物具有为各种形式语境所理解的能力, 使之成为跨学科应用 (cross-disciplinary application) 的关键。尤其在当今, 高等教育领域围绕不同学科形成各自为政的坚固壁垒, 在教学和研究实践方面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学术文化。博物馆及其藏品有可能将分而治之的各学科重新联系在一起 (BARTLET 2012)。

藏品跨学科应用的潜力, 在某些高等院校中尚未得到充分开发, 但也有其他一些院校正在研究新方法, 应用到那些没有采用基于实物教学法 (object-based pedagogic) 的传统学科领域。麦考瑞大学最近开展的课程地图研究 (curriculum mapping study) 项目 (THOGERSEN 等 2018) 展示了将其 2 套历史藏品用于大学所有 5 个学院教学的新方法。这一方面的发展只有在大学博物馆工作人员、课程开发人员和教学人员利用统一信息平台进行三方合作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实现。



近来,基于实物的学习法(OBL)在一些大学呈现出复兴的势头。越来越多的大学博物馆藏品被视为促进跨学科教学和研究的工具。这就引来许多新的听课学生,突破了最初针对专业学科的教学应用。在某些情况下,这本身就能成为一种机构叙事(体系1)。在一些机构中,这促进了融合(行政管理与实体,参见SIMPSON 2012),并为新的大型基础设施的开发奠定了基础(例如,ELLIS 2017)。

许多大学博物馆,尤其是艺术博物馆开展跨学科的展览和活动项目。这类活动在学术环境中无疑最容易实现,因为大学的学术部门拥有多样化的知识资源。专为跨越学科边界打造的展览项目,往往能激发新的观点和见解。这提升了所在大学的学术使命,并为大学同事之间超越同一学科限制进行研究交流的尝试,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大学博物馆收藏有珍贵的视觉艺术品和实物,致力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博物馆也能利用所在大学各学院自身拥有的大量学术和知识资源。跨学科背景下策划的展览目标明确,引发辩论、批评和对话。于是,大学博物馆成为实现大学使命的关键部分,并且证明了与所在大学的重要联系。这也可以拓展到校园之外,吸引社区共同参与跨学科的讨论,针对科学展厅(Science Gallery)的授权管理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不但融合了科学和艺术,还探索了当代社会的相关问题(GORMAN 2009)。这与体系4也有共通之处。

### 3. 数字拓展体系 (Digital extension frame)

很多大学正在探索如何在数字环境中开展基于实物的教学法。基于实物学习的价值已众所周知,在线课程和新的数字平台的出现,能让大学尝试利用3D扫描和打印,使全新的学习不依赖于固定的地理位置。例如,麦考瑞大学专门开发的在线内容管理系统(web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基座”(Pedestal, beta版),提供学习和教学使用的3D数据。学生无需到访博物馆,就能获得“身临其境”的学习体验。研究人员也能轻松获得实物的数字化身(digital avatars)。牛津大学的“展柜”(Cabinet)项目通过新技术实现可访问的数字环境,在其中提供交互式学习和修正工具,并开放馆藏用于校内外的教学活动。这一领域中还有很多独立的机构企业有过类似案例,可以想见将多个机构整合起来在网上建立平台,只是个时间问题。

数字技术正在改变我们体验客观实体的感受。上述都是艺术、技术和各专业学科交叉的案例。大学处于很多相关领域的发展前沿。技术不断推陈出新,但就依靠客观实体和数字化的特性来表达不同含义和观点的方式而言,我们还只是处于早期探索阶段,可能随着配置的革新,生成新的意义。尽管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消失了(如前一节所述),但人们越发意识到模拟与数字、固定与移动、真实与替代,乃至文化产品与消费,更应该被视为同一体验体系下的不同层次,而非截然对立的两个极端。

近些年在很多国家,都有人尝试推动将实物纳入主动建构知识的新过程。如上所述,针对实物的研究和构思已经应用在一系列的学科领域,并被认为能证实物质文化与数字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复杂关系。世界各地的大学都开始思考如何通过数字拓展(digital extension)来(重新)激活其学术收藏(SIMPSON 2014b)。

数字拓展将对整个大学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博物馆及其藏品一直都是大学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可以推断其将在新的数字校园环境发挥核心作用。乐观估计会有更多的案例出现,博物馆藏品将被作为模板用于推动未来相关领域构建新知识的尝试。似乎有理由相信,大学将充分利用这些新的机遇,从制度层面对大学博物馆及其藏品加以



思考和规划。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预见今后十年里，高等教育领域的实物将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

#### 4. 参与度体系 (Participation frame)

这套机制是让学生和其他人参与大学博物馆的工作。大学以外的社会博物馆正在被新的参与式博物馆学 (participatory museology) 推动发展，这也是顺势而为的合理选择。举例来说，学生通过参与展览的开发过程，提升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和责任心，设定个人的学习目标和集体目标。这能促进和巩固教学法与内容的互动，但也需要通过知识、实物和社会之间的有效协同，为学生和教职工创造丰富真实的学习体验。这在传统教学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其中最核心的要素就是藏品。

部分大学博物馆普遍采用让学生担任策展人的方式，通过集思广益合作举办既符合博物馆的目标，同时也优先考虑教学目的的展览 (MARSTINE 2007)。这些展览可能呈现出传统机构叙事体系所没有的全新视角。策展方式利用了由抽象概念化 (abstract conceptualisation)、主动实践 (active experimentation)、具体经验 (concrete experience) 和反思性观察 (reflective observation) 四个阶段构成的体验式学习圈 (experiential learning) 理论体系。学生策展人和观众都能从中看到相关选择是如何影响到展览的效果。马斯汀 (Marstine 2007) 认为这一过程为学生提供了“试错” (messiness) 的空间。体验式学习或工学结合模式 (work-integrated learning) 的过程，能激励参与者想象博物馆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并培养他们引领变革的能力。展览实践方面的合作，也有助于发展各种研究技能 (SAND 等 2017)。昆士兰大学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人类学博物馆 (Anthropology Museum) 是功能齐全的大学博物馆。多年来，在莱昂·萨特思韦特 (Leon Satterthwaite) 博士的领导下，博物馆开设了一门在博物馆环境中研究人类学的课程，学生能为博物馆的工作贡献力量，并且有效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程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学生在学习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和责任感，让他们能够努力实现自定的个人和集体学习目标<sup>1</sup>。课程最主要的成果就是一场面向公众和校内师生开放的展览。

甚至还有这样的案例，完全由大学生自发组织的、超出课程内容的工作。在悉尼麦考瑞大学 50 周年校庆期间，学生们即兴发起“麦考瑞展览社团”，开展项目探索学生社团在建立校园社区认同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学生策展人与其他学生社团的代表合作策划展览，展示不同的学生社团所开展的各种活动，以反映他们是如何形成社区，如何构建支持网络 (support networks)，以及共同成为大学身份特征的组成部分 (CHINNECK 等 2015)。这样的展览就与体系 1 一致了。

显然，大学博物馆在本质上不仅是一个教学空间，而且是整个学术体验的延伸。此外我们也认识到，在大学开展跨学科的参与性活动，再次印证了一直以来对博物馆的期望，即作为学术体验一部分的调查、探究和智力挑战。通过参与的方式，促进对话，推动探讨，扩大认知，揭示新的观点。在大学的校园内大胆地探讨一系列问题是完美和理想的，甚或是那些被认为有争议的问题 (LIVINGSTONE 等 2016 年)。

---

1 节选自莱昂·萨特思韦特于 2016 年在悉尼大学举办的 CAUMAC-UAMA 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效果显著：关于实物导向教学的案例研究》 (Solid results: a case study in object mediated teaching and learning)，研讨会的主题是“创意空间：关于大学博物馆和收藏馆的全新思考” (Creative Spaces: Reframing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项目参见：<https://caumac.files.wordpress.com/2016/05/full-program-caumac-uama.pdf> (访问日期：2019 年 11 月 20 日)。



## 结论

以上列出的四个体系,以及用来加以说明的具体案例,绝不是针对博物馆及其藏品体制和价值的全部主张。毫无疑问,在这些体系中有许多其他案例可以阐释,并且很可能还存在其他具有价值的体系等待探索。此外也有人建议,对这些体系进行更为严格和深入的分析,以便进一步细分,以明确价值主张(value propositions)的分类。虽然确认价值主张是一件相对容易的工作,但如何在机构内加以利用,来促进大学博物馆及其藏品事业的发展,则是另一回事了。与当前许多其他机构一样,高等教育的管理体系也希望能够通过价值评估的衡量,做出价值判断。如果价值主张能以某种方式被量化,这是最好的做法。但这将是一项更具挑战性的任务(SIMPSON 2017)。

## 参考文献

- ANDERSON, D., GIBERSON, L., SIMPSON, A. & THOMSON, A. 2013. Australia's first university sporting museum: a case study.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6: 35-44.
- BARTLETT D. 2012. Coaxing them out of the box: Removing disciplinary barriers to collection use.
- In JANDL, S. & GOLD M., editors. *A Handbook for Academic Museums: Exhibitions and Education*. Edinburgh-Boston: MuseumsEtc, 190-218.
- CHATTERJEE H.J. & HANNAN L. (editors). 2016. *Engaging the Senses: Object-Base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 CHINNECK, S., DOLLIMORE, C., & SIMPSON, A. 2015. Picturing 'A Living Campus': (50 Years of Students at Macquarie exhibited). *Museums Australia magazine*, 23(4), 22-24.
- ELLIS, D. 2017.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evolving in a changing world. *Museums Galleries Australia Magazine*, 26 (1), 46-49.
- GORMAN, M. J. 2009. Experiments in the boundary zone: Science Gallery at Trinity College Dublin.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2, 7-13.
- HAMMOND, G., THOGERSEN, J., SIMPSON, A., & JANISZEWSKI, L. 2019. Unlocking the learning potential of university collections. 2019 CAUMAC -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symposium, *University Collections: Object-based Learning and Teaching, Research and Engagement*. Program and Published Abstracts, 8-9.
- HEIMÄMIES, K. 2008. The Helsinki University Museum and its responsibility to preserve the heritage of university history.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1), 33-36.
- LIVINGSTONE, P., HARTZ, J. & ROTHERMEL, B. 2016. A formidable forum: University museums embrace controversy.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8), 23-28.
- MARSTINE, J. 2007. What a mess! Claiming a Space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 Experimentation in the University Museum.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2(3), 303-315.
- SAND, A., THOMS, B., DAVIS, E., PUMPHREY, D. & KINKEAD, J. 2017. Curating Exhibitions as Undergraduate Research. *Council on Undergraduate Research Quarterly*, 37(4): 12-17.
- SCOTT, C. 2009. Exploring the evidence base for museum value.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4 (3): 195-212.
- SIMPSON, A. 2012. Modelling governance structures for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In JANDL, S. & GOLD, M. (eds.), *A Handbook for Academic Museums: Beyond Exhibitions and Education*. MuseumsEtc, Edinburgh & Boston, 178-218.
- SIMPSON, A. 2014a. Why Universities Collect. In Macquarie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curatorial team, editors. *Affinities: 7 Museums, 50 Objects (Exhibition Catalogue)*. Macquari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Sydney.



SIMPSON, A. 2014b. Rethinking university museums: Material collections and the changing world of higher education. *Museums Australia Magazine*, 22(3): 18-22.

SIMPSON, A. 2017. Beyond visitor statistics: value propositions and metrics for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32(1): 20-39.

SIMPSON, A., THOGERSEN, J., HAMMOND, G., JANISZEWSKI, L., & GUERRY, E. 2019. Developing cross-disciplinary networks with university collections: a case study.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journal*, 11(1), 116.

THOGERSEN, J., SIMPSON, A., HAMMOND, G., JANISZEWSKI, L., & GUERRY, E. 2018. Creating curriculum connections: a university museum object-based learning project. *Education for Information*, 34(2), 113-120.

THOMAS, N. 2016. *The Return of Curiosity, what museums are good for in the 21st century*. Reaktion Books London.

#### 联系方式

Andrew Simpson, University Library (Archives & Collections), Macquarie University

Email: [andrew.simpson@mq.edu.au](mailto:andrew.simpson@mq.edu.au)





# 勇于思索： 大学博物馆及其藏品 是世界进步的变革动因

论文



# 市民策展人：弥合学术与公众之间鸿沟的众包项目

Heather Moqtaderi / 文

骏仁 / 译

## 摘要

本文所述“市民沙龙”（Citizen Salon），是一个旨在吸引更多观众的众包展览（crowd-sourced exhibition）项目。大学博物馆和美术馆都面临着一项颇具难度的任务，即如何打造出同时适合校园社区和周边社区，以及城市或所在区域内的展览项目和计划。我建议利用数字众包（digital crowdsourcing）这个工具来拉近学术界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市民沙龙”项目旨在建立观众与机构之间的直接交流渠道，是一个成功的范例。项目的数字众包核心模式，能够帮助那些希望更深入了解其观众的美术馆和博物馆打造适合自己的众包项目。



## 引言

所有大学博物馆和美术馆都面临着一项颇具难度的任务，即打造出同时适合校园社区和周边社区，以及城市或所在区域的展览项目和计划。面对校园内观众时，大学博物馆一般会尽量选择与各院系的课程设置和教学目标保持步调一致。尽管这样做有助于创造更好的学术氛围，但完全以学术观众为目标，也可能导致博物馆和大学校园一样被人批评在成为“空中楼阁”（bubble）。<sup>1</sup>本文中，我建议采用众包策略来弥合校园观众与公众观众之间的鸿沟。论证依据基于 2018 年 12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24 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亚瑟·罗斯美术馆（Arthur Ross Gallery）举行的“市民沙龙”众包展览的研究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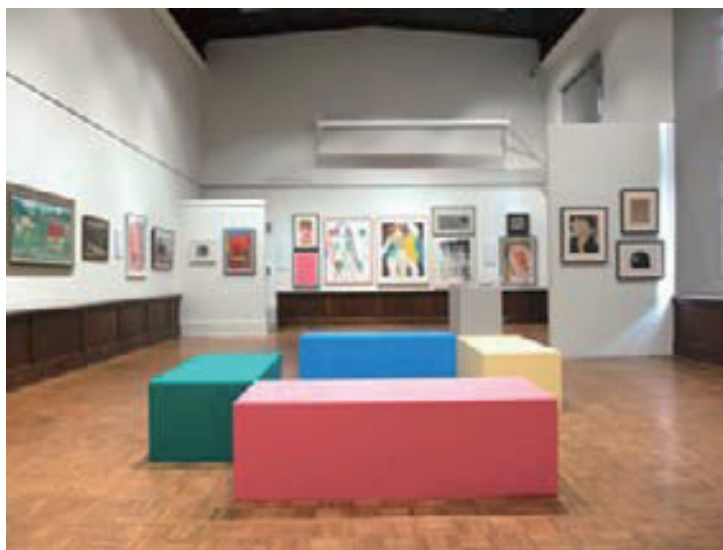


图 1

“市民沙龙”设施，  
亚瑟·罗斯画廊，2018 年。  
拍摄：埃里克·苏卡尔  
(Eric Sucar)

本文将通过概述“市民沙龙”的实施步骤，提出开发类似项目的关键环节。尽管之前也有人尝试过，但基于数字众包的策展还属于相对较新的事物。在没有公认的最佳做法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不断总结每个项目的经验教训。<sup>2</sup>通过分享自己在组织众包展览方面的经验，我希望能为这个领域的探索提供借鉴。此外，其他大学博物馆也可将“市民沙龙”作为参考范式，打造自己的数字化众包项目。

本文中的“市民沙龙”案例，是一个大学艺术收藏的众包展览项目。先于项目存在的基于 Web 的数据库是项目得以实现的关键，也是文中提到的拓展应用的核心要素。<sup>3</sup>项目所采用的众包交互应用（interactive application），允许公众在以数字形式呈现的 125 件艺术品中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件加入展览。在汇总所有参与者的选择之后，得票数最高的 50

1 在一篇通过美国学生人事管理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udent Personnel Administrators, NASPA）发表的短文中，休斯顿大学的领导力与市民参与（Leadership and Civic Engagement）部门副主任凯蒂·凯斯比尔（Katy Kaesebier）将大学校园描述成可以满足学生“一切生活、饮食、工作、学习、锻炼、医疗和人际交往等需求”的“空中楼阁”。凯蒂·凯斯比尔：《冲出空中楼阁：大学校园的市民参与》（*Bursting the Campus Bubble: Bringing Civic Engagement to Campus*），NASPA.org，美国学生人事管理者协会，2019 年 2 月 7 日，<https://www.naspa.org/blog/bursting-the-campus-bubble-bringing-civic-engagement-to-campus>

2 在规划“市民沙龙”项目时查阅的参考资料中，我发现皮尤艺术与遗产中心（Pew Center for Arts and Heritage）出版的论文集很有帮助：比尔·阿代尔（Bill Adair）、本杰明·费林（Benjamin Filene）和劳拉·科洛斯基（Laura Koloski）合著的《放开双手？用户原创时代对历史权威的警示》（*Letting Go? Sharing Historical Authority in a User-Generated World*），皮尤艺术与遗产中心，2011 年。另一部被“彭博学术”（Bloomberg Academic）收录的论文集，讨论了利用民族志藏品解决社区参与的问题：薇薇·戈尔德（Viv Golding）和韦恩·莫斯特（Wayne Modest），《博物馆与社区：策展人、藏品和合作伙伴》（*Museums and Communities: Curators, Collections and Collaboration*），彭博学术，2013 年。如果打算尝试众包项目，我也建议回顾雪莉·伯恩斯坦（Shelly Bernstein）此前组织的项目，她目前是两个展览的项目主管和首席技术官，包括“OF/BY/FOR/ALL：众包策展”（OF/BY/FOR/ALL: A Crowd-Curated Exhibition），布鲁克林艺术博物馆（Brooklyn Museum of Art），2008 年 6 月 27 日—8 月 10 日，<https://www.brooklynmuseum.org/exhibitions/click>，以及“让我们携手：费城艺术家相遇巴恩斯”（Let's Connect: Philly's Artists Take on the Barnes），2018—2019，巴恩斯基金会（Barnes Foundation），<https://www.letsconnectphilly.org/>。“OF/BY/For/ALL”项目所做的工作，对以观众为中心的展览也有一定参考价值，还有由该组织创始人妮娜·西蒙（Nina Simon）撰写的文章《参与式博物馆：知识共享》（*The Participatory Museum, Creative Commons*），2010 年；以及《保持相关性的艺术：知识共享》（*The Art of Relevance, Creative Commons*），2016 年。

3 参见 ArtCollection.upenn.edu/cs



件艺术品入选最终的展览。前述过程仅代表一种路径，还有很多其他数字众包的方式可供选择。后文还将从提升观众参与度和数据分析两方面，提供最大限度利用这一方法的建议。



图 2  
与亚瑟美术馆“市民沙龙”配套举办的  
创意写作坊  
(Creative Writing Workshop)，  
2019 年 2 月。  
拍摄：希瑟·莫克塔德利  
(Heather Moqtaderi)

### 范围

对于任何展览的策展团队而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开始时就确认展览的内容范围。鉴于众包展览的展品无法确定，因此需要在项目启动之前，提前考虑项目相关的各项参数。就“市民沙龙”这个项目来说，由于所有装置都需要纳入一个展厅空间，我认为采用两种以上的媒介类型会导致最终的展示效果过于碎片化。<sup>4</sup>因此，我决定此次众包的范围仅限于版画和油画。要想在不牺牲连贯性的情况下纳入更多形式的展品，我们需要可以隔间的展厅空间。事实上，对于某些众包项目来说，包含更多不同的媒介形式，效果可能还会更好。当然，就确定藏品类型而言，从一开始就考虑最终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步骤。

在规划“市民沙龙”的过程中，提供参与者选择藏品的数量，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为项目开发提供建议的焦点小组，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两极分化的答案。我们的目标是预测每名参与者将在选择上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选项太多可能让参与者感到沮丧，选择过少则违背了众包的初衷。在综合考虑了各项参数之后，最终我们决定从数据库中选择 125 件藏品提供项目的参与者挑选。

除了与藏品有关的参数外，“市民沙龙”项目前期考虑的要素还包括项目的概念范围 (conceptual scope)。项目的诠释框架既关乎艺术品，也与众包本身有关。从这个角度来看，众包项目在本质上以“元” (meta) 的形式向策展实践提出问题。策展人的声音、机构的权威性，以及众包方法所带来的问题，一直是项目从开始到结束时讨论的焦点。

### 观众

观众，或者称之为观众群体更为恰当，一直是博物馆从业者关注的首要问题。从博物馆机构创始之初，观众就界定了其身份，并影响了展览和相关项目的发展。博物馆不仅在业务上有应对观众需求和期望的义务，还要最大限度增加门票收入，或是在免费参观的情

4 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藏品目录中以版画和油画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加入相对不那么丰富的其他类型的展品会显得不平衡。



况下设法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在这方面，大学博物馆和美术馆面临着双重挑战：既要通过严格遵循课程内容的展览来吸引校内的观众，同时也要举办适合学术界以外的社区成员的项目。

作为众包展览项目，“市民沙龙”的目标是在为参与我们活动的观众提供耳目一新的素材和方法的同时，吸引更多的新观众前来。实际上，此次展品的选择要同时兼顾学术课程内容以及对大众的吸引力，为此要尽量避免对其中任何一方的偏好做出假设。毕竟众包这种形式本身就是了解观众的一种策略。



图 3  
“市民策展人” 菲·安德森  
(Faye Anderson) 与她为“市民  
沙龙”挑选的艺术品合影，  
2018 年 12 月  
拍摄：埃里克·苏卡尔

随着观众成为创作者的代理人，组织者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也因众包而发生改变。由于要对最终成果负责，观众高效地投入精力，更为积极地参与展览和相关项目。策展领域的高级专家和非艺术界人士在谈及对本项目的看法时，都承认展览的包容性是令人满意的。一位记者提出了“市民策展人”(citizen curators)的称谓，我们将继续用以称呼所有的“市民沙龙”参与者。<sup>5</sup> 这样的统一称谓有助于体现项目的民主性，所有参与者无论是否拥有艺术方面的经验，都具有同等价值。

对于观众群体，我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针对完全不同的群体进行推广。制定市场营销计划时，我们将观众划分为教师、研究生、本科生、艺术界同仁，以及普通公众，并设计了不同的推广活动。为了表达对听取观众心声的兴趣，我们还根据每个不同群体调整宣传用语。在发给教师和研究生的电子邮件中，我们会强调他们的专业知识（与学科无关）能为此次展览作出重要贡献。与此同时，我们会强调艺术界的同仁，包括大学博物馆与藏

5 路易莎·谢波德 (Louisa Shepard)，《邀请市民策展人》(Engaging Citizen Curators)，《今日宾大》(Penn Today)，宾夕法尼亚大学，2018 年 12 月 14 日，<https://penntoday.upenn.edu/news/engaging-citizen-curators> (访问日期：2019 年 11 月 29 日)。





品委员会 (UMAC) 在艺术领域的专业性和国际视野。而在与来自不同院系的本科生进行交流时, 我们采取了较为轻松的语气, 并播放专为社交媒体制作的宣传视频。面向公众发布的推广活动, 则将“市民沙龙”定位为一个没有门槛的互动项目。

一旦确定了观众, 组织者需要调整常规的推广渠道。举例来说, 与其他的大学一样, 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的周边社区服务水平非常一般。作为一项策略, 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当地的社区会议上、公共图书馆里推广这个项目, 以吸引校外人士的回应。我建议针对任何提倡包容性的众包项目, 都可以创建一个通过公共网络信息站 (web kiosk) 访问的版本, 或者甚至是由社区联络员负责分发的打印版本。毕竟有很多人并不是整天坐在电脑前高速上网, 让他们获得信息可以扩大项目的覆盖范围。



图 4  
黑客马拉松参与者  
与她在亚瑟·罗斯美术馆  
“市民沙龙”基于数据的分析项目  
拍摄: 希瑟·莫克塔德利

### 数据——提供量与获取量

确定展览范围和观众对象之后, 接下来就是为众包参与者提供他们所需了解的内容, 以便做出自己的选择。这里就涉及提供多少信息量的问题。某些众包项目更适合完全使用可视化的数据, 其他一些项目则可能需要基于文本的信息。对于“市民沙龙”来说, 由于观众艺术鉴赏水平的多样化, 我们决定在众包数据库中采用内置在线藏品说明标签的方法。具体而言, 如果原来已有说明标签, 我们会对其进行一定的修改; 如果原来没有标签, 我们会邀请工作人员和实习生团队创建新的标签。在标签用语方面, 我们尽量做到浅显易懂, 主要是考虑到大部分市民策展人做出选择时, 可能只会以相关艺术家及其艺术品的一般性描述为依据。

众包项目的交付方式会影响其最终结果, 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信息呈现方式的公正性。在线艺术品数据库 (online art databases) 中, 占有优势的往往是姓名首字母排名靠前的艺术家, 或是排列更整齐、分类更明确的艺术品。这种传统的信息层级结构, 可能会导致观众更多关注位置优先的作品, 而忽略掉其他同样优秀的作品。鉴于“市民沙龙”的众包选择范围同时涵盖了享誉艺术史的经典人物以及鲜为人知但颇具潜质的作品, 为了减少视觉上的偏见, “市民沙龙”的网页开发人员创建了每次加载时都会重新刷新和随机排列作品的视图界面, 保证图像排列不会重复出现。最初设计界面时, 开发人员还加入了可选择的分类过滤器和艺术家下拉列表, 但为了简化操作步骤, 最终还是移除了这些过滤器。



在思考应该提供多少数据量的同时，另外一项同样重要的工作就是从众包参与者那里获得数据。为避免参与者不堪重负，“市民沙龙”众包项目最初的数据采集量很小。参与者会被过多的附加信息字段吓退，在开始阶段的数据采集过程中，需要提交的字段越少，就能确保更强的参与度。后续自动发送的电子邮件调研，可以补充采集更为详细的数据。“市民沙龙”的数据被自动存储在一个在线数据库中，站点管理员可以随时以 .csv 文件格式下载这些数据。此外项目还添加了额外的安全措施，以防止参与者重复投票。虽然并非每个项目都有这些需要，但建议在编写程序时加入必要的限制内容。

机构有义务让众包参与者知晓他们所提供信息的用途，并且任何数据采集都应附带有相应的隐私政策条款。一般说来，用户有权利了解这些信息是被如何使用，以及是否会被公开。众包项目的策划者从一开始时就应考虑使用观众所输入信息的方式，并通过隐私政策声明予以明确传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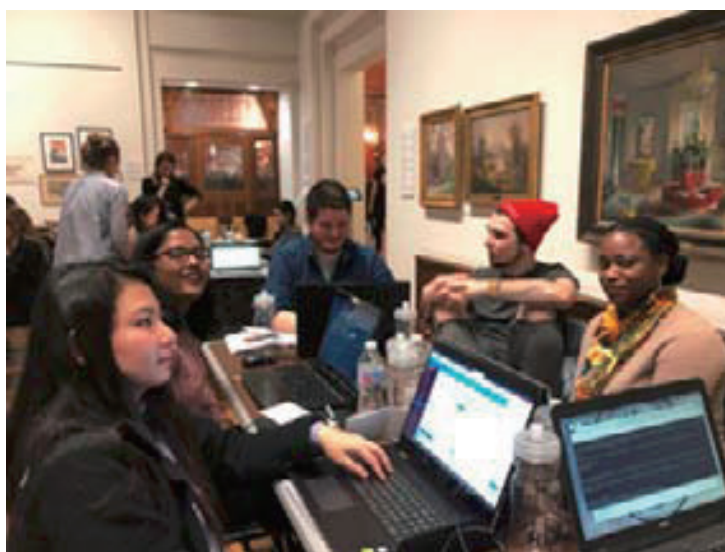


图 5  
“市民沙龙”黑客马拉松活动的  
参与者  
2019 年 3 月 13 日  
拍摄：希瑟·莫克塔德利

## 结果

“市民沙龙”的本意，是通过大学提供的一组特定的艺术藏品，选择一批愿意参与的观众。然而在众包项目进行的过程中，这个观众群体已有所扩展。展览结束时美术馆邮件列表的数量增加了 15%，除了在众包过程中选择加入的人群以外，应该还有人是被附属项目的一系列活动所吸引的。本着“以市民为中心”的展览精神，我们为参与者举办自由发挥的创意活动：手写工坊（hand-lettering workshop）、创意写作工作坊系列（creative writing workshop series）、数据可视化工作坊（data visualization workshop），还有黑客马拉松（hack-a-thon）活动。

作为这个项目的始创者，我的目标是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艺术展览的观众希望通过参观获得何种体验？在仔细查看了最终版的 .csv 文件的评论栏后，我发现无论学术观众还是社会公众都会采取内外并进的解读方式。参与者在阐释描述自己所选择的艺术品时，既向外看也向内看。外向型的评论关注艺术作品能否揭露社会问题。市民策展人往往会将当今时事政治与艺术品的解读联系起来，甚至几十年前的作品也不例外。内向型的评论则显示出将艺术品与自己生活经历联系起来的兴趣。

就我个人的策展实践而言，这种内向型和外向型兼有的二元评论模式，将促使我今后以全新的视角诠释展览项目。作为大学美术馆，我们可以推广这一理念，向校内和校外的



观众传递信息。“市民沙龙”是一个范例，为观众和组织者提供了直接交流的渠道。作为其核心的数字众包模式，更可为那些希望更深入了解观众的美术馆和博物馆量身定制。如欲获得更多相关信息，请访问 <https://ArthurRossGallery.org/Citizen-Salon>。

### 致谢

“市民沙龙”项目是由亚瑟·罗斯美术馆与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收藏 (Art Collection) 合作开发的。感谢亚瑟·罗斯美术馆执行馆长兼大学业务负责人林恩·马斯登·阿特拉斯 (Lynn Marsden-Atlass) 对众包策略的支持。同样感谢我的合作组织者、大学艺术收藏的经纪人林恩·史密斯·杜比 (Lynn Smith Dolby) 为本项目所投入的热情与高超的管理才能。

### 联系方式

Heather Moqtaderi, Assistant Director and Associate Curator

Address:

Arthur Ross Galler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20 S. 34th Street

(Housed within the Fisher Fine Arts Library building)

Philadelphia, PA 19104

USA

Email: [hgm@upenn.edu](mailto:hgm@upenn.edu)

[ArthurRossGallery.org](https://ArthurRossGallery.org)

### 关键词

Curatorial Studies, Crowd-Sourcing, Exhibitions, Audience Engagement



# 弥合隔阂与消除障碍： 大学生使用西班牙语和借助 博物馆开展“包容性”实践

Karina Elizabeth Vázquez, Martha Wright / 文  
骏仁 / 译

## 摘要

里士满大学 (University of Richmond, UR) 的拉丁美洲、拉美裔和伊比利亚研究系 (Department of Latin American, Latino & Iberian Studies, LALIS) 与里士满大学博物馆 (University of Richmond Museums, URM) 共同开展了名为“流动的博物馆” (Museo Ambulante, MA) 的合作项目, 让西班牙语学生将博物馆的藏品带到当地社区, 与社区成员一同体验感受。“流动的博物馆”项目让博物馆藏品走出校园带进社区, 通过基于实物的感官学习, 并采用西班牙语作为交流语言, 创造了教学范式的转变。这种体验能调动所有参与者的主动性, 让他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积极地发现和学习。对于大学教授和博物馆策展人来说, 这个项目让他们在理论上探索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从而将包容性从教学理念转变为一种可实现的体验。



## 引言

在《无知的教育者：智力解放五讲》(*Ignorant Schoolmaster: Five Lessons in Intellectual Emancipation*) (1991) 一书中, 作者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拓展了约瑟夫·雅科特(Joseph Jacotot)提出的教育和教学法概念, 他指出解释性语言是一种教学神话, 对于随着现代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各种不平等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学生永远不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发展中国家也永远无法赶上发达国家。”<sup>1</sup> 雅科特认为教师的作用是指导和陪伴学生达到自主学习的境界。在他看来, “解放”(emancipation)是自主学习的核心, 它能让學生去提出问题和生产知识, 而不是复制信息。“信息复制”(reproduction of information)会固化教育系统内的特定层级和体系, 而“解放”则可以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自主学习责任意识。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校园和博物馆开始关注人口统计表征(demographic representation)、参与式的教学和学术研究(engaged pedagogy and scholarship), 以及社区参与(community engagement)这类问题的情况下, 包容性和多样性已经成为提出合作倡议的概念性目标。

当前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和移民潮带来的社会文化和人口的重大变化, 造成大学人群结构的多样化, 作为第一代移民的学生数量也有所增长。在这种情况下, 除了关注人口统计学变化以及大学教学与学习的内容和方式以外, 我们还应该更多地思考一下教与学的时机问题。在这个方面,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课程安排, 更多地关注人口结构变化和社会不平等的现象, 通过教学方式的变革来应对多样性的趋势。我们需要采用能影响社会文化代表性构建的包容性教学法(inclusive pedagogy), 而这样的教学法需要同时考虑到阶级、性别和种族等多个维度以及社会和机构权利结构的发展和变化。要做到这些, 除了重新思考如何在教学中解决“差异”带来的影响以外, 行政和教职员工们更应该学会接受情况随时可能变化的这个“现实”。要实现包容就必须要将转变视为机构和教学的“常态”, 而变革性的教学法则意味着要应对课程和课堂两个方面的变化与挑战。行政人员和教职员工们一直在共同努力寻求教学法的创新。然而, 除了课程实践方面的探讨以外, 这种创新事实上还涉及机构和社区成员的权责变化: 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代表身份的争议, 包容性教学法导致的机构(自我)身份问题, 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地帮助大学生认识自己在社区中的作用。面对这些问题, 如果能通过课程设计建立学生与社区之间的辩证性联系, 我们就可以让学生们走出被动接受知识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 让他们真正深入社区, 通过主动实践去体验社会权利结构, 再通过不断地总结和反思来实现学习的目标。

最近, 在社区式学习(Community-Based Learning, CBL)和博物馆教学法两个领域的课程创新和研究表明, 主动学习是促进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的一个关键要素。社区活动能够将课堂教学材料与感官体验联系起来, 让原本只能被动接受信息的学生有意识地逐渐学会自主学习。这需要学生、教师和社区成员共同协作, 并且让他们分别扮演多重角色的社区项目以培养自主性和责任感: 其中学生作为信息/活动的创造者和互动活动的管理者, 需要与社区合作伙伴进行对话并化解不合理的文化和社会性隔阂; 而教师/社区合作伙伴则需要作为顾问、支持者、利益相关者和协调员, 为学生的自主活动提供空间。项目场地的选择原因如上, 但为何社区式学习要使用西班牙语呢? 一方面, 语言和社区式学习的结合让项目超出了社区的范围。这种结合能磨练学生的批判性学习能力, 有助于他们发现自己在第二或第三语言环境中的身份。学习另一种语言再将其用于双语环境的过程能让人学会聆听和感知他人, 发现自身的微妙转变并最终发现自己在新语言环境中的身份。另一方面, 通过用第二或第三语言投入社区式学习活动, 学生能够用正在学习的语言帮助合作社区获得更多服务和资源, 同时促进分享、社交以及对文化差异和社会现实的关注与质疑。

---

1 (第 XX 页, 原译者注如此)





## 目标

在本文中，我们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索西班牙语社区式学习与大学博物馆（Spanish Community-Based Learning and University Museums, SCBLM）合作项目及其作用。除了说明这些项目能够创造出突破性的、可推动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学习体验以外，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对包容性问题教学法的关注，以及引导学生去分析各类社区成员所面临的复杂社会现实，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包容”的涵义。在理论方面，本文将主要探讨主动学习促成两类转变的时机（而非方式或领域）：其一是能催生自主性和智力解放的教学/学习动态；其二是能促使个人尝试实践“包容”的自我实现路径。本研究的开展获得了里士满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University of Richmond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URIRB）的批准。

我们认为，对于学生/教师/社区伙伴来说，自主学习代表了一种认知上的转变，即以超越形式分析的眼光去看待所遇到的事物，更注重思考和谈论事物与我们自身的联系（例如，社会/本地的历史是如何创造我们所处的社会并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发现“流动博物馆”很重要的一项成果，就是让学生们学会如何通过亲身体验去获得知识。这个活动能提升学生的批判分析能力，让他们更加自信，并逐渐从被动的学习者转变成为类似于教师们那样会主动获取和运用知识的人。“流动博物馆”那样的环境能促使学生们自主且负责任地进行研究、生产与传播信息，并且让学生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合作社区的普通民众，帮助他们中的很多人获得平时难以得到的博物馆体验。除了练习和掌握第二语言外，“流动博物馆”还让学生有机会自主行动并由此形成自主意识，通过反思和积累自信来达成“智力的解放”（即不需要老师也能学习第二语言）。通过这些学习和行动的过程，学生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去解构包容性和多样性这两个概念<sup>2</sup>在学校和社会环境下的意义。

## 西班牙语社区式学习与大学博物馆合作项目

自 2017 年春季以来，“流动博物馆”已经成为连结里士满西班牙裔/拉美裔社区（Hispanic/Latino communities）的一项重要活动。活动创建的连结纽带，覆盖了大学的西班牙语教师、里士满大学博物馆的教育者、里士满大学的双语学生、当地高中的教师、学生及其家人，以及会说或者正在学习西班牙语的普通社区民众。作为一项包容性实践和参与性项目，“流动博物馆”能让当地的西班牙裔/拉美裔社区获得更多的文化和教育资源，同时还能团结更多人一起去更多地了解和评估里士满西班牙裔/拉美裔社区的需求和面临的挑战。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区目前的总人口为 128 万人，其中 57.9% 为白人，29% 为非裔美国人，5.89% 为西班牙裔/拉美裔。在里士满市区，西班牙语是最主要的非英语语言，萨尔瓦多则是最主要的未归化居民的原籍国。里士满的西班牙裔/拉美裔社区主要集中在市区周边的三个郡，而里士满大学就位于其中的亨利科郡（Henrico County），并且从大学开车很快就能达到另两个郡。除了培养文化和社会意识以外，“流动博物馆”更重要的目标是让大学生真正走入社区并培养他们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他们去熟悉和了解西班牙裔/拉美裔社区的文化和社会形态，并且学会熟练地使用西班牙语交流。

“流动博物馆”有两大支柱，分别是名为“社区西班牙语”（Spanish in the Community, LAIS301）的中级西班牙语课程，以及里士满大学博物馆。作为拉丁美洲、拉美裔和伊比利亚研究系提供的课程，“社区西班牙语”课程提供了社区参与（Community Engagement, CE）活动，并且是主修/辅修西班牙语学生的选修课。由于“社区西班牙

2 我们认为“多样性”（diversity）不同于“多样的”（diverse），并且两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相悖的。正如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对“多样性”一词在高等教育领域运用的反思：“……‘多样性’是官方声明的常用语（从使命声明到平等政策的声明，以及宣传手册和标语等），也用于图像化的表达（不同肤色人群的笑脸照片拼贴），这些图像一眼就能看出体现了‘多样性’……‘多样性’的语言可以被规范使用，用来表达一个组织的首要任务、价值观或承诺……”（52）。作为一个涵义复杂的词汇，“多样性”被用于定义表征经济的政策和权力动态，而非多样的、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以及相关人群的需求和权利。正如艾哈迈德观察到的，“……‘多样性’这个词的问题在于，它有被试图挑战不平等的计划所‘割裂’的潜在可能……制度上对‘多样性’一词的偏爱缺乏改变承诺的标志，甚至可能允许大学之类机构掩盖体系上的不平等运作……我们可以将‘多样性’视为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应对差异性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多样性’可以成为遏制策略的一部分”（53）。



语”课程已经被列入大学的教学计划，与里士满大学博物馆之间的合作无需另行申请批准。通过实施“博物馆学术与公众参与的助理策展人”（Assistant Museum Curator of Academic and Public Engagement）计划，“流动博物馆”让大学的西班牙语学生带着博物馆的部分藏品走进当地的西班牙语社区。

“社区西班牙语”课程由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志愿者可以参与博物馆联合策划的社区参与（CE）、内容导向式对话（content-oriented conversation），以及社区式学习项目（CBL）（除了“流动博物馆”以外，每个学期都有校园博物馆之旅）。社区参与项目需要每名学生志愿者选择一个正在为里士满西班牙裔/拉美裔（以下简称“西/拉裔”）提供服务和帮助的社区合作单位，包括学校、社区中心、诊所、法律援助办公室、辅导和课后补习项目、难民项目和老年人活动中心等。选定社区合作单位后，学生志愿者需要保证在 9~10 周的时间内，每周为这个单位提供 2~3 个小时的志愿服务。参加志愿服务期间，学生需要通过课堂演讲、期刊、报告、座谈等分享自己的感受，最后还要提交一篇评论文章作为总结。课程内容方面，“社区西班牙语”课程关注西/拉裔的经历、美国的西班牙语社区以及大学博物馆社区式学习项目的合作伙伴。此外，为了帮助学生为大学博物馆作为合作者的社区参与和社区式学习项目做好准备，课程还提供了对西/拉裔社区社会和人口的统计分析（资料来源包括短文、期刊文章、访谈、统计数据等）。

完成整个课程学习后，学生们可以了解美国的西/拉裔人群的构成和分布，并对身份和社区等概念背后的社会权力结构形成自己的认识。而社区参与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里士满的西/拉裔社区所面临的社会现实，这让他们有机会去了解和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培养他们推动变革的意愿。通过这一过程，学生们可以结合其他方面（社会融合、文化融合、包容性、文化霸权、社会不平等、阶级、性别和语言学），对当前存在的语言政策、种族和民族观念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在认知和语言层面，学生们会去解构、认识和描述与全美的西班牙裔/拉美裔社区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各种社会现象。学期结束时，学生将基于社区参与和社区式学习的博物馆项目经验，重新审视之前已经阅读过的各种资料，由此发现“西班牙裔/拉美裔”一词中所具有的主观性，以及相关公共和政治话语之间的不一致性。通过反思课程期间的所有经历，学生们将学习内容融入变革性的视角中，从而对这个世界以及他们自身形成全新的认识。

作为第二个支柱，大学博物馆的作用则是鼓励基于感官的信息访问与分享。提供博物馆藏品能让学生们接触到实物，并利用藏品为社区参与者创造分享与交流的叙事环境。“流动博物馆”的展示内容都来自博物馆，后者拥有不同的形式（从地质标本、文化遗物到纸质作品）和立意（从风景和肖像到政治讽刺和抽象表达）的各类藏品。策展人会按照主题（花卉与动物、个人情感与身体、岩石与矿物、化石与贝壳、家庭与移民）以及西班牙语的熟练度要求对物品进行分组。具体来说，“流动博物馆”的实物标本主要来自罗拉·罗宾斯自然设计画廊（Lora Robins Gallery of Design from Nature），纸质作品的复制件则主要来自乔尔和莱拉·哈内特印刷品研究中心（Joel and Lila Harnett Print Study Center）。参加活动的大学生与策展人见面，讨论具体的展出计划，包括与物品的互动模式和交流方式，后者的重点是要照顾到观众的西班牙语水平。每次展出活动持续约一个半小时，其中包括三场 15 分钟的讨论和三场与主题相关的活动（例如单词搜索、艺术词汇配对、叙事写作和角色扮演等）。通常情况下，一个学期可以举办 4~5 次“流动博物馆”展出。值得注意的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仅覆盖从幼儿园到 12 年级（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儿童教育（k-12）。从 2017 年春季到 2018 年秋季，共有 221 名学生（这个数字不包括其他来自社区的合作伙伴）前往 k-12 学校举办了 8 次“流动博物馆”展出。

### 理论支持

“流动博物馆”的运作通过基于对象的学习（object-based learning），这是一种经过广泛探讨且被很多学术和机构博物馆采用的学习模式。本质上看，基于对象的学习就是指通过与博物馆的藏品（种类不限，包括艺术类藏品、自然历史类藏品等）的互动，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找到自我、藏品与课堂内容三者之间的联系，最终形成对相关知识和



认知的长期记忆。其实这种模式就是利用博物馆的藏品支持教学,帮助学生通过藏品本身及其历史,理解课堂内容的含义(包括对学生自己的意义)。对于这种模式,胡珀·格林希尔(Hooper-Greenhill, 2000)曾指出,物品本身没有传达意义的功能,但在教学环境下能够用于塑造意义,乃至进一步成为机构(博物馆)与参与者(观众)之间进行思想交流的媒介。此外,达德利(Dudley, 2010)还提出通过多种感官与物品进行互动,有助于加深学生对物品的感知,而直接的触碰,能让人们获得仅仅依靠文字和观看所无法得到的多维度感知和学习。最后,鲍恩(Bowen)、格林(Greene)和基西亚(Kisia, 2014)的研究还表明,即使一次与艺术品或其他博物馆藏品偶然的互动,也同样有助于提升参与者的观察技巧、批判性思维和知识记忆。

对于参与“流动博物馆”的大学生来说,博物馆藏品已然成为与观众交流的媒介,一种可以用来共享和共同创建叙事的社交对象。西蒙(Simon, 2010)就曾写道:“每个博物馆都至少拥有一件可以启发对话并充当社交对象的藏品,这就意味艺术品成为社交物品……这样的物品有助于人们将注意力从彼此身上移开,并由此带来更舒适的人际交往体验。”在教学领域,将艺术品作为社交对象让很多平时容易引发不快的开放式讨论(open-ended discussion)成为可能。迪马斯(Dimas, 2016)也指出,多年来的很多研究都支持使用物品来辅助教学,并且认为物品的好处在于其本身没有定义或取向,这更有利于开放性的阐释。对于学生来说,艺术品让他们能够在不透露个人经历的前提下发表更多个人观点。对于这一点詹森(Jensen, 1999)提出,将博物馆藏品引入课堂有助于学生关注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更深入地思考权力斗争、冲突、战争和爱情等各种问题。作为社交对象的艺术品也能够成为学生与社区成员的交流媒介,激励双方更深入地探讨共同关注的话题。

施瓦兹(Schwartz, 2008)认为,让学生去组织协调大学博物馆的展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五大素养(语言表达、视觉、技术、社交和批判意识)。基于这个观点,马斯汀(Marstine, 2007)还补充道,大学博物馆有足够的的能力抗拒风险,可以尝试多样化的设计和观点,让学生有更多机会直接参与非典型的博物馆和展览项目。马斯汀(2007)和金斯利(Kingsley, 2006)都指出,前述项目有助于培养博物馆领域的相关素养(例如,深入分析博物馆空间和展品放置,以及相关教学法等),并让学生有机会用自己的方式创造新的叙事环境。培养五大素养有助于学生掌握用多样化的方法,进行批判性分析。“流动博物馆”能让学生带着批判性的眼光评估博物馆的藏品,然后在展出体验方面发挥自己的创意。除了体现基于对象学习的传统优势以外,项目还进一步推动了更大范围的自主评估(包括藏品选择和校内社交讨论,以及观众在不同展出体验下的回应)。

虽然通过接触和分享博物馆藏品产生了共同话语,但在共享的空间中,藏品、学生主讲人和观众之间此消彼长的多层次叙事,则是通过肢体和表演来实现的。博尔(Boal, 2008)曾提出,教学法的一个关键就是让学习者直面未知情况,让他们发现新的想法,并敢于质疑固有的观念和思想。身体是知识和学习的载体,人们依靠它接触彼此、空间和物品,并在同时产生话语、动作、感受和反应。在博尔(2008, 85)的戏剧研究中,他使用了“知性”(dianoia)的概念来解释戏剧角色的思想与观众思想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一旦观众能够换位思考,将自己从被动的观察者转变为能够改变剧情走向的表演者,他们会有“茅塞顿开”的感受。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身体视为自主评估的部件,能够改写意义的动态外表,而不再是静态的实体。正如塞雷(Serres, 2011, 68)所指出的:“……所有思想上的理解……都不可能先于感官存在:如感官无形像,理智亦无心念(nihil est in intellectu quid non prius fuerit in sensu)。然而,在始于感官的道路的尽头,饱学让位于睿智”。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学习(本文特指西班牙语)、内容反思、社区参与(CE)的结合,以





及“流动博物馆”，都是在促成情境认知，这是一种由身体开始产生思想并最终实现认知突破的特定通道，类似于“……大脑、身体和世界的流动融合”（皮兹·泰勒，PITTS-TAYLOR, 2016, 51）。因此，学生对身体存在的认知与多样化的社区进行互动后，就能发展出对自我和对他人的意识。

类似的观点还有很多，安娜·梅尔克（Anna Maerker, 2015, 285）的研究将身体作为认知对象，分析不同空间环境对于身体接触的重要性，并审视了博物馆展览中感官的作用以及展示对象的物质性。梅尔克（2015, 286）关注的是从以视觉为导向的博物馆教学，向以触觉为中心的观众与展品进行互动的转变，提出触觉是知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动博物馆”本身就包含了这种教学上的改变，除了让学生进入不同的空间环境，观众也能亲身体验不同以往或非传统的博物馆展览，将这两组人群置于同一个环境中，随着交互的进行，流动的界限超越了展示空间，作为另一种触摸形式的手势（重新）设定了意义。通过这种方式，两组人群都积极参与并重新设定了双方都认可的能被纳入或排除的领域。康斯坦斯·克雷松（Constance Classen）从历史的视角考察了触觉（CLASSEN 2012），指出其具有治愈和交流的功能，作为替代触摸的手势始终贯穿在“流动博物馆”的整个过程中，有助于参与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并与物品和空间达成共鸣。<sup>3</sup>

同样的，克里斯蒂娜·克雷普斯（Christina Kreps, 2015）也表示博物馆是感官转移的空间，是体验学习和参与实践的实验室。“流动博物馆”模式与西班牙语社区式学习（CBL）课程的合作，进一步拓展了上述体验的范围和性质，让博物馆与更多人群接触，成为促进包容性的工具，并且融入了语言维度。此外，“流动博物馆”还为参与者提供了全新的体验和发现物质文化的机会，为社会和解奠定了基础。基于博物馆教学法的互动式和体验式的语言学习模式（SEDERBERG 2102\*, KRAMSCH 2012, VÁZQUEZ & WRIGHT 2018），能够通过志愿者的工作、内容讨论和跨学科合作，调动起学习者的感官和理解力，与博物馆机构（SEDERBERG 2012, 76）和语言资源（VÁZQUEZ & WRIGHT 2018, 127）进行的合作，促进了学习与公民参与之间的联系，有效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提升博物馆机构的公众知晓度。

### 项目动态

SCBLM 项目的运作需要时间，也需要社区合作伙伴、策展人和教授之间的充分交流。为了规划“流动博物馆”，西班牙语教授和策展人需要先接触有意向的社区合作伙伴（包括公立和私立的 K-12 学校、老年社区中心，以及家庭范围的社交聚会），介绍可供选择的主题，询问对方是否有兴趣在本学期内进行合作。通常情况下，需要在学期开始前 3 周完成前述工作，这样学校老师能有时间安排课程和后勤服务。学期开始后的第 2 周，策展人和教授就要向学生们介绍相关项目，并且根据社区合作伙伴和大学学生的情况安排博物馆的日程。随后，学生 3~5 人为一组，与策展人开会讨论“流动博物馆”的主题，根据观众的年龄、语言能力、人数规模、背景以及其他社会文化因素设计活动内容。策展人提供给学生有关展品的初步研究成果、讲解材料和视觉思维策略，并举例说明如何将小组活

3 触觉作为主动学习的一部分，让教师重新思考社区式学习（CBL）项目的范围和性质，特别是当学生和社区成员认识到每个人面对的现实状况后所具有的影响和意义（MAERKER, 2015, 第 286 页）。然而同时，我们应该如何处理那些通过人体的情感和肉体传递、与课程内容和学生体验学习有关的信息呢？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学生们提供西班牙语的导览服务，他们通过肢体动作，包括与他人进行交流，从知识和情感的层面呈现对周围环境的评价。因此，这个项目提升了学生的认知：“颠覆了有关认知的经典概念，即一般的、普遍的、抽象的和象征性的。取而代之的是，意义来自心灵与环境的互动。与抽象化的普遍认知不同，情境认知更适合用来检验‘实现认知素养特定路径的认知的认识的重要性’。”（PITTS-TAYLOR 2016, 43）

\* 译注：原文如此，应为 2012。



动与调查相结合。到目前为止,学生们已在课堂上探讨了里士满的人口统计数据、当地的西班牙裔/拉美裔社区,他们讨论了西班牙裔和拉丁美洲裔的分类问题,并且开始着手双语教育和移民问题。

到了学年的第 5 周,学生们已经开始与当地社区伙伴每周开展社区活动(通常是参加“流动博物馆”的不同班级)。在接下来几周的上课时间,学生们以小组的形式聚在一起推进项目。学生们在第 10 周已经为呈现“流动博物馆”做好了充分准备。一旦与策展人商定大致计划后,学生们就可以用西班牙语编写活动脚本。教授参与讨论并修改计划,协助学生编辑脚本。举办“流动博物馆”的当天,教授会带领学生面对观众,观察他们与观众的充分互动。学生们需要分享信息、勇于讨论,积极加入与社区观众之间的问答,促进语言联系。虽然大多数的小组在一开始时会有所保留,安静地观察,但往往到了活动结束后他们都已经熟悉且愉快了。活动结束后学生们需要将藏品归还给里士满大学博物馆,并在课程作业里写下对项目过程的思考,还要写进学期末的(面向全班的)专题讨论报告和最终论文中,这些都要使用西班牙语完成。所以说,作为完整的批判性反思的一部分,“流动博物馆”连结了学生在社区里的个人体验和集体的课程体验。正如学生们所说的那样,项目完成后他们会感到自己成为了更大的社区的一份子和推动变革的实践者。

回到安娜·马可的理论,即空间环境与身体接触对于促进同理心是至关重要的,还有克里斯蒂娜·克雷普斯有关参与实践的观点,当学生参与“流动博物馆”项目并与 k-12 观众进行交流时,他们就能够应对和解决包括社会认同(语言、文化、民族等)、社会阶层,以及诸如教育资源或课堂语言包容问题等体系不平等在内的相关问题。“流动博物馆”的各个方面,包括教室设置、师生动态、课程准备以及学生和老师的参与意愿等,构成大学学生接触和参与的动态空间环境。

k-12 的观众群体涵盖了从初学者到继承语和母语习得者。大学的学生通过“流动博物馆”可以直接接触到年轻的社区成员,将使用西班牙语作为分享经验的优先选项。对于大学的学生来说,西班牙语可以成为一种转化性的学习体验。在这里,他们看到了积极参与和使用西班牙语的好处,包括改变(尽管只是在小群体中)对语言认同和社会文化认同的看法。项目所带来的社会文化体验,让学生们更加确信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掌握两门语言。学生们还表示,博物馆的藏品为他们与社区建立了联系。对于社区而言,这也意味着能够接触到更多事物:通过项目能够得到很多平时因各种缘故(交通、财务、语言和社会顾虑)而不易获得的公共资源;老师们可以借助项目的丰富资源补充并强调课程内容,尤其是语言学方面,例如新的词汇、语法结构和内容等(特别有意思的是“流动博物馆”有效帮助学生将自己的第二或第三语言,与英语课程习得的语言技能联系起来);项目将社区与博物馆的藏品连接在一起,提升了博物馆的社会形象;项目以双语的形式促进了具有包容性的博物馆藏品体验;更重要的是,项目将博物馆的教学角色从被动展示和单向指导,转变为主动进行多层次的细微分析和共同构建叙事。此外,项目为学生提供了工具,强化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将课堂知识应用于博物馆藏品,让学生充分掌握自主规划和执行的经验。这些都为自主学习的养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助于释放学生并使之成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自学者/学习者。

### 结论与探讨

通过大学学生的反馈,可以看出 SCBLM 项目的“流动博物馆”在教学和哲理两个方面产生的影响。学生的期末论文更是批判性地整合了对社区式学习(CBL)体验所得的反思,





包括对座谈会的观察,对社区参与(志愿者工作)的思考,以及他们针对课程材料的课堂讨论。<sup>4</sup>通过期末论文可见,整个项目已超出了使用西班牙语展示博物馆藏品本身。尽管“流动博物馆”项目始于课堂(小组活动、课程和阅读),但在与教授和策展人进行合作、共同设计项目框架、支持学生参与的同时,让学生关注情感中的意识成分——即学生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博物馆藏品以及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流。项目所提供巡展的重点不在于活动组织,而是能够真正拥抱社区。项目本质上是非静态的(身体活动,语言、智力和情感的流动),融合了来自社交体验的所有感官并创造出一种能量。正是由于在项目中体验和反思不断交织的持续过程,才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转变。

学生们的反馈中,一些核心主题涉及到西班牙裔/拉美裔人群(尤其是儿童)每天在学校面临的艰难困境,同时也包括双语教育的价值,以及如何通过变革让社会更加开放、包容和多样化,尽管这并不一定容易实现。学生们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变革性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讲,多样性并非是指维持现状,而是个人、社会和机构价值观转变的结果(AHMED, 2012, 57)。学生们还阐述了 SCBLM 项目的教学法是如何提出包容性的问题,并让他们有机会了解包容性的复杂程度,以及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举例来说,学生 C.V. 表示,“(我)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比方说怎样用西班牙语来向孩子们解释难懂的术语,那可真不容易,用西班牙语帮助他们拓展科学主题的知识,他们都听得很认真。”展示博物馆的藏品并与之互动,

……是很好的教学工具,因为孩子们能看到和触摸我们正在(指导他们)去做的事……孩子们都非常喜欢这个活动,能认真听讲,其实我还挺意外的。我认为在课堂上读到孩子们在学校里的感受,更让我意识到学说西班牙语的重要性……我很喜欢这种体验过程,让我有了当老师的感觉。

学生 E.O. 也有类似的看法:

活动的效果很好,因为孩子们必须听从我们用西班牙语发出的指令。我觉得,在不同语境下使用西班牙语,有助于我们学习更多的词汇。这样的学习经历让我看到了双语教育的重要性,原因有很多:其中一点是我们能学到更多不同的词汇,另一点是我们能够理解那些母语非英语的人群。

以上两名学生的经历,都证明了通过活动能帮助学生理解观众们所面临的现实状况。他们也认同自己是社区的活跃成员,他们的行动能对其他社区产生直接的影响。他们超越了“界限”,从被动的观察者或旁观者转变成为变革的积极推动者。

对于其他学生的影响则在于加深了对不同社会现实的认识,尤其是与移民和教育机会相关的问题。对此,学生 S.C. 表示:

我希望自己毕业时能具备使用双语的能力,所以在学期开始时就选择了这项课程,但当时我并不了解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不知道他们每天要面对的困难……我开始理解他们的难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我对自己掌握双语的目标越来越有信心,也更多(理解)西班牙裔/拉美裔社区所面临的问题。……与中小孩子们在一起的两个主要影响:其一是能够证明西班牙语很吸引人,我希望

4 学生需要完成的内容包括 3 份社区参与(志愿者工作)的报告,1 份关于社区式学习(“流动博物馆”)的报告,针对研讨会上其他同学所作报告的笔记,以及一些简短的阅读材料读后感。最后完成的一篇文章要求学生整合这些思考,阐述与美国的西班牙裔/拉美裔社区和(或)西班牙语使用状况有关的特殊社会现象。



用西班牙语同他们交流……这也是我在抵抗（学校里）“唯英语”运动的政治影响；其二是孩子们使用第一语言也能够提升他们学习的效果……

将自己视为改变他人生活和日常现实的推动者，让学生们具备了包容性：即集体 / 个人的共同努力，以及将平等包容置于首位的社会和公民责任感。

学生 Z.P. 在双语环境中长大，且从小就说西班牙语，他特别留意到：“班级中的一些人（他的同龄人）提出西班牙裔 / 拉美裔社区的学校往往面临的问题是资金短缺，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来说问题尤为严重，因为他们无法缴纳更多可回流的税金，大多数孩子的第一语言是西班牙语，但教学使用的却总是英语……这种情况在里士满的公立学校是非常普遍，对于本地众多的西班牙裔 / 拉美裔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流动博物馆”项目帮助学生认清当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这样他们就可以自我思考，

我们该如何通过积极的干预来推动社区，让人们看到他们能够做出改变（无论多么微小）。为了能在观众面前满怀感情地用西班牙语表达，他面对镜子练了很多遍……这很有挑战性，因为必须口齿清晰且流畅地表达。这类项目很好地将文化和语言带入年轻社区……那些有趣的交互活动在他（和他的同龄人）与孩子之间建立起强烈的社区认同感。我认为从小接触不同文化和语言有利于促进孩子的文化意识，让他们勇于尝试不同的想法，并在未来努力建设更具包容性的社区。

联系到在课堂上学习的有关西班牙裔 / 拉美裔社区的相关知识，其他学生也有了切身体会。举例来说，学生 S.V. 惊讶地发现，“……没想到在距离一个以白人为主的校园只有 12 分钟路程的一所高中，会有这么多的双语学生和西班牙裔 / 拉美裔学生……虽然对我来说是一项挑战，但我还是很高兴能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证明了自己完全可以用西班牙语来掌控一个班级……学期刚开始时我听说了这个项目，我觉得自己未必能做到，但通过大量的学习和练习，我为自己有能力学到这么多东西感到自豪。我很喜欢社区里遇到的那些孩子们，他们聪明且懂得尊重，我很愿意与他们交流，倾听他们的问题。”S.V. 的这段反思，表明她通过“流动博物馆”项目实现了课堂讨论与实践经历感受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她意识到自己的改变，并变得更加自信。持有类似观点的学生 Z.A. 也表示，

虽然我不是拉美裔，但西班牙语正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活动开始前的互动很成功，因为孩子们都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她在社区式学习的课堂上学到的一切，都能应用在互动项目中……在我的课上，我了解到南美洲有着很多不同的文化，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多样性也有了更深的理解，这能帮助我更好地开展与社区的合作……所以我已经知道应该怎么做才能让孩子们感觉更好……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和移民们的生活。

承诺催生意识，能够更清楚地认识自身 / 他人所面对的现实，也让学生们得以更全面地认清自己在社区和整个社会中的角色和位置。再者，承诺和意识也很可能是走向自主和包容的“垫脚石”。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反馈提到了关于社区身份的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问题。比如学生 S.R. 反思说，

……我们需要让西班牙裔 / 拉美裔人群获得更多话语权——尽管我本人就是拉美裔，但上课之前我并不是很了解拉美裔社区……虽然我属于拉美裔，然而我并不知道这些社区面对的各种不公。我的成长经历与合作学校的孩子们很相似。这些孩子没



有充分学习西班牙语，将会导致负面影响——因为他们以后不能流利地使用西班牙语或英语……我很小的时候学过西班牙语，但进入学校后却一直只接受的是英语教育。多年以后，我失去了很多运用西班牙语的能力。我甚至不知道如何读写西班牙语。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不公平的——学校（依然）没有为具有两种文化背景的孩子做出改变。多亏了这个项目，我才真正意识到拉美裔社区所面临的问题。我的父母是移民，现在我才知道他们曾经遇到过的困难。如今各种歧视移民的政治环境，让我更加迫切地希望更多接触我所属的社区。

与学生小组进行互动时，教授和博物馆策展人都发现学生 S.R. 在开场白中会说“我是拉美裔，我希望恢复自己的语言能力。”而学生 C.S. 则在总结了“流动博物馆”、社区参与和课堂讨论后表示：“学期开始时，我并不了解西班牙裔 / 拉美裔社区的需求，现在我知道他们所受不公待遇的程度。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做出行动，因为我了解社区面对的问题，无所作为会让我觉得自己随波逐流。”面向热切观众公开演讲，聆听观众对藏品的看法和对活动的建议，项目将大学生置入他人（本项目中指在校的中小學生）的空间环境，同时成为这个空间的主导者。整个活动模式鼓励导览者 / 演讲者和观众跨越（语言、文化、社会）边界，向对方表达自己的观点和阐释，通过讨论构建共同的话语体系，不会压制或凸显差异，相反双方更可能将交流视为合作的过程。

大学生也很注意自己在 k-12 学校里的表现，因为同一课堂里的老师是绝对权威，大学生意识到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和威信可能会与老师有所矛盾。然而与此同时，大学生是活动信息的掌控者，他们想要探索的目标可能与课堂教学内容相悖。这一理念解放了课堂上的孩子们，也赋予了大学生实践的动力。活动体验中的自主意识为不确定性指明了方向，通过阐释和反思如何解决不确定性的问题，让孩子们获得思想上的解放。尽管项目仅仅持续一个学期，但短时间内的体验对于学生们的影响力将是持久性的，因为项目潜在的形式未来可以不断复现。在朗西埃和雅科特看来，这种可复现的秘方能将学生从教师 / 学生的权力结构中解放出来，并进入自主教育和赋权的层次。

我们的学习是整合不同行为和反思的结果，通过实践活动实现自我解放，并且意识到自身的转变和能动性。学生的反馈也印证了安娜·梅尔克关于空间环境和触觉的理论：即手势作为触摸的一种形式可以在“流动博物馆”相关活动中促使学生发生转变。在博物馆相关活动进行的过程中，大学生和观众都会发现颠覆旧有观念的新认识，并尝试就新旧观念的冲突进行沟通。这种相互倾听的努力会模糊原有的社交界线，并促进共情的产生。大学生和 k-12 学生都要离开自己的（语言、社会、文化）安全区，调动更多的意识和主观能动性，跨越“流动博物馆”的空间环境实现解放。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基于过往经验和反应，形成深刻的批判性反思。“流动博物馆”的批判性反思、研讨会呈现以及最终的论文，三者结合能让学生们通过观察自己与其他人的互动（议定含义），接触到诸如身份和他者等概念，针对他们在社区里的角色和作用进行批判性的评估，这表明了学习是人在智力、情感和身体三个方面都处于动态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一体化过程。

通过“流动博物馆”，中小学生们与大学生一起探讨博物馆的藏品。k-12 学生积极参与，渴望提问和表达自己的观点，愿意接受挑战去解释自己看到的事物。对于这些孩子的家庭来说，这个活动可以提升家族的文化资本，提高他们对双语优势的认识，对于西班牙裔 / 拉美裔家庭来说，这个活动体现了保持传统语言和文化的重要性。可以说，“流动博



物馆”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动态空间环境（涉及不同的学校和活动主题）。在这个环境中，包容性是不断探索、表达、发现和协商意义的结果，多样性成为可以预期的成果，而不是实现的目标。此外，“流动博物馆”还是衔接社区、中小学校、大学和博物馆之间的桥梁，通过公民意识与社会责任实现公共空间的贯通。

### 总结

基于双语环境的项目有助于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鼓励他们在积极创造和积累知识的同时与他人分享相关的经验。将博物馆的藏品作为社交物品和文化文本，有助于汇聚不同背景的人群进行交流，进一步增强大学生与社区成员之间的联系。此外，项目和课程内容所引发的反思，让大学生更好地了解更广泛的社区以及自己在其中的角色，从而学会如何面对差异性和包容性问题。通过总结整个学期的课程经历，学生们认识到社会政治和权力结构可能导致不同人群之间的不平等。而且尽管已经有人做了大量努力并提出相应的指导方针，政策性规定却不一定能保证大学校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有些关于多样性的陈词滥调反而会阻碍事情的发展（AHMED, 2012, 58）。相反，真正实现多元和包容需要具有变革意义的实践，而这样的实践又往往源自各种自我反思、合作教学与行动（走进社区，激发人们对藏品的好奇心，通过探讨建立联系，以及向社区开放大学博物馆，挑战不平等的制度化话语等）。变革性的实践可以激发学生思考并获得新的视角，让他们重新探索看待这个世界和他们自己的方式。这一微妙的转变正体现了项目的精髓：通过项目过程中的体验，学生们能够运用全新的视角看待和思考同一个世界中存在的不公正，以及那些受到不公待遇的人们。因此，通过学生的反馈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个多样化的社会以及自己作为双语公民所扮演的角色有了新的认识。这是解放思想和相互理解的第一步，是实现包容性的基础。当学生、社区，以及教师、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共同努力实现包容性的时候，这也将成为社会和学界的目标。

### 致谢

感谢参与合作项目的学校、教师和学生。还要感谢大学生的辛勤付出和精彩反馈。

### 参考文献

- AHMED, S. 2012. *On Being Included*.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OAL, A. 2008.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 London: Pluto Press.
- BOWEN, D.H., GREENE, J.P., & KISIDA, B. 2014. Learning to Think Critically: A Visual Art Experiment. *Educational Researcher* 43(1), 37-44.
- CLASSEN, C. 2012. *The Deepest Sense: A Cultural History of Touch*.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DIMAS, S. 2016. Improving Multicultural Learning Through Interpretations and Interactions with Museum Educational Practice. *Journal of Visual Literacy*, 35(1), 3-23.
- DUDLEY, S. 2010. Museum Materialities: Objects, Sense, and Feeling. In DUDLEY, S. (ed.) *Museum Materialities: Objects, Engagement, Interpret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 HOOPER-GREENHILL, E. 2000. *Museum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JENSEN N. 1999. Children, Teenagers and Adults in Museums: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In: HOOPER- GREENHILL E., (ed.).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the museum*. New York: Routledge.
- KINGSLEY, J.P. 2006. The Practicum Course Model: Embracing the Museum-University Culture Clash. *Journal of Museum Education*, 41(4), 250-261.
- KRAMSCH, C., & GERHARDS, S. 2012. Im Gespräch: An Interview with Claire Kramsch on the ‘multilingual subject’. *Die Unterrichtspraxis/Teaching German*, 45(1), 74-82.
- KREPS, C. 2015. University Museums as Laboratories for Experiential Learning and Engaged Practice. *Museum Anthropology*, 38(2), 96-111.



MAERKER, A. 2015. Towards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Touch and Spaces of Display: The Body as Epistemic Object.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40(1), 284-300.

MARSTINE, J. 2007. What a Mess! Claiming a Space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 Experimentation in the University Museum.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2(3), 303-315.

PITTS-TAYLOR, V. 2016. *The Brain's Body: Neuroscience and Corporeal Politic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SCHWARTZ, J.P. 2008. Object Lessons: Teaching Multiliteracies through the Museum. *College English*, 71(1), 27-47.

SEDERBERG, K. 2013. Bringing the Museum into the Classroom, and the Class into the Museum: An Approach for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Die Unterrichtspraxis / Teaching German*, 46(2), 251-262.

SERRES, M. 2011. *Variations on the Body*. Minneapolis: Univocal Publishing.

SIMON, N. 2010. *The Participatory Museum*. Santa Cruz, California: Museum 2.0

US Census Data. <https://datausa.io/profile/geo/richmond-va-metro-area/>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9).

VÁZQUEZ, K. & WRIGHT, M. 2018. Making Visible the Invisible: Social Justice and Inclusion through the Collaboration of Museums and Spanish Community-Based Learning Projects. *Dimensions, Southern Conference on Language Teaching*, 113-129.

#### 联系方式

Karina Elizabeth Vázquez, Director of Spanish Community-Based Learning Program  
Department of Latin American, Latino & Iber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Richmond, 211 Richmond Way, Virginia, 23173, United States

E-mail: [kvazquez@richmond.edu](mailto:kvazquez@richmond.edu)

<https://lalis.richmond.edu>

Martha Wright, Assistant Curator of Academic and Public Engagement  
University Museums  
University of Richmond, 110 UR Drive, Richmond, VA 23173, United States

E-mail: [mwright3@richmond.edu](mailto:mwright3@richmond.edu)

<https://museums.richmond.edu>

#### 关键词

Community engagement, Inclusive pedagogy, Museum object-based learning, Spanish learning.





# 批判博物馆学与大学博物馆： 墨西哥超越艺术 / 科学二分法

Blanca María Cárdenas Carrión / 文  
骏仁 / 译

## 摘要

在 21 世纪的全球背景下，人们愈发感到博物馆行业迫切需要变革。批判博物馆学（Critical Museology）是一种旨在推动博物馆变革的理论方法，为解决各种相关问题带来了希望，包括某些与认识论二分法（epistemological dichotomy）有关的问题。本文特别探讨了博物馆在组织藏品和展示策略方面超越艺术 / 科学二分法（art/ science dichotomy）的可行性。我们将重点关注大学博物馆，毕竟大学往往会对社会变革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在文章的最后，我们还将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UNAM）为例，说明博物馆可以在哪些方面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 引言

博物馆能促进社会融合，知识、思想和情感自由流动。创造力在这里永不停息地涌现，曾经被认定为真实的、不可动摇的一切，都在人们的审视和讨论中变得鲜活起来。将世界划分为东方或西方、北部或南部、野蛮或文明，以及我们有关美或真、过程或结果的思维方式，在最近的数十年来广受质疑，而博物馆作为知识来源的作用也已大不如前。然而，博物馆的一切都能接受质疑，这里是打破旧边界、创造新世界的地方。

举例来说，很少有人会想到当代艺术与科学知识、设计与技术能在博物馆里如此和谐地共存，也没有人能想到来自实验室、试管、生物反应器和基因改造程序的生物学能做成“生物艺术”（Bio Art）；所有这些都引发了有关伦理、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激烈讨论。<sup>1</sup>当代艺术博物馆已经开始收录那些模糊了艺术/科学二分边界的作品，并允许观众自由地探索、思考和感受。

本文将探讨艺术/科学二分边界引发的所有迭代变化，包括对西方的思潮、博物馆和展览的长期影响。我们将着重关注大学博物馆及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我们从批判博物馆学的一些主要陈述开始，涉及弥合艺术与科学、美与真、知识与表征之间鸿沟的重要性，以及策划凸显社会现实、政治冲突和文化斗争的新展览的必要性。

相对于其他博物馆，兼具学术和教育功能的大学博物馆无疑要更接近年轻一代和最新的社会需求。在本文的后半部分，我们将列举墨西哥大学博物馆开展的一些项目。尽管我们认为这些项目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但这条道路距离终点还有很长的距离。无论如何，我们始终坚信的是批判博物馆学可以帮助大学博物馆找到新的运作模式，让它们吸引更多观众，更大胆地去创新，并为这个世界作出更多的贡献。

## 危机时期的博物馆学

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面临的经济危机和脆弱的信仰体系，让人们迫切感到博物馆行业亟需变革。我们所处时代特征的种种变化，诸如数字通信技术的发展、历史进程的加速（AUGÉ, 2007, 33）、官方话语的另一种表达、捍卫新的社会身份、重新诠释种族问题等，都对博物馆行业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我们可以将博物馆视为服务社会、致力于收藏、保护、研究、交流和展示人类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永久性机构。<sup>2</sup>时间已经改变了博物馆，博物馆与人类历史共同发展，固守教条已经毫无意义。

因此，作为专注于理解和定义博物馆这一文化机构的学科领域，博物馆学开启了分析和反思的过程。危机会引发批评，但也能促成重构；危机打开了求新、寻道乃至重新决策的大门（KURNITZKY, 2013, 1）。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博物馆界正在质疑其维持社会关系的根基是否依然存在，而博物馆学已经催生了新的观点，即博物馆应该将观众视为盟友，并将之作为任何项目的起点，同时也是所有展览的目标。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博物馆学开始设计博物馆、观众和藏品三者之间的互动原则。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危机，促使博物馆学认识到历史和教育、文化多样性、民族主义以及科学公众形象的重要性。如今的博物馆学更具批判性，认为“……在博物馆里生成和展示的知识内容，会受到文化、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制约，因此体现出某个特定时刻的社会

1 参见：爱德华多·卡克（Eduardo Kac）等；2017。《什么是生物艺术：宣言》（What Bio Art Is: A Manifesto），[http://www.ekac.org/manifesto\\_whatbioartis.html](http://www.ekac.org/manifesto_whatbioartis.html)，以及《艺术遇见科学》（Art Meets Science），<https://artscy.sites.ucsc.edu/>

2 参见：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2019 年。《博物馆定义》（Museum definition），<https://icom.museum/en/activities/standards-guidelines/museum-definition/>



面貌。因此，为了认识和管理这些机构，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其文化、政治和经济背景。”（NAVARRO, 2012, 28）。

批判博物馆学没有所谓的“指南手册”（*vademécum*）或“奠基性的文本”（*founding text*），主要原因在于本质上属于动态的视角（*dynamic perspective*）。人类学家安东尼·谢尔顿（Anthony Shelton, 2013）在其近年发表的一篇宣言中，重申了他所认为的批判博物馆学原则，而他的著作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批判博物馆学以及创新展览设计的理论依据。<sup>3</sup> 根据谢尔顿的“宣言”（*manifesto*），批判博物馆学的研究目标是质疑博物馆、植物园、纪念馆、美术馆和文化中心等机构所表现出的虚构、叙事、话语、专门机构、体制和组织架构（SHELTON, 2013, 8），并由此得出如下认识论立场（*epistemological positions*）：

- “历史依赖人类的感知和认知，通过社会建构”（SHELTON, 2013, 9）。
- 收藏行为属于文化实践，且受到个人愿望和不同的历史关注点的影响。
- “博物馆的展示环境中，展品不仅是‘能指’（*signifier*），也是‘所指’（*signified*）。展示既是存在的条件，也确保了意义”（SHELTON, 2013, 12）。

- 物品与意义之间没有单一的对应关系。展览应当突出民族和地理上的差异。

批判博物馆学既不是明确的方法，也没有任何适用原则，而是通过看似无形的“镜头”，观察和思考博物馆的社会责任、知识民主化、跨学科、跨文化对话、社区参与，以及二分法带来的挑战和世界霸权的观点（*hegemonic version*）；<sup>4</sup> 将博物馆视为变革和反思展品的作用媒介（PÉREZRUIZ, 1998, 97）。综上所述，批判博物馆学源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思潮，对当代博物馆的运营起到自我批判的作用，并为推动博物馆的包容性、公正性和多元文化，开辟出一条面向观众、促进对话交流的道路（CÁRDENAS, 2016, 73）。

### 艺术 / 科学

批判博物馆学研究的问题，关涉 19 世纪西方世界观中盛行的认识论二分法。每个时代和每个社会都有其特定的世界观和对现实的认识；不过，修正主义者善于利用批判博物馆学，对 19 世纪的思维结构（*structures of thought*）以及在当代世界的适应性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

在这种情况下，艺术与科学的二分法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显得尤为重要，尽管它存在着谬误。溯其源头，古希腊人就已将认知（知识）与技艺（艺术或技术）区分为两种智力上的美德，真理的发现源于偶然，<sup>5</sup> 直至 19 世纪，在工业革命、启蒙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下，艺术才从我们今天公认的科学中分离出来，科学被认为是理性思维和真实的知识，而艺术则是美丽和主观的表达。

19 世纪以前，科学与艺术同属一个体系。与之相关的历史证据很多：近代帝国主义最为辉煌时期的航海探险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 1728—1779）喜欢招募经验丰富的艺术家作为船员。1768 年英国皇家海军考察船“奋进号”（HMS Endeavour）和 1772 年英国皇家海军“决心号”（HMS Resolution）承担着全球探险的科研和军事目标，但这并不妨碍悉尼·帕金森（Sydney Parkinson, 1745—1771）或威廉·霍奇斯（William Hodges, 1744—1797）这样的艺术家留下值得传世的油画和水彩作品，这些画作至今仍保存在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in the United Kingdom）。另一方面，爱德

3 20 世纪 90 年代布莱顿博物馆（Brighton Museum）的“文化项目”（Cultures Project）展厅改造，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人类学博物馆（Museum of Anthropology, MOA）的展览。

4 在这一层面上，推动了博物馆研究与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中的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视觉主义（*perspectivism*）之间的联系。

5 参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2014 年。“知识与技术”，<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episteme-techné/>



华·拉奇 (Edward Rudge, 1763—1846) 或托马斯·罗斯科·雷德·斯特宾 (Thomas Roscoe Rede Stebbing, 1835—1926) 等博物学家也喜欢艺术, 甚至还同杰出的艺术家结婚。许多女性则发现通过艺术的表达, 有助于推动科学发展。安妮·努瓦耶 (Anne Nouaille, 1763—1836) 就曾在罗奇 (Rodge) 所著的《圭亚那珍稀植物图鉴》(*Plantarum Guianae rariorum icones et descripciones hactenus ineditae*, 1805—1806) 上刊登了其创作的 50 多幅极其精准和逼真的插图。玛丽·安妮·斯特宾-桑德斯 (Mary Anne Stebbing-Saunders, 1845—1927) 的水彩画被英国皇家植物园 (一译“邱园”,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收藏至今 (SHEFFIELD, 2006, 243-245)。

此外, 作为海洋物种多样性的研究学者, 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 (Ernst Haeckel, 1834—1919) 捍卫着进化论 (evolutionism)。他的科学生涯深受歌德浪漫主义文学 (Goethe's romantic literature) 的影响, 经常通过绘画的方式来研究生物的有机组织。海克尔最著名的作品是 1899 年出版的《自然界的艺术形态》(*Art forms in Nature*, 2004), 其中的插图凸显了我们周围一切事物的优美、对称和精致。可以看出, 尽管当时的科学家都很关注公式和数学的抽象概念, 但海克尔依然能运用艺术作品来研究自然界, 创造出一种“自然美学” (natural aesthetic) (BREIDBACH, 2004, 13)。

然而, 19 世纪建立起的思维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艺术/科学二分法等观点也很快成为主流, 完全掩盖了海克尔等学者作出的所有贡献。艺术与科学之间的距离愈加扩大, 这种二分法也迅速渗透到西方世界的各个领域。具体而言, 艺术和科学之间的界限在博物馆作为公共机构的发展过程及其展览策略方面, 得到了清晰呈现。希腊语里的美术馆 (pinakothéke) 和文艺复兴的美术馆 (Renaissance gallery) 布满战利品和艺术品, 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 (mouseion) 和珍奇柜 (cabinets of curiosities, gabinetto) 则与之不同, 被认为是思考、研究、教学和哲学演讲的场所 (ALEXANDER, 1996, 8; FERNÁNDEZ, 2001, 44)。19 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世俗的神庙” (secular temples), 随着收藏解剖动物、手工制品、文物和珍稀植物的科学博物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建立, 艺术与科学之间的鸿沟进一步扩大, 而教会的珍宝、雕塑和油画作品只在艺术博物馆里展出 (RICO 2004)。

博物馆的分类, 也助长了艺术/科学二分法的流行。时至今日, 许多博物馆还是会以某一特定的学科或领域来命名, 例如, 英国剑桥大学的塞奇威克地球科学博物馆 (Sedgwick Museum of Earth Sciences)、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的当代艺术博物馆 (Contemporary Art Museum)、德国奥托·弗里德里希·班贝格大学 (Otto-Friedrich-Universität Bamberg) 的班贝格自然历史博物馆 (Naturkunde-Museum Bamberg), 或是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的艺术博物馆 (Art Museum) 等等。然而, 针对藏品的分类研究却对这种二分法的持续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并且开始强调博物馆跨学科、跨专业和跨领域的属性, 正如乔治·亨利·里维埃 (Georges Henri Rivière) 不久前所提出的, 博物馆作为收藏的核心机构, 这是由来已久的现实, 但其发展日新月异, 可以涵盖所有的学科和知识 (RIVIÈRE, 1993, 67)。

有关博物馆的定义及其日常运作中, 也体现了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区分, 然而, 维持这种划分有什么好处呢? 这些边界是永远无法逾越的吗? 我们能否将博物馆视为跨越任何学科差异或认识论二分法的奇迹之地? 凯瑟琳·麦克林 (Kathleen McLean, 2010) 在《博物馆展览的演变 (变革) 宣言》(*Manifesto for the (r) Evolution of Museum Exhibitions*) 中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博物馆, 我们可以在其中“为想象留下空间”“拥抱不完整”“杂糅事物”, 乃至跨越界限和放松身心。所以说, 批判博物馆学旨在深入探讨知识之间的空隙, 探索艺术与科学的融合, 以及回归到艺术表达与科学方法之间的连贯性——前者作为知识的形态, 后者则是自然界表象的支持者。<sup>6</sup> 如今博物馆被视为社会冲突和实验的对话场所, 激发了人们超越任何边界或限制的好奇心 (EIBL-EIBESFELDT, 2004, 19)。

### 大学博物馆

接下来我将集中讨论大学博物馆, 或是与高等教育机构有关的博物馆, 因为这些博物

6 都柏林三一大学 (Trinity College) 的“科学馆” (Science Gallery) 就是个优秀案例, 是尝试融合艺术与科学的实验性项目。正如本文所述, 这个项目试图跨越边界区域, 以吸引新的观众群体, 并且质疑诸如美术馆或科学博物馆已建立起的分类方式 (GORMAN 2009)。





馆与更接近年轻一代,与基础性研究、研究前沿以及各种社会变革密切相关。这些机构承担着征集、研究、保护和展示遗产的职责,同时还发挥着大学的教学、研究和文化传播等功能,并且在学术领域之内和之外都具有重要价值(RICO, 2012, 170)。

与世界上大多数的博物馆一样,大学博物馆也按照主题和学科分类,主要分为科学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我们并没有遗漏展示大学校史的博物馆(诸如名誉校长展示厅),或是学生社团作品展的存在,但总体来看,这些博物馆的空间和藏品组织往往都遵循 19 世纪的艺术/科学二分法。然而根据批判博物馆学的原则,我们必须自我反思,这样的划分是否有助于开创面向未来的博物馆,促进批判性思维,培养观众的好奇心和创造能力。

大学博物馆是一片沃土,具有激发好奇心和创造力,培养灵活思维的巨大潜力。与绝大多数正规教育以及在课堂教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同思维”(convergent thinking)形成对比的是,“发散思维”(divergent thinking)拥有无限的拓展可能。“参观博物馆并不是让观众自认为要开展某个领域的专业研究,而是要向学生传授一种个人或集体的能力,使之能在新的环境中表达和陈述知识。在博物馆里必须发现并提出问题,而不只是听写书本里的内容”(MATA, 2012, 225)。

“博物馆是可以发生社会变革的知识机构,其有责任培养起社会对于现状的认知”(NAVARRO, 2012, 32)。除了大学博物馆,还有谁能通过推出充满活力的展览或研讨会来实现创新呢?展览方面还需要其他策略,在同一主题下包容不同的观点和论述,以超越艺术/科学二分法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博物馆不能限制自己的叙述,也不能在 19 世纪形成的边界驻足不前,毕竟博物馆已成为新的社会需求的一部分,从年轻的学生到高级研究人员都应鼓起勇气。我们所处的时代,新生代已经不再对学习经典思想和科学成就,以及欣赏“有生之年应当目睹”的绘画佳作感兴趣了(THOMAS, 2016, 15)。换句话说,当今社会的首要任务应该是跨越界限,寻找到不同领域的交叉点。

### 墨西哥的大学博物馆:超越艺术/科学二分法的案例

艺术与科学的割裂只是表面上的。引述理论化学家罗尔德·霍夫曼(Roald Hoffmann)所言,“科学与艺术之间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联系,有待探索。这两种人类活动都是感知天地万物的方式。艺术和科学都渴望了解未知事物。”如今,恩斯特·海克尔的作品被成功融入到营销项目中,采用自然主义风格的文献作为装饰元素,已成为西方艺术灵感的范例;同样,文艺复兴时期的黄金分割和几何结构,以及古典舞蹈的表现形式,也引发了新的研究和反思。

在墨西哥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西班牙语首字母缩写为 UNAM)的一些博物馆基于上述原则策划了非常精彩的展览和研讨会。为了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大学的乔波博物馆(University Museum of Chopo)<sup>7</sup>通过跨领域和多学科的方案,探索博物馆新的趋势案例;而大学的当代艺术博物馆(University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西班牙语首字母缩写为 MUAC)<sup>8</sup>则策划了涉及种族、政治和环境问题的展览。2012 至 2013 年间,大学的当代艺术博物馆与大学的罗马科学与艺术博物馆(University Museum of Sciences and Art-Roma, 西班牙语首字母缩写为 Muca-Roma)<sup>9</sup>共同举办了名为“无种之源”(origin, without seed)的展览——这是墨西哥以生物科技艺术为主题的首展。本次展览是两座博

7 参见: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乔波博物馆(Museo Universitario del Chopo), <http://www.chopo.unam.mx/> 和 <http://www.sumyem.unam.mx/museo-universitario-del-chopo.html>

8 参见: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当代艺术博物馆(Museo Universitario Arte Contemporáneo), <https://muac.unam.mx/> 和 <http://www.sumyem.unam.mx/muac.html>

9 参考: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罗马科学与艺术博物馆(Museo Universitario de Ciencias y Arte-Roma), <http://www.mucaroma.unam.mx> 和 <http://www.sumyem.unam.mx/muca-roma.html>





物馆与“A+C”(西语 Arte+Ciencia, 即艺术+科学)<sup>10</sup>合作的成果,这一组织于2011年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成立,旨在开辟适合艺术、科学和人文学科交叉研究的领域。

大学博物馆里的另一个案例来自宇宙科学博物馆(Universum)下属的科学博物馆(Museum of Science)<sup>11</sup>,展览中经常采用跨越了艺术与科学边界的具有争议性的主题。2018年5月,这座大学博物馆与迭戈·里维拉和弗里达·卡罗工作室故居纪念馆(Museum Casa Estudio Diego Rivera and Frida Kahlo)合作举办了名为“用艺术描画大学博物馆”(Universum is painted with art, two museums at the price of one)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关于建筑和创造性思维的讲座,以及与卡罗和里维拉作品、天然颜料萃取有关的休闲工作坊。同样,科学博物馆和光之博物馆(Museum of Light)<sup>12</sup>也于2017年参与了由科学传播总理事会(General Directorate of Dissemination of Science,西班牙语首字母缩写为DGDC)在国立自治大学组织的“艺术蕴于基因”(Art in your Genes)会议。会议包括各种讲座、工作坊和游戏活动,旨在深入探讨艺术与科学、美和自然的融合,以及有关解决二分法问题的讨论。

最后,我们为中小学和大学预科生观众提供了博物馆的“艺术与科学”(Art and Science)课程。在过去的一年里,“工作坊设计”(Design of workshop)活动也吸引了很多关注。这门课程是由国立自治大学的大学博物馆及博物馆空间研讨会(University Seminar of Museums and Museographic Spaces,西班牙语首字母缩写为SUMyEM)<sup>13</sup>、宇宙科学博物馆、科学博物馆,以及墨西哥州立自治大学(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Mexico)的利奥波德·弗洛雷斯大学博物馆(University Museum “Leopoldo Flores”)<sup>14</sup>共同组织管理的跨机构项目。工作坊邀请了博物馆专业人士和大学博物馆领域感兴趣的学者参与;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74名参与者聚集在一起,研讨创造性思维和好奇心如何成为吸引年轻观众的关键要素。会议期间,与会者参观了一个当代艺术展,并运用他们的想象力,从解剖学、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物理学、遗传学等视角创作出全新的阐释和论述(图1)。重要的是,在与会者之间,针对任何的学科碎片化和任何的预设主题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就其重要性达成共识。

### 下一步如何?

大学博物馆对周边社区和整个社会都负有重大责任,能将自身转变为开展对话和进行批判性思辨的场所。大学博物馆与研究的前沿相衔接,与青年一代学生的自觉性相适应,使之成为质疑那些妨害我们思考的阻力的理想场所,并且邀请观众畅游于思想、审美、情感、理性和文化之中。

所有的边界,都因定义而分割和受限。必须消除艺术与科学之间的界限,直至类似的概念弱化其意义,使之变得不那么必要。当今世界更需要团结力和灵活性,需要开放性的思维来建立对话,才能开创适应创新事物的环境。接下来将如何?让我们开始反思博物馆的命名、使命、愿景和目标。让我们开始扪心自问我们观众的参观动机,并从艺术、科学或其他任何方式上以一个独特的目的创建起富有意义的体验:这就是激发我们观众的惊异与好奇!

### 致谢

感谢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大学博物馆及博物馆空间研讨会给予我从事这项工作的机会,让我得以了解国内如此众多的大学博物馆。

10 参见:艺术+科学(Arte+Ciencia), <https://www.artemasciencia.org/>

11 参见:宇宙科学博物馆(Universum, Museo de las Ciencias), <http://www.universum.unam.mx/> 和 <http://www.sumyem.unam.mx/universum.html>

12 参见:光之博物馆(Museo de la Luz), <http://www.museodelaluz.unam.mx/> 和 <http://www.sumyem.unam.mx/museo-de-la-luz.html>

13 参见:大学博物馆及博物馆空间研讨会(Seminario Universitario de Museos y Espacios Museográficos), [www.sumyem.unam.mx](http://www.sumyem.unam.mx) 和 <http://www.sumyem.unam.mx/curso-taller.html>

14 参见:墨西哥州立自治大学利奥波德·弗洛雷斯博物馆(Museo Universitario “Leopoldo Flores”), <http://web.uaemex.mx/muslff/presentacion.html>



图 1 (a, b, c)  
观众们在参观体验当代  
艺术展的过程中，  
从科学的角度对作品  
进行重新释读。

来源：大学博物馆及博物馆空间研  
讨会 (SUMyEM-UNAM)，2018

**参考文献**

- ALEXANDER, E. 1996. Museums in mo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Functions of Museums. USA: AltaMira Press.
- AUGÉ, M. 2007. Por una antropología de la movilidad. Spain: Gedisa.
- BREIDBACH, O. 2004. Brief instructions to viewing Haeckel's Pictures. In: Art forms in nature, E. HAECKEL, Munich: Prestel, 9-18.
- CÁRDENAS, B. 2016. Museos Etnográficos. Contribuciones para una definición contemporánea. Mexico: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 EIBL-EIBESFELDT, I. 2004. Ernst Haeckel- The artista in the scientist. In: Art forms in nature, E. HAECKEL, Munich: Prestel, 19-30.
- FERNÁNDEZ, L. A. 2001. Museología y museografía. Spain: Ediciones del Serbal.
- GORMAN, M. J. 2009. Experiments in the boundary zone: Science Gallery at Trinity Collegy Dublin. UMAC Journal (2): 7-14.
- HAECKEL, E. 2004. Art forms in nature. Munich: Prestel.
- KURNITZKY, H. 2013. Museos en la sociedad del olvido. Mexico: Consejo Nacional para la Cultura y las Artes.
- MATA, L. 2012. Museos unviersitarios y su contribución al crecimiento intelectual y académico de los estudiantes. In: Museos Universitarios de México. Memorias y reflexiones, eds. L. RICO et al., Mexico: UNAM-UAEMéx, 214-229.
- MCLEAN, K. 2010. Manifesto for the (r)Evolution of Museum Exhibitions. Exhibitionist 10: 40-50.
- NAVARRO, O. 2012. History and education as bases for museum legitimacy in latin American museums: some comments for a discussion from critical museology point of view. Museologica Brunensia, autumn: 28-33.
- PÉREZ RUIZ, M. L. 1998. Construcción e investigación del patrimonio cultural. Retos en los museos contemporáneos. Alteridades 8 (16): 95-113.
- RICO, L. F. 2004. Exhibir para educar: objetos, colecciones y museos de la Ciudad de México (1790-1910). Mexico: Editorial Pomares-Corredor.
- RICO, L. F. 2012. Ten rules for operating our university museums adequately. In: Museos Universitarios de México. Memorias y reflexiones, eds. L. RICO et al., Mexico: UNAM-UAEMéx, 167-186.
- RIVIÈRE, G. H. 1993. La Museología. Curso de Museología. Textos y testimonios. Spain: Ediciones Akal.
- SHEFFIELD, S. L. 2006. Gendered collaborations. Marrying art and science. In: Figuring it out. Science, gender, and visual culture, eds. A.B. SHTEIR & B. Lightman, USA: Dartmouth Collage Press, 240-264.
- SHELTON, A. 2013. Critical Museology. A Manifesto. Museum Worlds: Advances in Research 1: 7-23.
- THOMAS, N. 2016. The return of curiosity. What museums are good for in the 21st Century. Great Britain: Reaktion Books.

**联系方式**

Blanca María Cárdenas Carrión,  
PhD student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UNAM)  
Unidad de Posgrado, Edificio E, primer nivel, Circuito de Posgrados  
Ciudad Universitaria, Mexico City, 04510, Mexico.

E-mail: etno23@hotmail.com

**关键词**

University museums, Critical Museology, epistemological dichotomies



#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及其大学博物馆的自然历史双向知识

Luisa Fernanda Rico Mansard / 文  
骏仁 / 译

## 摘要

本文主要关注了墨西哥自然历史发展的关键脉络，以及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UNAM）在恢复和重新评价相关知识、文化去殖民化（cultural decolonization）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通过在空间上临时的、文化的、世代传承的，以及社会性的桥梁纽带加以连接，生成围绕这一主题的“双向知识”（two-way knowledge），突出两座大学博物馆在利用墨西哥动植物资源时的不同方式，并讨论其具体的学术规划和目标。鉴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有责任研究和保存本国丰富的生物资源，可以从批判博物馆学（critical museology）的视角重新审视大学的自然历史类藏品和博物馆，并将其视为理论上的跨学科平台（theoretical interdisciplinary platform）。





## 引言

在新技术盛行、社会文化日新月异的当下，如果大学博物馆<sup>1</sup>想要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在藏品信息的交流方面做出改变。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无论是古代珍品、实验室里的科研标本、美术馆、教学类藏品、纪念校长或副校长的展厅、植物标本室，抑或陈列着古籍、抄本和初刻本的展厅，都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了。这些藏品对于大学博物馆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其自身就是文化的交流，并且构建起制度化的记忆。然而，有很多大学博物馆已沦为展览的库房，除极少数专业人士以外，并不为社会大众熟知。

要避免这样的隔阂，就必须改变展示视角，努力让馆藏和大学博物馆的运作更加引人注目。弱化高雅与世俗之间的差异，在博物馆的叙事和藏品中增加教育以外的其他价值。关注所在区域的发展进程和故事，包括梳理和配置其他形式的知识、讲解内容和参与者，这将有助于转型以提供具有时效性的含义，以吸引更多的观众，讲解新的知识，鼓励身份认同，创建自己的社区<sup>2</sup>，并且解决社会问题。大学的博物馆有赖于跨学科的支持，以及大学在处理博物馆事务方面的经验，其显著的优势使之能够适当改变目标，以吸引更多的观众。

特别是像墨西哥这样复杂的国家，在一些人看来正如《许多墨西哥人》（*Many Mexicos*）<sup>3</sup>里所述的那样，这里经历了入侵征服和长达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不同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故事、传统和梦想都汇聚在同一片土地上。这是空间上临时的、文化的、世代传承的，以及社会性的等等许多桥梁纽带连接的结果，不断培养“双向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塑造了今天的国家。

近几十年来，人们一直致力于研究多元文化。直至 1994 年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Movimien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EZLN）爆发，针对墨西哥的现状出现了新的分析视角。从那时起，为了解决文化和社会的多样性、跨文化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平等的问题，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立场，弥补了原来线性和单一主题阐释的不足（VALENCIA 2013, 41; 43）。

近来，对“他者”（the other）的重新审视和对“自我”（own）意识的恢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一个以古老知识、实践经验和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去殖民化过程。人们为原住民的权利提出诉求，这彻底颠覆了传统观念。除了传承物质遗产之外，人们还开始强调文化及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且发展了社会群体与无形价值之间的联系。

这一过程并不只是出现在墨西哥，还同时发生在亚洲、非洲、大洋洲和美洲的国家，这些国家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一直被西方所统治，现在正寻求重新证实其历史、知识和遗产。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上述问题也成为那些一度沦为殖民地国家的热门话题。<sup>4</sup>

必须承认的是，如今新的殖民主义势力（neo-colonial powers）仍想对其他民族的历史施加主导性和决定性的影响。<sup>5</sup>经历了欧美人“发现”（Discovery）、“冲突”（Clash）和“交锋”（Encounter）过程的 500 年后，墨西哥人正在寻求恢复和加强特定的文化表达，

1 这一类别也涵盖所有属于高等教育的机构。

2 在墨西哥，人们普遍使用“社区”（“community”或“communities”）来指代本地族群。本文中，我们特指具有共同要素的人群，例如学习共同体、大学共同体等。

3 《许多墨西哥人》（*Many Mexicos*）是莱斯利·伯德·辛普森（Lesley Byrd Simpson）于 1941 年出版的名著。

4 特别值得一提的案例是 2018 年 9 月 6 日至 7 日在德国柏林举行的“自然史的政治性，如何实现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去殖民化？”（Politics of Natural History, How to decolonize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研讨会，呈现了来自欧洲、亚洲和非洲的观点。其他讨论话题，源于“墨西哥的红色：艺术中的胭脂虫红”（Rojo mexicano, la grana cochinilla en el arte）特展（墨西哥国家美术馆，2017 年 11 月—2018 年 2 月），几个世纪以来墨西哥胭脂虫（Mexican cochineal）对欧洲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当地的认知从未被提及过。

5 “以前他们把我们视为财产，如今仍然如此，通过强制推行不平等和排他性的经济模式，目的就是寻求保护他们继续行使权力……”（QUESADA 2017, 11）





包括语言、知识应用、价值观、学习方式、知识体系和传播形式等方面。<sup>6</sup>

墨西哥的自然历史是非常清晰明了的。殖民统治时期，出于娱乐、驯养、烹饪、治疗等种种目的，自然历史资料和活体标本从这里被带往欧洲，置于帝国的中心向其他的世界各国炫耀。几个世纪以后，当这些展柜里的解剖标本归还给墨西哥时，已被按照西方的科学标准进行了分类，后来有成为大范围出售的专利药品。

从 16 世纪到 18 世纪，墨西哥本土使用草药的习俗逐渐消失。直至欧洲殖民统治结束之后，才在西班牙博物学家的倡导下（BECERRA 1963, 318），于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 1790）内重新设立了植物学教授职位，创建起植物园。尽管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但引发了人们对于这些主题的研究兴趣，并在数十年后完成这一重要事业。<sup>7</sup>

我们提到的《国立预科学校》期刊里的自然历史陈列柜，就是约一个世纪后受到影响的一个案例，其中自豪地宣称：

“来自西班牙的 100 件已被分类的植物标本，来自墨西哥的 60 件植物标本，来自欧洲的 100 件已被分类的贝壳化石，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 125 件贝壳化石，也已被分类，15 卷的自然史图书，1 个教室内的水族箱，2 个人类头骨，其中一个是大脑畸形，另一个是黑人，25 件动植物学陈列柜的标本，9 件已被分类的胡椒种子标本，5 件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骨骼”（GUEVARA 2002, 68）。<sup>8</sup>

在此我们可以确定第一个接触到的桥梁纽带，即空间和文化上的双向知识。从发源地提取的拓展知识，又被西方教育的实践观念所接受。

重现自然历史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所做出的贡献，不仅恢复了各类资料信息，而且通过收藏让自然产物得以重新诠释和利用。这项工作是通过与一位杰出科学家的合作完成的，然而更重要的是融入了土著族群（Indigenous groups）的实践经验，毕竟他们一直了解如何保存自己的知识。上述的贡献和观点，在一些大学博物馆项目中得以体现。

### 大学博物馆

墨西哥的大学和博物馆都是按照“欧洲模式”（European models）创建的（RICO 2014, 2017），<sup>9</sup> 学术性收藏也是如此。大学博物馆会根据科学和艺术教学的需要，逐步建立收藏体系。许多藏品在展出时，已失去了原本的用途。墨西哥第一批美术馆和博物馆的陈列室于 20 世纪初出现，这些文物成为大学遗产的一部分。<sup>10</sup> 大学的首要职责是教学、研究和传播文化。到了 21 世纪，向外拓展、交流、合作、联系、管理也成为大学的职责。大学博物馆和校内其他附属机构一样，不能违背主体的使命。

另一方面，尽管藏品和大学博物馆的历史源远流长，却也难以避免博物馆行业常见的运作和变化。必须适应这些变化，在当前的文化生态（cultural ecology）中占据一席之地。为了同时满足上述两方面的目标，我们强调将以下四个方面的实践作为大学博物馆的战略目标：

6 其中包括仪式、传统、音乐、美食。

7 自然史在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藏品直到 1907 年才被移出，并于 1913 年被安置在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中展出。经过几次尝试，生物学研究和植物园直至 20 世纪才得以实现。参见 RICO 2007; 2010。

8 摘自《墨西哥科学杂志》（Revista Científica Mexicana），《国立预科学校》（Escuela Nacional Preparatoria），第 1 卷第 1 期，1879 年 12 月 1 日，第 15 页。

9 古代时期的墨西哥并没有关于欧洲收藏品的记载。第一批征服者对于蒙特祖马花园里具有生命的植物和动物感到惊讶不已。

10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继承了殖民时代的高等教育体系，后来又拆解为多所国立院校。1910 年各学院合并，1929 年大学的自治权获得承认。自此以后，官方名称为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



1. 自身所在大学社区和整个社会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2. 在大学校内的文化课程（大学音乐、电影和戏剧）和校外文化课程（演讲、展览会和文化派对）中维持知名度。
3. 永远保持博物馆（从理论到实践）工作的时效性。
4. 通过博物馆的项目，让不同的社会群体参与利用藏品。

与国家级的或区域性的博物馆一样，高等教育机构附属的博物馆也必须经历大范围的服务整合过程。大学博物馆最初的关注重点在于自然历史、化学、医学、艺术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和教学活动。但是如今，博物馆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观众。各种类型的受众：大学生、校友、年轻人、老年人、现场观众、线上观众、潜在观众、远程观众，以及当地社区等，观众构成的范围不断扩大，并带来新的需求。鉴于这些日益增长的需求，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以下具体措施建议：

- 从跨学科的视角重新审视大学的藏品，由此纳入新的或之前尚未考虑到的数据，更加完整多样地提取信息，以推进新的阐释，反思过去的教学应用，并根据科学技术的新变革强化应用。
- 升级和创建新的数据库，在其他知识领域和其他社区共享新的信息，同时在其他传播媒介中利用这些数据。
- 在数据库存储系统中提供数字化的馆藏，让所有人都可以访问图像和信息。
- 开放库房和展厅，结合藏品和博物馆活动，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社区或其他类型的博物馆共享，强化以往所做的工作，同时创造新的用途、诠释与论述。
- 披露：在校园内外拓展大学博物馆的业务。
- 邀请新的参与者，主动聘任新一代的学生、学术人员以及与特定主题有关的社区，参与到大学遗产的相关工作，吸收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丰富藏品的价值、利用和档案信息。

综合运用上述措施，许多具有包容性的观点让我们创造出空间上临时性的、文化的、世代传承的双向知识的联系桥梁；通过馆藏和大学博物馆不断地向外延展，利用以前未曾考虑到的标本、知识以及个人和群体的经验，提供新的知识和解释。

###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与自然历史

在墨西哥，针对自然界的专题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当欧洲人到达特诺奇蒂兰城（Tenochtitlan）的时候，他们惊叹于蒙特祖马花园（Moctezuma's Gardens）的构造形式。花园除了为宫殿的主人和游人提供休闲娱乐以外，还出于医学和仪式的目的，对植物和动物进行研究、养护和保存，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物品进贡网，获得用以提升威望和在仪式使用的贵重物品（ELIZALDE 2018, 80）。在这里，人们通常在开放的空间里养护活的物种；而在欧洲，紧锁在科学展柜里无生命的标本几乎没有推动自然史研究的进步。<sup>11</sup>

植物药用价值以及治疗效用的名声很快就传到大洋彼岸，西班牙国王立即派遣其公共卫生大臣（public-health official）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Francisco Hernández）前往墨西哥调查这里的天然产物。经过数年的研究和调查后，他把自己的工作成果送到欧洲，但不幸的是相关资料失传了近 3 个世纪。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医疗完全被文化习俗和宗教仪式的统治所覆盖，人们只能在远离城市和教会控制的地方私下实施疗法。

11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在探讨古代植物园的遗迹。1545 年在帕多瓦（Padua）出现了欧洲有历史记载的最古老的植物园。蒙特祖马花园的历史更为悠久，花园以其植物的品种、产物和用途闻名于世。参见 ELIZALDE 2018: 77-83。《国王的动物：特诺奇蒂兰中心的动物园》（*The king's animals. The vivarium in the heart of Tenochtitlan*）。当然，针对穆斯林和犹太世界的进一步研究，将补充目前所知的信息。



直到 18 世纪晚期,在启蒙思想(enlightened thinking)的影响下,人们再次对墨西哥的自然界产生兴趣,新西班牙植物考察团(Botanical Expedition of the New Spain)(1787—1803)得以组建。为了找回丢失的资料,并为新创办的马德里植物园(Botanical Garden of Madrid)送去培育材料(LOZOYA 1984, VEGA 2014)。几乎在同一时间,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在两百多年前送出的材料被发现了。由此到 19 世纪初,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和资料已经到位,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开展必要的整理和研究。

然而相关的工作一直没有什么进展,直到 20 世纪中叶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重启研究工作,传播丰富的自然资源。首先,大学公布了当时还不为人所知,或是一度遗失的各种材料;<sup>12</sup>随后,大学又开始推动生物、生态、环境研究所,以及其他的研究组织开展相关研究。<sup>13</sup>在此基础上,大学建立了另一座在空间上临时的、文化的桥梁纽带:植物考察团将外部世界的知识带往西班牙,接着由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工作重启和资料发布,这些材料又被带回了墨西哥。

收藏方面,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自 1929 年以来就建立了墨西哥国家植物标本馆(National Herbarium of Mexico, MEXU),培育着墨西哥最重要的植物收藏。标本馆拥有超过 130 万件标本,是墨西哥乃至拉丁美洲规模最大的植物标本馆,也是全球十大最活跃的植物园之一。自 1959 年以来,大学拥有了一个植物园,这也是在墨西哥创建的第二个植物园<sup>14</sup>。目前,大学还正在建设一座国家生物多样性展馆(National Pavilion of Biodiversity)。

即使不考虑国际科学发展的影响,大学已对墨西哥的天然物产及其传统用途给予了高度重视。大学的植物标本馆和植物园都面向社会开放参观,并且设有专门的教学、研究和传播计划。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目前拥有的 25 座博物馆中,以科学为主题的有 11 座。本文将重点介绍对于复原墨西哥动植物知识具有重要意义的两座博物馆。尽管在规模、位置、理念、功能和目标方面截然不同,然而两者的活动都与当前大学的责任有关。其一是面积达到 3 000 平方米的墨西哥医学博物馆(Museo de la Medicina Mexicana);其二是面积仅有 30 平方米的野生动物博物馆(Museo de Fauna Silvestre)。

1980 年,墨西哥医药博物馆在历史悠久的老城区中心的医学院旧址(Old School of Medicine)落成。<sup>15</sup>这是一座由医学领域和博物馆学领域专家共同创建的注重传播的博物馆(dissemination museum),其使命是向人们介绍墨西哥医学的发展轨迹。除了拥有一座历史图书馆以外,博物馆还承担着一些管理项目和专业课程。这样的运作方式使之成为一个活跃着的、每一代年轻学生都必须造访的中心。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墨西哥医学的发展可分为前西班牙时期、殖民时期和现代时期三个阶段,每个时期都有最具代表性的内容。前西班牙时期开始,就以《草药室:身体和灵魂的药物》(*Sala de Herbolaria: medicina para el cuerpo y el alma*)为主题,收录内容包括第一批西班牙人收集的复本、图像和文字信息(VOCES 2015, 117&119)。

除了被遗忘在陈列柜中的意外资料,博物馆外部的花园里还种植着来自普雷佩查地区(purépecha region)的、可用于当地传统疗法的药用植物(如图 1 所示)。草药师和治疗师有时会参加博物馆的会议,他们随身携带自制的药品,并解释这些药品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甚至亲自演示疗法。

因此,具有世代性、文化性和社会性的新的双向知识桥梁纽带已经建立:学者和博物馆学专家提供了外部的知识;而知识的重返,又让本地群体的知识和实践得以进一步充实。

12 其他作品还包括《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全集》(*Obras Completas de Francisco Hernández*),这是一项从 1956 年到 1985 年,历时 30 年的成果。数字版随时可以查阅:www.franciscohernandez.unam.mx/

13 除此之外还有学校,生物学、生态学研究所,以及大学的环境项目(University Program of the Environment, PUMA)

14 网站

15 这里还曾是宗教法庭裁判所(Holy Office of the Inquisition)的总部。



图 1

墨西哥医学博物馆的植物园  
(Museo de la Medicina Mexicana)  
图片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提供

与上述博物馆有所不同,位于库奥蒂特兰(Cuautitlán)高等教育学院(Facultad de Estudios Superiores)<sup>16</sup>的野生动物博物馆,则是在为兽医专业教学服务的学术型博物馆。博物馆是由一位老师发起,并在其同事和学生的帮助下,于2008年建成。他们收藏了当地自然环境中的标本,面向年轻的兽医和当地社区开放。

博物馆面积很小,位于大学的校园内。博物馆的展厅里放置着大约296件标本,分属不同的类别,从节肢动物(蟑螂、狼蛛)到脊椎动物(蛇、狮子、鹿),有的标本被完整保存在酒精或福尔马林溶液里,有的则是解剖后的表皮或完整骨骼,其他还有乌龟壳或各类哺乳类动物的头骨等。

这些标本中的大部分是通过学生和普通公众获得的旧藏或捐赠。标本是在学校附近的区域或国内其他不同的地区发现的,只有来自动物园的动物标本是一批特定的捐赠藏品。

延续以往科学陈列柜的方式,这座博物馆的展品同时具有教育和娱乐的功能,既能作为特定学科正式教学使用的教材,也能让不具备专业背景的观众有兴趣观看。

需要强调的是,创办这座博物馆的过程中,师生们对于诸如采集、调查、筹备、展示、交流和阐释内容,以及管理场馆等基础性工作的兴趣得到整合。<sup>17</sup>尽管他们没有获得博物馆学的相关技能或复杂论述能力,但这些工作依然提升了参与者的其他能力(与博物馆话语有关,在课程的特定来源之外),通过维护标本,使之成为博物馆的藏品资源,激发了个人和群体的情感满足和自豪感(如图2所示)。

在许多大学、中小学校和社区博物馆中,这种关系是共通的,体现出在文化遗产的传承、展示和交流,以及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发展之间,已产生了重要的联系。

上述过程可以视为世代性、文化性和社会性的双向知识连结桥梁纽带的另一个案例,教师们组织和传授外部的知识,而学生们完成了重构工作,并与当地社区分享了这些成果。

虽然两座博物馆在理念和功能上有所区别,但其所传递的信息,以及对于新的知识和实践的推动作用,都非常重要。

16 位于墨西哥城的区域,主要从事畜牧业研究。

17 课程的组织由此获得了一些收入。博物馆的所有信息都是由博物馆的发起人兼馆长玛丽亚德·拉·卢斯·蒙特罗(Mariade la Luz Montero)教授提供。





图 2  
野生动物博物馆，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图片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提供

尽管如此，仍然面临着很多挑战需要克服。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分享大学 25 座博物馆中这 11 座博物馆的经验，这些经验并非来自各自的专业领域，而是要在大学文化生态圈中推广经验以满足博物馆的需求。

### 总结思考

首先，这些努力可能看起来很不均衡，但反映出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及其所在社区在有关博物馆表达中的愿景，即追求整体性和包容性。然而，这也回避了一个问题：即大学博物馆需要承担多少学术团体的工作，他们需要间隔多久更新一次？如何让学生参与国家自然资源的保护？如何恢复属于我们自己的事物，并防止这些知识和文化习俗消亡？大学博物馆如何才能制止对遗产的不正当利用？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另一种情形：我们该如何去殖民化，如何在我们的博物馆里展出自然史，如何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我们必须采取何种政策和行动，来推动去殖民化？

对于大学博物馆而言，所面对的这些问题是极为复杂的，因为没有学术和机构的支持，就无法紧跟前沿的研究、面临的问题，或是相关的阐释。社会的网络化发展，也需要大学、博物馆和专业人士向网络化转变。利用这些变化和运用新的技术，肯定成为重新评估自然遗产的路径。

我们必须牢记，过去的几十年里，政府和大学在恢复原住民族群的医疗、饮食、文化和社会实践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如今我们也拥有了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教科书、广播和电视节目，以及各种资料。因此，双向知识通过寻求对话，试图恢复不同的解释，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形成中立，从而缩短地理、文化和社会之间的距离。

### 进展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通过建立科学知识与原住民知识、混血族群（mestizo group）与原住民族群（indigenous group）、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联系，继续处于恢复、研究和传播与环境和自然史相关主题的前沿。通过设立特殊项目，例如面向原住民社区的教育计划，让他们也能进入大学校园，学习法律或医学等专业，并有机会以自己的母语获得学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期望他们能够回到社区并支持自己社区的发展，同时保留原住民的身份（如图 3 所示）。





图 3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海报，

2018 年 12 月 13 日

图片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提供

### 墨西哥的大学 (UNAM)

在自然历史和自然环境主题的博物馆里，也可以开展类似的实践活动，以便将墨西哥草药学（Mexican herbology）知识、当前使用方法的培训，与传统的知识和做法这三者联系起来：

大学的遗产：各种植物园（属于中学教育乃至研究机构）、地质园、藏品（活物和展品），以及大部分用于研究和教学的生物档案。

大学博物馆：开辟草药、动物学，以及健康主题的展示空间。

批判博物馆学：广义上的博物馆学，并不局限于博物馆化的物品或艺术主题，而是通过研究和批判性分析，以及知识、遗产和创造者的交流，来推动博物馆学更好地面向社会服务。

这就包括了历史、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下的全部文化和自然遗产。博物馆学的发展，将博物馆从某个地区记忆的保存空间，转变为推动社会福祉进步的场所（NAVARRO 2006）。大学社区支持具有包容性和跨学科视野的批判博物馆学。正如盖诺·卡瓦纳（Gaynor Kavanagh）于 1992 年提出的观点（Lorente, 2003）：“不同知识分子的立场，通过批判、修正和探讨等方式，拓展视野和解放思想，激发博物馆的潜力。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努力，可以重新评估我们的自然史，赋予个性化的感受和社会的实际需求。”

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文化遗产和博物馆。必须建构新的联系桥梁，以凸显其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和实用性，批评博物馆学的原则能为我们铺平前行的道路。

鉴于目前面向原住民年轻一代的特殊教育计划已经较为完善，我们建议将其扩展到其他项目和领域，邀请更多的学生来了解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在自然和文化遗产方面所拥有的收藏，能提供的服务，以及今天在藏品保存、展示，自然史研究和推广方面所作出的努力。通过上述方式，我们将推动不同领域的专家、当地社区、其他地区，以及不同代际的交流，成为通往新的知识、实际行动、参与性和社会影响力的桥梁纽带。



### 参考文献

- BECERRA LÓPEZ, J. L. 1963. Organización de los Estudios en la Nueva España. Mexico: Taller de la Editorial Cultura.
- ELIZALDE MÉNDEZ, I. 2018. Los animales del rey. El vivario en el corazón de Tenochtitlan. *Arqueología mexicana* 150: 77-83.
- GUEVARA, R. 2002. Los últimos años de la Historia Natural y los primeros días de la Biología en Mexico. *Cuadernos del Instituto de Biología*: 35.
- LORENTE, J.P. 2003. La nueva museología ha muerto, ¡viva la museología crítica! In: *Museología crítica y arte contemporáneo*, J.P. LORENTE & V.D. ALAMAZÁN (coords.), Spain: Prensas Universitarias de Zaragoza, 13-25.
- LOZOYA, X. 1984. Plantas y luces de México. La Real Expedición Científica a Nueva España (1787-1803). Barcelona: Del Serbal.
- NAVARRETE LINARES, F. 2008. Los pueblos indígenas de Mexico. Mexico: CDI. <http://www.cdi.gob.mx>. (accessed June 1, 2018)
- NAVARRO, O. 2006. Museos y museología: apuntes para una museología crítica. Ponencia presentada en el XXIX Congreso Anual de ICOFOM/ XV Congreso Regional ICOFOM-LAM Museología e Historia: un campo de conocimiento, October 5-15, 2006, Argentina.
- QUESADA GARCÍA, O. et al. 2017. Discurso y decolonización en Mexico y América Latina. Mexico: CEIICH-UNAM.
- RICO, L. 2007. La Historia Natural tras las Vitrinas. In: *Museología de la ciencia: 15 años de experiencia*, L. RICO, Mexico: UNAM, 37-66.
- RICO, L. 2010. Objetos y colecciones para la divulgación de la ciencia, primeros pasos. In: *Ciencia Pública*, M.A. SÁNCHEZ VÁZQUEZ & S. BIRO (coords.), Mexico: DGDC-UNAM & UABC, 157-174.
- RICO, L. 2014. Herencias y desafíos de los museos universitarios de México. In: L. RICO, *Nuevas aportaciones a la museología mexicana*, México: UNAM, 125-141.
- RICO, L. 2017. Museos universitarios de México. Recorridos y retos. *Revista SPINOR* 8 (34): 2-5.
- UNAM. 1983. Síntesis histórica de la medicina mexicana. Mexico: UNAM.
- UNAM. 2015. Voces y ecos del Palacio de Medicina. Desde la Plaza de Santo Domingo a los anexos de la Calle de la Perpetua. Mexico: UNAM.
- VEGA, R. 2014. La naturaleza mexicana en el Museo Nacional, 1825-1852. Mexico: HCH, AC.

### 联系方式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University Seminar Of Museums and Museum Spaces  
sumyem@unam.mx  
lfrico@dgdc.unam.mx

### 关键词

Natural history, contact bridges, reassessment and decolonization, critical museology.



# 大学藏品的相关文献： 面向校园内外的包容性 与公平性实践

Karin Weil G., Claudia Ordóñez R.,  
Constanza Chamorro P. / 文  
骏仁 / 译

## 摘要

智利南方大学 (Universidad Austral de Chile) 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保存有关国家、民众和地区发展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学收集的各类藏品，呈现了前西班牙时期、殖民时期和当代历史时期，由多元文化构建的国家。在知识创造的新的模式下，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诠释文献与藏品的价值和作用，本文建议通过三种基于社区参与且相互关联的举措来实现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并构建新的共识和意义。



## 引言

“大学博物馆拥有道具——有实物藏品、正规的研究人员和实验室。在收藏、研究和阐释当代科学、艺术和文化资料，以及非物质遗产等复杂问题上，大学博物馆可能比其他任何机构都有更多的机会获得知识……” (Lourenço 2008)

作为位于智利最南部的大学，智利南方大学自 1954 年成立以来，一直是所在社区和所在地区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不仅满足当地教育的需要，而且也照顾到所在地区的专业需求、经济实力和文化遗产利益。在建成后的十年里，大学通过保护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加强了与所在区域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通过这一方式，保存至今的藏品反映了前西班牙时期、殖民时期和当代智利南部地区多民族的历史和多元化的文化，并构建了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

博物馆理事会 (Museological Direction, DM) 目前由学术副校长 (Academic Vice-Rector) 直接管理，负责规划、组织和管理大学的学术活动。博物馆理事会与《2018—2022 年战略计划》(Strategic Plan 2018—2022) 的规划前景和战略目标体系一致，围绕使用者开展工作，协调遗产教育、研究人员和公众的利益；理事会通过各种组织，例如洛斯里奥斯地区的博物馆网络 (Museum Network of the Region of Los Ríos)<sup>1</sup>、遗产教育网 (Network of Heritage Educators)、国际博物馆协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 下属的例如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 (UMAC) 等国际委员会，为相关行动提供资源和资金。内部管理方面，理事会的研究活动主要依靠国家拨款和私人资助，例如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 (National Fund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FONDECYT)、智利南方大学研究与发展部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ivision of the Universidad Austral de Chile, DIDUACH)、欧盟创新与研究计划 (EU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Program) (H2020) 的国际项目，以及国家文化、艺术和遗产基金 (National Fund for Culture, Arts and Heritage, FONDART) 等。最后，理事会还监督开发和学习内容，重点关注藏品和遗产相关资产的保护和管理，包括布鲁迪亚德国殖民博物馆 (German Colonial Museum of Frutillar)、鲁道夫·A. 菲利普探索博物馆 (Museum of Exploration Rodolfo A. Philippi)、毛里西奥·范·德·梅勒历史与人类学博物馆 (Mauricio van de Maele Histor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Museum, MHAMM)、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方济各会传教士遗址 (Franciscan Mission Cristo Crucificado de Niebla)、圣何塞·德·拉·马里奎纳的圣劳拉公园 (Santa Laura de San José de la Mariquina Park)、柯纳里佩的米拉瓦皮岛公园 (Millahuapi Island Park in Coñaripe)，以及具有历史、遗产和科学特征的大学生藏品。

通过上述做法，博物馆理事会 (DM) 希望实现机构对保护地方遗产的承诺，发挥知识来源、社区联系以及大学拓展的功能。自成立以来，智利南方大学 (UACH) 的使命被认为是：“通过研究、教学和博物馆学科，评估瓦尔迪维亚省和第十区的历史、科学、考古遗产的价值。大学创立以后，致力于保护第十区的历史、科学、文化遗产，这些鲜为人知的遗产极其丰富，人们通过零星的、非公开的和系统性的研究才得以了解” (ADÁN 1998)。

多年以来，博物馆理事会开发的项目具备丰富的社区元素，即使其早期的基础工作也不例外。如今，指导原则意味着专业团队的扩大和学科的多样化，随着新的挑战的出现，博物馆理事会关注当地遗产的可持续管理，在当地、所在区域以及国家层面的地位不断提升。

说起博物馆理事会管理的藏品，就必须提到来自毛里西奥·范·德·梅勒 (Maurice van de Maele)、盖布里尔·瓜尔达神父 (Father Gabriel Guarda)、瓦尔迪维亚的德裔家族 (German families of Valdivia) 及其周边的捐赠。当历史与考古研究中心建成后，毛里西奥·范·德·梅勒通过数次实地考察，确认了区域内的很多历史遗迹。他在 1967 年绘制的系列地图中 (图 1)，非常明确地标明了瓦尔迪维亚海岸的防御工事和炮台 (fortifications and batteries on the Valdivian coast)、马普切社区 (Mapuche communities)、篝火、炮弹和其他考古遗址，以及殖民时期和 1900 年以后建立的传教机

1 约在圣地亚哥圆桌会议 (Santiago round table) 前后，1972 年。



构的方位。正是基于上述实地考察，他收集了前西班牙时期、殖民时期和当代的具有不同历史意义的物品。然而遗憾的是，并没有详细文献记载这些物品的时代背景，很多情况下只有最基本的目录清单；可以说他拯救了当地的遗产，并推动了保护和展示工作，但同时也不得不弥补地域认同和传承联系上的缺憾。



图 1

地理环境

图片来源：博物馆理事会，  
智利南方大学

正是这些明显的分歧，由于意义和内容上的微妙差异，已经成为了博物馆与社区之间开展互动过程中最大的障碍之一。对于地域认同的解读一旦带有偏见，很可能引起质疑，进而失去既定话语权和合法性。与传统博物馆一样，接受和了解“遗产认同与评估问题”（problem of recogni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heritage），可以成为重新思考当代大学博物馆功能、作用和使命的机会。

鉴于再度引发的关注，本文所记录的 2017 年开展的活动，是基于 1972 年圣地亚哥管理局提出的原则。这次在智利举行的会议上，决定将博物馆重新规划为致力于推动人们关注社会、文化和生态等问题的机构。目前博物馆理事会采用“整体性博物馆”（Integral Museum）的理念，提出在博物馆内部推行动态工作机制，不仅要构建藏品的语境，还要兼顾树立知识和内容上的共识。

### 挑战：评估与认同

今天，我们博物馆行业面临的很多问题，与全球范围内的传统困扰是相似的。历史进程呈现出地域的特性，社区对博物馆提出的社会需求，是作为历史进程所造成的社会文化变化的回应，不仅承认族群的多样性，也认同包括人权、保护自然资源、歧视问题等当代其他社会现象，这些都迫使相关机构将注意力分散到更多的领域。

一旦提到多样性和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我们首先联想到霸权话语的承袭问题（patrimonial problems of hegemonic discourse），从而发现博物馆作为物品的收藏机构，代表着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和/或群体的正式话语体系。这种对博物馆业务最保守的认知，所导致的问题就是由于所代表的文化和被忽略的文化之间缺乏共识和对话，人们开始质疑所谓的遗产价值。正如弗洛雷斯卡诺（Florescano, 1993）所说，传统上认为“文化产品





和证据资料的选择,都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完成的,所依据的标准和价值观并不具有普适性,相反可能有限制性或排他性。”基于这一说法,可以判定承袭价值是一种社会构建的而非内在的价值。可能是一件物品,或是一套藏品的所有者,然而没有人或者国家能够拥有物品的遗产价值。与社会分享价值,就会获得认同。

通过在正式话语权的形成过程中纳入社会融合与社区参与,可以推动更多的认同与对话,缓解某些阶层的边缘化和/或其被主流文化掩盖的问题。对于大学博物馆而言,必须在其机构组织内部、周边社区,甚至在更大范围的区域内全面贯彻公平性;作为一个发散性的网络,大学博物馆需要最终形成一个围绕文化遗产相关反思的多元化网络(divergent network)。

通过上述方式实现公平和包容的过程非常缓慢,博物馆的理念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理论一方法的发展,提出了整合社区并强化其文化特征的新方法。1971 年,在法国格勒诺布尔(Grenoble)举行的第九届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IX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COM)上,提出了“生态博物馆”(eco-museum)的概念,新博物馆学诞生。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了以“博物馆在当代世界的重要性和发展”(The Impor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useum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为主题的圆桌会议,会议同意在“整体性博物馆”理念的基础上推动体验的发展。

面对上述模式的变革,作为有责任持续推动教育和文化进步的机构,大学博物馆“必须致力于加强与社区之间的合作,在区域内创造历史、文化、物质和非物质、艺术、科学和自然遗产的价值”(合作意向书,“南方共同市场”大学博物馆第八届会议(VIII Meeting of University Museums of Mercosur),利马,2017)。基于共同感兴趣的框架,探讨视域的范围不仅考虑到跨学科(multidisciplinary)或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的广度,而且还迫使我们关注博物馆内部、大学内部、当地或区域内社区的不同层面的“差异”(difference)问题,并分析其与国家层面的关系;随后,在每个层级确认不同群体,例如与大学有关的学生、管理人员、学者、退休的专业人员,以及相关家庭的代表性和参与度。

雨果·德·瓦兰(Hugues de Varine)提出“全球遗产管理的理念符合所有人的利益”(2012 年),他将博物馆传统的收藏和保护功能重新排序到第二位。然而,整体性博物馆的理念,意味其既是一个能够解释所有社会问题的平台,也是一项能够阐明社会变革的工具。有鉴于此,所有通常具有排他性的做法(在本文中指的是文献和登记)也必须服务于提高意识和社会行动等更高层次的目标。<sup>2</sup>作为历史和记忆的主角和主要参与者,对于遗产的认同和评估,与社区的认同和评价之间相互呼应。

2003 年发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部分原因就在于其民主化的提案,旨在提高团体(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是个人)的知名度并赋予其相关权限,使之具有特定的文化身份。与所在社区的现实联系,这一点不同于以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的关注点,之前那些公约在甄选某个社区的遗产物品和判断价值归属时,往往具有霸权主义的意识。将文化物品的合法继承权赋予当地社区或团体,这是意义深远的变革,作者称之为“参与遗产工作的新范式”(the new participatory paradigm of heritage)(ADELL et al. 2015, CORTÉS et al. 2017)。

在民主化意识的影响下,遗产的认同和评估过程也不会被特定群体两极化或集权化。相反,大学博物馆及其藏品完全可以遵循当今社区博物馆的建设原则,也就是说通过多元文化主义、跨学科和发出社会的声音,推动多个部门的对话,关键是加强机构和行动实施

2 薇薇安娜·里克尔梅(Viviana Riquelme)访谈,2017 年 9 月, [www.museosaustral.cl](http://www.museosaustral.cl)



者对于文化遗产及其相关管理的责任感，赋予项目本身以合法性，“这相当于说，没有文献或物品具有绝对的和内在的价值，但这代表着某种社会共识”（GREZ 2009）。

最后，“博物馆是服务社会的机构，也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本质要素，使之形成了参与服务社区的意识，通过这种意识，博物馆可以帮助社区付诸行动，并通过自身行动来实现从历史到现实的闭环；也就是说，将过去与现在结合起来，致力于当前结构性的变革，并在各自国家的现实环境中激发其他变革”（博物馆在当代世界的重要性和发展圆桌会议，决议，1972）。

### 社区参与练习

根据上文提到的博物馆学理论的历史背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通过当地社区的博物馆和藏品来认识和评估社区的过程，作为验证当地和特定背景的工具。通过这种方式，下文提出了社区参与的三种实践方案，我们将讨论通过文献合作实现公平性和认同大学藏品的各种方式。这些行为加强了机构与三个不同层级社区之间的联系：即博物馆内部社区（每月藏品，object of the month）、大学社区（首份大学藏品登记簿，first cadaster of university collections），以及区域 / 国家层级的社区（“洛斯里奥斯地区纺织类藏品的多民族记忆”项目，“Pluri-ethnic Memories in the textile collections of the Region of Los Ríos” project）。

### “每月藏品”项目

这项练习是完成一个小型的月度展览，展览涉及一件展品和一张信息图表（图2）的布展，具体的组织和落实是由博物馆理事会的管理人员和专家协同完成。规划整个项目的流程，包括制订日程表、工作方案、设计参数和输入标准化数据。毛里西奥·范·德·梅勒历史与人类学博物馆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空间，其中摆放了一个展示柜（50 厘米 × 70 厘米 × 50 厘米）和一张信息图表（70 厘米 × 40 厘米），后者由文献以及机构的标准色等基本内容构成。



图 2

由勒内·贝罗伊扎（René Beroiza）和卡拉·埃勒斯（Carla Ellez）挑选的“每月藏品”  
图片来源：博物馆理事会，  
智利南方大学



上述的日程表是一种约定，允许博物馆每位工作人员，包括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每月或每年度组织一次展览，并有权从藏品库房自主挑选用于展览的物品。上文提到的工作原则旨在实现系统化的工作流程，确定项目实施的各个阶段、完成时间、内容表现形式，以及展览附带的图表材料。具体流程则根据以下工作分配：1. 进入藏品库房挑选展品；2. 藏品保护流程（清洁、照相、登记和包装）；3. 编写详细的说明文字，介绍物品的背景并突出特定意义；4. 文字和版式设计；5. 布展和宣传工作。

当每年的“每月藏品”活动结束后，12 件藏品的展览（图 3）、相应的信息图表，以及小宣传册一并提供给博物馆的观众使用。这项活动的吸引力在于展览将在博物馆理事会管理的其他区域的博物馆里举办巡展，这也引起新的同事们想要在次年参与展览的意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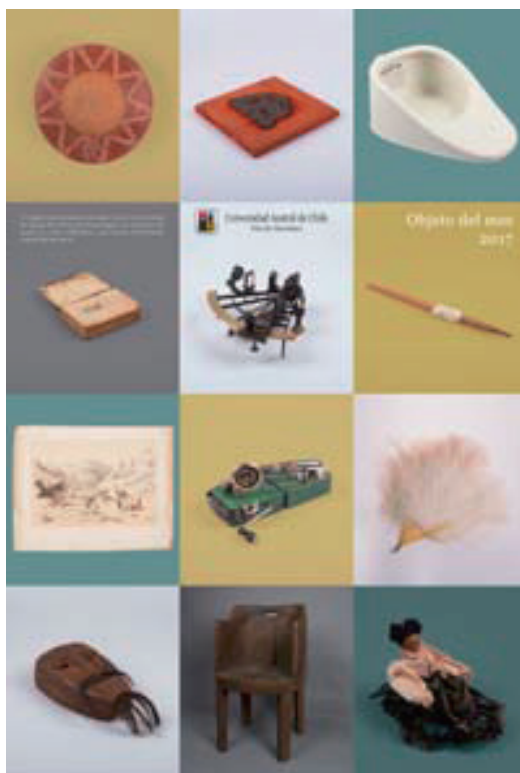


图 3

“每月藏品”临时展览的  
补充文献

图片来源：博物馆理事会，  
智利南方大学

于是，以这个小型的收藏活动作为开端，实现了专业人员和普通工作人员之间、博物馆各个职能领域之间的合作与跨界。同样，工作联系和工作动力得以增强，持续支持不同阶段的工作，最终结果是整个项目趋于规范化并保证了质量。

从结果来看项目是积极的，不仅圆满完成了日程表，而且还是博物馆理事会推动民主化的第一次尝试（这一过程似乎经常归属于保护实验室）。另一方面，从跨学科和多视角阐释的观点出发，在调查和抢救每一件作品的特征时，已经认识到理念的价值。

同样地，通过项目还能观察到策展人与展品之间新的所有权关系，展示的物品也体现出策展人的个性与偏好，甚至在一组实物中可能区分出每个人的特质细节：具有女性气



质的羽扇，联想到童年的木制玩偶，对于英国瓷器的专业兴趣，以及隐藏在马普切文化（Mapuche culture）木质面具背后的沉默个性。

在《“南方共同市场”大学博物馆第八次会谈合作意向书》（*Letter of Intent of the VIII Encounter of University Museums of Mercosur*）中也能看到，在所涉社区最内部和最多样化的层面上，还存在着新的兴趣点：博物馆内部不同部门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让藏品获得进一步的认可并产生价值，这些都是出于对知识的情感而发展形成的。这不再仅是一个 kollón（图 4），而是由我们的同事挑选和记录的“那个”面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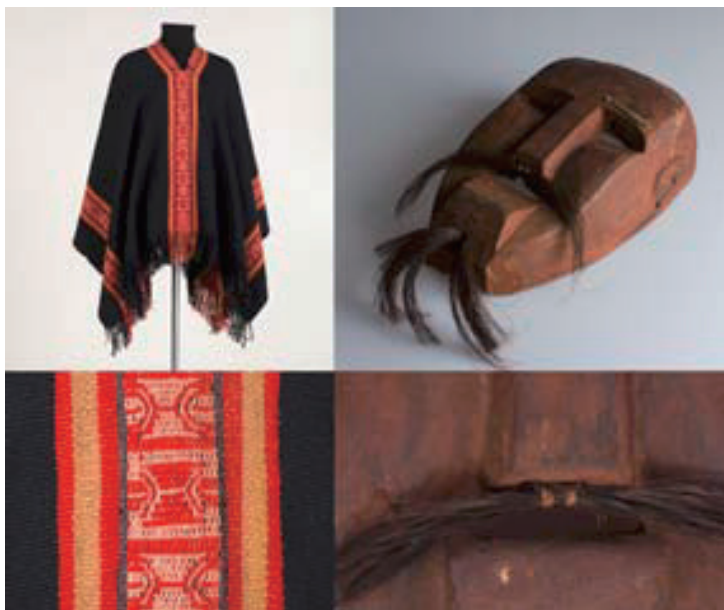


图 4

左图：绣有婚庆图案的  
Makñ（即马普切毛毯），  
洛斯里奥斯地区纺织类藏品的  
多民族记忆项目  
右图：用木头和马毛制成的  
Kollón（即马普切面具），  
“每月藏品”项目  
图片来源：博物馆理事会，  
智利南方大学

另一方面，为了理解这个项目对于博物馆理事会的意义，有必要介绍其负责管理的重要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大量历史和考古方面的藏品，总数多达约 8 000 件。其中只有约 10% 的藏品在理事会管理的大学博物馆长期展出，另外还有 18% 的藏品被借给了洛斯里奥斯地区的其他文化空间展出。

在这种情况下，毛里西奥·范·德·梅勒历史与人类学博物馆（MHAMM）、弗鲁迪亚殖民博物馆，以及 R. A. 菲利普探索博物馆这三家机构应该说一直没有发生重大变化，除了毛里西奥·范·德·梅勒历史与人类学博物馆的马普切银器陈列室（Sala de Platería Mapuch）进行了展览维护工作，包括更换一些展品，但保留了原有的大部分展品。因此，从藏品的角度来看，这项工作有助于对存放在库房的物品进行评估，维护其收藏状态（清洁和包装），并从不同角度生成更完整、综合的记录；然而同时也涉及新的动态关系，例如专业人士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是如何与藏品联系在一起。博物馆内部的这种民主化做法，通过遵从协议、维护和挑选藏品、编辑文本、设计海报，以及为布展提供支持等跨文化包容性的工作，分享了权威性。

“每月藏品”项目证明了不但有可能更深入地展示和记录不同的研究经验，还意味着藏品在语境化的基本陈列之外同样具有收藏价值。选择的藏品是多样化的，也有助于深化其他类型的藏品；物质性、年代、历史和象征语境。根据个人动机、兴趣和好奇心选择的藏品表明，项目过程中的每个阶段，在挑选、记录和研究，以及蒙太奇效果中，都存在着





一种“主观”的认同感，这种感受考虑了基于藏品来源地、历史背景和记忆的承袭过程。对于大学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来说，这次活动既让他们从自己的参与体验中了解到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职责和必须履行的业务，也从整体上验证了工作的有效性；展品背后的每个过程都有价值，是我们共同参与过程中的一部分。



图 5  
大学藏品的体系、社会  
功能与相关文献，  
智利南方大学

所示方案（图 5）从博物馆的功能出发，汇总了智利南方大学博物馆全体工作人员的发展实践，着重强调了这一过程中的社会功能是如何对他人互为影响，并在过程中赋予了博物馆展品潜在的“个性化”象征性价值。

### 大学的首本藏品登记账簿

1954 年 9 月 7 日，为了满足智利南部地区“对高等教育机构的迫切需求”，智利南方大学在瓦尔迪维亚（Valdivia）成立，为当地社区建设了第一批教学计划和研究项目，包括美术、农学、林业技术工程学和兽医学等学科。

上述学院自创建之始就获得了来自国外的捐助，其中最主要的是居住在瓦尔迪维亚的德国家庭与国际合作项目，例如与德国哥廷根大学（University of Göttingen）林业工程学院（Faculty of Forestry Engineering）达成的校际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一支由专业人员、仪器设备和配套车辆组成的强大团队提供支援。农学和兽医科学学院也有类似的合作项目。

这些基地以合作为主，大力发展科学事业，陆续取代了原有的植物学、动物学、化学、物理学和普通生物学的实验室；相关的教学材料也很快到位，比如模板、模型、论著汇编、先进的设备和教学资料，这些绝大多数都是从德国运来，或是由教授们亲自订购的。这些实验室奠定了今天理学院的基础。经过 64 年的发展，大学已拥有 10 个学院，59 个机构，43 个专业，学科领域积淀深厚。





从第一批教授入职和第一届毕业生完成学业到最近几年,随着工作岗位、教学空间、研究所、专业人员的逐渐重组、扩张与合并,能明显感到专职人员的不断变化。如今教师的更替,意味着他们对前辈学者的研究路线以及他们征集的藏品有着陌生感。然而没有一位学生或教授能够传承这些遗产,由于对这些藏品价值一无所知,使之处于“可以弃置”或“可能有用”的尴尬境地。

图 6 智利南方大学森林科学与自然资源学院(Faculty of Forest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地域研究所(Conservation, Biodiversity and Territory Institute)生物技术实验室(Biotechnology Laboratory), *Raulí*(山毛榉, *Nothofagus alpina*)克隆基因库(Clone Bank)图片来源:博物馆理事会,智利南方大学



当然,也有教师将仪器和设备视为遗产,加上年代标记,重新赋予其意义,但这并不常见。由于存放空间有限,那些不喜欢利用这些材料的教师,就会像打扫退休人员办公室那样,将物品一股脑地清理了。

这种无知的做法,使得年轻一代的学者没法了解他们前辈们的研究工作。不过,可以通过教职工之间直观地呈现资料,避免此类情况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教师个人或实验室的遗产得以保存,而现有教学材料或研究结果的记录没有留存下来的原因,尽管这些物品在特征、数量或种类上都很有价值,但在某些人看来这些都不是藏品,因为缺少任何的库藏清单或直观可见的记录。

大学需要通过员工的回忆和各个研究领域的成果来保存其历史,以维护机构的利益。与大学有关的历史能让人们对所在地区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可持续发展。转折点是发生在 2007 年的一场火灾,烧毁了索引代号 VALD 的植物标本室。标本室创设于 20 世纪初,保存了由雨果·冈克尔(Hugo Gunckel)、格哈德·福尔曼(Gerhard Follman)和彼得·温伯格(Peter Weinberger)等国内外植物学家采集的 16 000 多件标本,其中包括现已灭绝的物种。植物标本室的焚毁,不仅意味着学校失去了珍贵遗产,也直接影响到南方大学植物园(Botanical Garden of Austral University)正常开展植物的多样性保护活动,影响到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这些标本曾被用于评估智利南极大区麦哲伦省的托雷·德·裴恩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 of Torres del Paine)大火后的生态破坏程度(RAMÍREZ 2008)。

通过上述方式,开创了拯救大学遗产的首个案例。这包括编订文件的过程,已超出了原先博物馆的范围,融入了与遗产关系稍远的整个大学。

组建一支由不同学院、不同专业方向和不同学术背景的多学科、跨越代际的专业人士构成的团队,是实现沟通与交流的前提。如此才能兼顾和响应知识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不



同观点,汇编成登记账簿。与所登记藏品、物品和档案资料有关的文件,需要教师、学者和管理人员共同参与编订。登记账簿还记录了以往鲜为人知的有关大学的背景故事。这些故事让我们了解到与学院、研究所、实验室有关的“小天地”里发生的错综历史和社会文化动态。

为了有效落实上述提议,院长与部门联系人安排召开会议,与研究所的主任和实验室负责人进行沟通,首先确认可以找到的藏品或设备。

为了便于登记,我们制作了一份分类文件,针对设备或藏品的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文件涉及的信息包括:负责人和正式存放的方位、藏品类型(科学、历史、教学、档案或不可移动)、描述文字和背景介绍、保存条件,以及相关的规章制度和协议。藏品和档案登记账簿里附有照片,对应藏品的特征、存放状态、保护方式,以及尺寸。

在造访这 59 个研究机构的过程中,我们尽力与最资深的教职工和管理人员建立联系,得以在他们的教育空间中直观地目睹专业工作的历史和发展历程。尽管有些藏品登记在册,但仍有可能划分出动态关系,即前几代学者的遗产与“教师-学生”的关系,赋予了当前教学过程中表达的意义,以及如何将这些过程与物品和藏品本身进行关联。

这样一来,空间上的承袭,孕育了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利用藏品(持续发挥作用和增长数量)和保护物品对象的动力,成为留存历史的一种方式。这就是在历史悠久的学院中往往能看到跨代传承研究的原因,这些学术团队在同一所大学里接受专业培训。相形之下,缺失跨代联系的学术更新,将导致藏品流离失所、不被认可,乃至否定价值。

由于大学最初是由数个院所组建而成,而大部分院所都专注科研和教学,因此很可能通过之间的亲缘关系,构建起院所之间最早的联系。这表明对于满足特定材料和/或技术要求来说,协同工作很有必要。兽医学院和医学院合作的动物组织显微样本,就是这样的案例。

第一批收藏的成就之一,就是确立了“藏品”(collection)作为大学正式遗产的理念,这超越了当前学术研究或利用的范畴。通过一份可见的机构收藏目录,赋予了校内和校外专业人员的工作合法性和认可度。同样,这也让人们有机会查阅一所与城市及其周围地区有着紧密联系的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历史。

跟此前的项目相比,社区能够通过登记账簿挑选藏品了,没有外界在内容、话语权或价值观上施加压力。相反,正如格雷兹(Grez, 2009)所说,是实验室、教授和管理人员的集体意识,提供了他们所代表的历史、突出特征和物品对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订第一份登记账簿的过程,让我们想到在大学运作了 64 年以后进行一次评估,看到其中的经验和教训,督促我们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保护和管理遗产,为在机构内部保持工作动力和地域认同奠定基础。<sup>3</sup>

---

3 约在圣地亚哥圆桌会议(Santiago round table)前后,1972 年。



图 7

胡安·惠奇科 (Juan Huichicoy)，  
沿海地区费塔尼马普织布工匠和  
马普切金匠，  
图像鉴别过程和纺织技术  
图片来源：博物馆理事会，  
智利南方大学

### 纺织类藏品项目：洛斯里奥斯地区的多民族记忆

2016 年，博物馆理事会对纺织类藏品进行了一次常规登记。通过整理，我们发现了约 500 件来自不同地区的文物。其中，鉴别出 193 件历史文物，169 件用于宗教仪式的文物，72 件民族类文物，以及 61 件附属的文物；近 80% 的藏品都存在保护方面的问题。与其他藏品一样，收藏和捐赠的过程表现出藏品来源的多样性，遗憾的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文化背景和相关文献的缺失。

针对明确的文献要求、可视内容的记录，以及某些情况要配备装具，需要向政府部门寻求资助。在国家文化、艺术和遗产基金 (FONDART) 的支持下，洛斯里奥斯地区的多民族记忆项目 (编号 419448) 对纺织类藏品的评估是首个案例，这推动了文献的编订和不同藏品类别的细化，让我们通过更深入地了解这些藏品，产生对当地历史的归属感。

除了在当地达成共识之外，项目还考虑到覆盖区域和全国影响范围的传播形式，诸如广泛的受众、包容性的策略，都是有别于以往的展示形式和获取遗产信息的模式。传播的渠道包括面向公共机构和瓦尔迪维亚社区 (Valdivian community) 的分类检索；为当地不同教育机构编写的盲文教学手册；还有国家级的文化组织和专业研究人员名单 (图 8)。

项目首先从纺织类藏品的保存入手，根据不同的材质、尺寸和结构，进行表面清洁、包装和存储。至于文献方面，考虑到纺织品种类及其背景的多样性，有必要组建一个由地方和国家专业人员组成的多学科团队。这充分体现出藏品的地域价值。在这一过程中，来自瓦尔帕莱索大学 (University of Valparaiso) 的设计师安吉拉·埃雷拉 (Angela Herrera) 负责鉴定和描述用于宗教仪式的藏品，确定其大致的年代、不同织物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以及与这些织物有关的内容。胡安·惠奇科 (Juan Huichicoy) 是沿海地区费塔尼马普 (Fei Tañi Mapu) 的织布工匠和马普切金匠，为民族学藏品的分类，藏品图案和当地颜料、传统技艺、不同产地的鉴别和背景介绍提供了帮助。与此同时，在文本内容的制作和编辑方面，得到博物馆理事会团队的通力协作，补充和突出视觉艺术、人类学、考



古学、藏品保护和建筑学的专业内容。汉斯·乌洛亚（Hans Ulloa）是职业治疗师，负责为教育机构提供教材的制作内容，尤其是针对盲文文本的编辑材料和音频的制作说明。



图 8

分类检索、目录和  
包含教学内容的图书

图片来源：博物馆理事会，  
智利南方大学

纺织类藏品具有多样性，这不仅反映在类型学方面，还体现在审美特征的多元、特殊技术的使用，或是每件藏品的来源等问题上，这就使与之关联的文献显得尤为必要。

根据民族学命名的毛毯，可能因其尺寸、颜色、图案和制造工艺而具有不同的名称。此外，研究工作结合图案元素与马普切文化的宇宙观，也能确认藏品的真正价值。发现这些差异变化，查阅完整的文献，并不是一个人单方面能够完成的任务。相反，通过不同知识领域进行多元视角的解读和鉴别，提升了藏品的价值，相关记录也更完整地阐明了历史。我们文化的大事年表同样呈现出多样化，其中人物、空间、经历之间的关联性，为当地的藏品和博物馆赋予了新的意义。



图 9

发放分类检索、目录和  
包含教学内容的图书

图片来源：博物馆理事会，  
智利南方大学





另一方面,从审美的角度来看,纺织品通常都需要触摸才能判断其质地,感受毛毯的厚度和天鹅绒的细腻;手指触觉和眼睛视觉的结合,才能构成完整的欣赏。所以我们不仅致力于融合正式文件里的不同观点,还思考着传播和获取知识的新形式。在这个案例中,为当地教育机构的学校融合计划(School Integration Programs, PIE)精心编写了一部包罗万象的教材。除了根据当地历史的时间顺序描述纺织品外,书中还包含盲文,以及四种类型(民族学、宗教仪式、历史和附录)的复制品,便于人们通过触摸进行识别和欣赏。

在这个项目中,媒介的多样性和融合的包容性,意味着我们需要思考新的策略方法,通过围绕特定的藏品来构建和实现有关传统和地域知识的共识。

### 讨论

面对当代社会在博物馆机构制度方面提出的需求,有必要重新思考我们在连结社区时所发挥的功能和承担的责任。大学博物馆迈向“整体性博物馆”的道路,建立在意识原则和社会行动原则之上。考虑到传统工作中角色、过程和策略的转变,推动民主化的进程,在社区和“他者”面前确认主体的身份。

从这个意义上讲,2017年开展的3次文献整理工作,都是立足于大学藏品和博物馆发展历程的工具化(instrumentalization),其目的旨在从博物馆、大学社区、当地、区域乃至国家等各个层面认识和评估人类群体。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呈现出多元性,意味着种族隔离问题的透明化,从霸权话语转变为通过协商实现共识,以及对社会问题更为包容。

因此,大学博物馆在面对世界发展的前景时,为了寻求更完善、更合适的管理方式,博物馆管理层需要尝试知识生产的新模式,推动文献的民主化进程,构建交流网络,通过共情和赋予意义来构建身份认同和地域归属感。在话语内容正式形成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的融合和社区的参与,通过平等对话达成共识,推动了认可文化遗产价值的边际问题。

参与“每月藏品”项目的博物馆理事会(Directorate of Museums)管理人员薇薇安娜·里克尔梅(Viviana Riquelme)表示,她会以藏品的特点和雅致程度作为挑选标准(图10):“我觉得古代的扇子非常漂亮。我选择了材质特殊、工艺精细的一款;经过研究,我发现这把扇子是由仿玳瑁的扇骨边框制成,辅以鸵鸟毛和金属质地的扇柄。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给人以优雅的感觉,我在查阅的档案图片中一眼相中。”<sup>4</sup>

大学博物馆的首本藏品登记账簿,是通过组建一支多学科交流的团队得到相关机构的认同。加布里埃拉·韦拉斯克斯(Gabriela Velásquez)指出,“对于大学的社区来说,项目第一阶段是非常重要的过程。在我看来,了解大学的历史/行政文件,有助于提升对大学的认同感,促成社区所有成员的知识民主化。同样需要强调的是,教授、管理人员和教辅人员积极参与这一阶段的工作,他们主动提供资料。在互动中存在着双重反馈:获得智利南方大学每个学院历史/行政文件保存状况的可靠信息;这同样有助于社会各界认识到维护、保存和宣传大学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献的重要性。”<sup>5</sup>正式确认大学藏品的遗产地位,能让校内和校外专业人员的工作得到认可。同样,这也让人们有机会阅读到一所与所在城市和地域有关的大学的教学史和研究史。

### 致谢

洛斯里奥斯地区的多民族记忆项目团队:

智利南方大学的视觉艺术家克劳迪娅·奥德涅斯(Claudia Ordóñez),智利南方大学的建筑师康斯坦察·查莫罗(Constanza Chamorro),瓦尔帕莱索大学的设计师安吉拉·埃雷拉(Angela Herrera),洛斯莫利诺斯(Los Molinos)费塔尼马普(Fei Tañi Mapu)社区的胡安·惠奇科(Juan Huichicoy),阿劳卡尼亚大区(La Araucanía)马普切社区的赫曼·惠查凯(Germán Huichaqueo),职业治疗师汉斯·乌洛亚(Hans Ulloa)和塞西莉亚·巴里恩托斯(Cecilia Barrientos),智利南方大学艺术学院摄影师卡洛斯·菲舍尔(Carlos Fischer),智利南方大学博物馆理事会媒体记者马利亚纳·乌鲁蒂亚(Mariana Urrutia),智利南方大学博物馆理事会考古学家西蒙·乌尔比纳(Simón Urbina)。智利南方大学博物馆理事会主管卡琳·威尔(Karin Weil),智利南方大学出

4 薇薇安娜·里克尔梅访谈,2017年9月, [www.museosaustral.cl](http://www.museosaustral.cl)

5 加布里埃拉·韦拉斯克斯,2018年,智利南方大学历史与社会科学院教育学专业毕业生。





版部塞萨尔·奥特马特(César Altermatt)，智利南方大学公共关系专业路易斯·桑切斯(Luis Sánchez)，以及文化、艺术与遗产委员会(Council for Culture, Arts and Heritage)，都参与了本项目的策划实施。



图 10

推出“每月藏品”巡展活动

图片来源：博物馆理事会，  
智利南方大学

#### 智利南方大学藏品团队：

智利南方大学环境联络主管莱昂纳尔·阿丹(Leonor Adán)，哲学与人文学院联络人里卡多·莫利纳(Ricardo Molina)，博物馆理事会主管卡琳·威尔，理学院联络人亚历山大·布拉沃(Alejandro Bravo)，环境学院联络人弗朗西斯卡·波布莱特(Francisca Poblete)，哲学与人文学院耶尔科·蒙杰(Yerko Monje)，博物馆理事会克劳迪娅·奥德涅斯，博物馆理事会西蒙·乌尔比纳，智利南方大学历史与社会科学院教育专业毕业生加布里埃拉·韦拉斯克斯。智利南方大学的所有学院都参与了本项目的策划实施。

#### 博物馆理事会“每月藏品”项目团队：

传承教育部伊纳基·穆里安(Iñaki Moulian)，文物保护实验室克劳迪娅·奥德涅斯，基础设施部康斯坦察·查莫罗，公众关注和服务部助理薇薇安娜·里克尔梅，考古实验室西蒙·乌尔比纳，外展部阿德里安·席尔瓦(Adrián Silva)，文物保护实验室的克劳迪奥·扎罗(Claudio Zaror)，文物保护实验室玛丽安娜·维丹戈西(Mariana Vidangossy)，管理与机构联络部马塞洛·戈多伊(Marcelo Godoy)，行政管理部勒内·贝罗伊扎(René Beroiza)，公众关注与服务部卡拉·埃勒斯(Carla Ellez)，管理与规划部卡琳·沃格尔(Karin Vogel)，行政管理部乔纳森·阿斯特泰特(Jonathan Astetete)，传播与交流部玛丽娜·乌鲁蒂亚(Marina Urrutia)，博物馆理事会主管卡琳·威尔。

3 加布里埃拉·韦拉斯克斯，2018 年，智利南方大学历史与社会科学院教育专业毕业生。

**参考文献**

- ADÁN, L. 1998. Diagnóstico de la Dirección Museológica de la Universidad Austral de Chile. Documento de trabajo Consejo Directivo, Universidad Austral de Chile.
- ADÁN, L. 2002. Planificación Estratégica para la Dirección Museológica. Borrador versión final, Universidad Austral de Chile.
- ADELL, N., BENDIX, R., BORTOLOTTI, C y TAUSCHEK, M. 2015. Between Imagined Communities and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Participation, Territory and the Making of Heritage. Göttingen: Universitätsverlag Göttingen.
- Carta de intención. 2017. VIII Encuentro de Museos Universitarios del Mercosur, Lima.
- CHERN LI LIEW 2015.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 A Synthesis of Research Online Sociability Determinants. En D- Lib Magazine Vol. 21 N° 11/12
- CORTÉS, J., JIMÉNEZ, G. y SÁNCHEZ, C. 2017. Heritage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critical approaches and new comparative strategies. *Anthropology Today* 33(1), 15-19.
- DeCARLI, G. 2003. Vigencia de la Nueva Museología en América Latina: Conceptos y Modelos. En Revista ABRA de la Facultad de Ciencias Sociales de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Editorial EUNA, Costa Rica.
- DeCARLI, G. 2004. Un Museo sostenible: museo y comunidad en la preservación activa de su patrimonio. San José C.R.: Oficina de la UNESCO para América Central.
- De VARINE, H. 2012. Alrededor de la mesa redonda de Santiago, intervención en ocasión de una reunión realizada en São Paulo comienzo de los años 2000. En Mesa Redonda vol. I.
- FLANDERS, J. & MUÑOZ, T. 2016.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ities Data Curation. En DH Curation Guide.
- FLORESCANO, E. 1993. “El patrimonio cultural y la política de la cultura, en Patrimonio cultural de México” ,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México.
- GREZ, S. 2009. “Patrimonio Histórico Nacional. Algunos elementos para la reflexión” , en Revista Museos N°28, Chile.
- KOZAK, Z. R. 2016. The role of university museums and heritage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Museum Review*, 1. <https://themuseumreview.atavist.com/vol1no1kozak>
- LOURENÇO, M. 2008. Wher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knowledge meet, an overview of University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in Europe In: C. CILLI, G. MANERBA & G. GIABONI II Patrimoni della Scienza, Le collezioni di interesse storico’ 321-329. AMNS, Torino.
- RAMÍREZ, C 2008. “informe sobre la destrucción del herbario del Instituto de Botánica de la Universidad Austral de Chile”
- TÜNNERMANN, C. 2003. La universidad Latinoamericana ante los retos del siglo XXI. Colección UDUAL (Unión de Universidades de América Latina). Ciudad Universitaria, México DF
- UACH. Ver\_Universidad Transparente. Universidad Transparente. Historia. Universidad Austral de Chile. <http://www.uach.cl/transparencia/quienes-somos/historia> (accessed 18/10/ 2018).
- UNESCO. 1973. “Round tabl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role of museum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
- Unesco Regional Seminar.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联系方式**

Karin Weil González, Director Museological Direction Universidad Austral de Chile.  
 Address: Campus Cultura UACH, Los Laureles s/n Valdivia, Chile.  
 E-mail: [karinweil@uach.cl](mailto:karinweil@uach.cl)



<http://museosaustral.cl>

Claudia Ordóñez Rivero, Museological Direction Universidad Austral de Chile.

Address: Campus Cultura UACH, Los Laureles s/n Valdivia, Chile.

E-mail: [claudia.ordonez@uach.cl](mailto:claudia.ordonez@uach.cl)

<http://museosaustral.cl>

Constanza Chamorro Palma, Museological Direction Universidad Austral de Chile.

Address: Campus Cultura UACH, Los Laureles s/n Valdivia, Chile.

E-mail: [constanza.chamorro](mailto:constanza.chamorro)

### 关键词

University Collections, associativity, inclusion, documentation, community engagement, inclusion, equity.